

目 录

亲历记

- 1 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 叶永烈
8 芷江受降亲历记 张彦

沉思录

- 11 反封建专制里程碑：邓小平“八一八”讲话 杜光
18 也谈“包容多样” 余广人

人物志

- 19 “天天向上”的任仲夷 范敬宜
22 邓小平岳西反“左” 王传代

春秋笔

- 24 诺门罕战争：日本第一次惨败 杨大卫
29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长历程 解力夫
34 第三次长沙会战 马仲廉
40 抗战胜利催生一本小刊物 袁鹰

求实篇

- 44 两张老照片 阎明复
46 李昌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 史义军

往事录

- 48 上个世纪的一场民营电影梦 章立凡
56 建国初《大公报》的一段曲折 王鹄

品书斋

- 61 《人的哲学论说》序 顾骥
62 重读冯玉祥 再看国民军 马长虹

他山石

- 65 美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张宇燕 富景筠

文荟苑

- 72 陈云的评弹情结 霞飞
78 姜椿芳与梅兰芳周信芳的友谊 杨哲

顾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征
冯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庄 李普 李锐 李一鑫
李学勤 李维民 杨天石 吴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铤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凌云 龚育之
曾彦修 戴逸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实 徐孔 (常务)
杨继绳 吴思

执行主编: 李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事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琼

理事: 白建钢

秘书长: 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271606)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电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真: (010)68532569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 (E-mail) 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价: 4.80元

胡克实自述： “文革”中的团中央

● 叶永烈

缘起

2001年5月31日,经上海《文汇报》记者邢晓芳的介绍,我在北京步入胡克实家。这位当年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今已垂垂老矣。也真巧,前一天正是他的八十大寿。虽然当年满头乌发如今已经变成灰白色,但是精神仍不错。客厅的墙上挂着他与老伴于今在海中游泳的照片,还挂着“宁静致远”的横匾。

谈话自然是从谈那个动乱岁月开始的,但是也谈了他的经历:

胡克实与中国共产党同龄——1921年5月30日出生于武昌,毕业于湖北省立高中部。学生时代他在武汉,于1935年投身一二·九运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武汉秘密学联。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建青年救国团,主持武昌团部工作。1938年8月调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他历任晋西北根据地党委青年委员、晋西边区党委常委、青联常委、区地委青委书记、四分区青联主席等职,可以说他的革命经历是从青年工作开始的。

1948年秋,胡克实调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青委书记,从此“专业”从事青年工作。1949年春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青委副书记。

1952年,31岁的胡克实调到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候补书记。1953年又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64年底,胡耀邦奉调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他虽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团中央日常工作则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

胡克实说,“文革”开始之后,在青年学生中冒出了红卫兵。受极左思潮的驱使,红卫兵闹着要取消共青团。他们宣称,共青团是“修正主义”的青年组织,必须砸烂共青团。于是,红卫兵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青团中央。他们把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团中央。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最多的就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三胡”的提法,就是在这时候叫开来的。

胡克实还记得,是北京海淀区一个学校的红卫兵首先在团中央贴出“打倒三胡”的大标语。从此,“打倒三胡”的口号便响遍全国。

亲历“文革”初期的激烈斗争

一提起这段往事,胡克实便沉浸于“文革”岁月的回忆之中。

胡克实说,在1966年六七月份,“文革”刚刚开始,北京处于非常混乱之中。毛泽东主席那时不在北京,而在杭州。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副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不过,就连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该怎么搞,更不知道他俩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打倒对象。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指定了4个人,每天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整理成文字,向毛泽东报告。

在1966年6月初,胡克实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克实说,本来应该是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列席会议的,那时候胡耀邦生病,就由他列席会议。事先报告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说那就叫胡克实来吧。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1964年底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便到西安工作。那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刘澜涛。胡耀邦在西北工作并不顺心。胡耀邦生病,住进西安的医院。这时,叶剑英元帅路过西安,叶帅跟胡耀邦有很深厚的友谊,听说胡耀邦病了,便去医院看望。叶帅对胡耀邦说,既然人家不欢迎你,你还呆在这里干什么?你不如回北京养病!胡耀邦接受了叶帅的意见,在“文革”前夕回到了北京治病。虽然胡耀邦这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由于生病,并不过问具体工作。正因为这样,由胡克实代替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胡克实记得,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派工作组。当时,北京很乱,特别是学校里,出现学生打老师、打校长。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没有精神准备。他们用过去的办法,即由上级部门派驻工作组。会议决定向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市的许多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另外,还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之后,全国各地也纷纷向各单位派驻工作组。当时共青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向北京市八个城区各中学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团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担任了各工作组负责人。北京市西城区中学的工作组,就由胡启立负总责。

胡克实说,没想到,工作组问题成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导火线。

那是在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干部、群众的事件,戴高帽、抹黑脸、罚跪、打人。派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发现之后,及时地加以制止。6月20日,刘少奇在关于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的简报中,肯定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批转全国执行。然而,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却认为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下发文件:“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

在中央决定撤消这个文件。”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各地掀起了反对、批判、揪斗工作组的浪潮。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于是,刘少奇不得不承认:“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这么一来,毛刘分歧由隐蔽到完全公开。全国各地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突破口,把斗争的矛头公然指向刘少奇……

胡克实亲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斗争。他亲眼目睹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是怎样决定派工作组的,又亲耳听到刘少奇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检讨。他说,过去一直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威望和才华,这时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也不一定正确。胡克实笑称“文化大革命”初期是“暗箱操作”。

胡耀邦的“牛棚”岁月

胡克实说起了“文革”初期的团中央。胡克实说,那时候团中央受到的压力很大,因为团中央直接面对青年,也派出那么多的工作组,不言而喻,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他很感叹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们被煽动起来,处于狂热状态,真的有点像宗教的狂热、民族的狂热!大学生还好一点,毕竟年纪大一点,懂得一点“规矩”,最没有办法的是中学生。他称中学生“没有章法”,真可以说是无法无天。然而,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归团中央主管,理所当然受到成千上万无知的中学生们的狂热冲击。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让红卫兵戴上“红卫兵”袖章,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起云

涌。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共青团中央，“三胡”停职反省。

胡克实记得，李富春作为中央代表，奉命来到团中央，宣布“三胡”停职反省。李富春说，“三胡”停职反省，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主要是：

第一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

第二条，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够；

第三条，走群众路线不够。

这“三个不够”，就导致“三胡”停职反省。后来，李富春本人也因为这“三个不够”，遭到同样命运。

这时，胡耀邦不能不从医院出来，回到共青团中央进行“反省”。

由于“三胡”停职反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团中央成立了一个“临时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

在停职反省之初，“三胡”还能回家。到了后来，就只能整天呆在团中央机关里写检讨，不能回家了。

没多久，团中央“临时书记处”又被取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李富春找团中央“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谈话，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把“三胡”保护好，绝对不能出事，还要保护好“三胡”的家，不能让人冲击。

当时团中央“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还不错，非常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李富春的指示。这个负责人原本是上海工厂的团委书记。1964年，曾经挑选一批基层团委书记到中央部门工作，这人到了轻工业部工作。他很沉着，也很老练，后来进入共青团中央工作。根据李富春的指示，他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大楼派了解放军岗哨。这样，没有得到批准，红卫兵是不允许进入机关大楼，也就保证了“三胡”的人身安全。只有经过批准，岗哨才放行，进来三两个红卫兵，找他们外调，或者问话之类。

胡克实记得，那时共青团中央的院子里，常常挤满了狂热的红卫兵，召开批判“三胡”的大会，坚决要求把“三胡”拉出来示众。这时，“三胡”也只是在机关大楼的阳台上“亮相”而已。红卫兵们只能用双眼“看”着“三胡”，手够不着，自然也就无法“武斗”。

这时，外边越来越乱，抄家、武斗成风。经常有

人要求把“三胡”拉出去批斗。

最严峻的时刻终于到来。那是1966年12月，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发生武斗，打死一名教师，却被说成是工作组“挑唆”，而这所中学的工作组是由团中央派出的。“中央文革小组”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红卫兵大会，追悼那个死去的教师，并把矛头对准了团中央。大会结束之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团中央大楼，高呼打倒“三胡”的口号，要求揪斗“三胡”。这是红卫兵对共青团发动的一次最强大的“攻势”。

团中央派驻了军代表。军代表强调，胡耀邦有病，不能拉出去批斗。你们实在要拉人出去，那只能拉胡克实、胡启立以及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工作组那六七个人，不能拉胡耀邦。即使是拉胡克实他们出去，也必须文斗，不许武斗。

胡克实说，他被拉出去斗了几次。在那样混乱的状态下，狂热的红卫兵们不可能只是“文斗”。他多次挨打。后来，连胡耀邦也被拉出去斗。胡耀邦被打得很厉害。有的红卫兵用皮带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滚！胡克实目击了这一切，非常感叹地说：“那时候，打手们完全没有理性了！”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大约被拉出去斗了十几次。他和胡启立挨斗，那就更多。

当时，他们在团中央被关在“牛棚”里。他们属于“牛鬼蛇神”，所以关押他们的房子被叫做“牛棚”。那时候的“牛棚”，就是团中央机关的大房间。他们睡在地上，一个房间住二三十个“牛鬼蛇神”。“三胡”被分开来，关押在不同的“牛棚”之中。不过，“牛棚”挨在一起，出去解手或者接受外调时，彼此都还能看见。

1968年10月的一天，忽然有几个穿军装的人把胡耀邦找走了。起初以为是外调。过了一会儿，胡耀邦回来了，把牙刷、毛巾、换洗衣服、被子都带走了，

当时的“牛棚”看守，大都是团中央原先的司机、勤杂工等，常常给“牛鬼蛇神”报告消息。“胡耀邦被带走”，这当然是“重大新闻”。通过看守们的嘴巴“广播”，这一“重大新闻”立即传遍各个“牛棚”。胡耀邦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的命运牵动着每一个“牛鬼蛇神”的心。“牛鬼蛇神”们议论纷纷，猜测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是让

胡耀邦回家还是进监狱关起来？

胡耀邦这一走，竟然从此离开了团中央的“牛棚”。来自看守们的“小广播”是乐观的，他们告诉“牛鬼蛇神”们，胡耀邦是去中央开会！

这就是说，胡耀邦“解放”了！看守们说，既然胡耀邦“解放”了，你们也快“解放”了。

后来才知道，胡耀邦出了团中央的“牛棚”，竟然被径直送进了京西宾馆！

原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是要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的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关于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然而，由于在“文革”中许多中共中央委员遭受迫害，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可能不足半数，无法通过这些所谓的决议。为了凑数，就从原中共中央委员以及候补中共中央委员之中，寻找尚未完全打倒、可出席会议者，以求能够过半数。胡耀邦是中共中央委员，属于尚未完全打倒、可出席会议者，于是把他从“牛棚”中突然接到会议代表住宿处——京西宾馆。

会议之后，周恩来把胡耀邦等一批刚出“牛棚”的中共中央委员趁机保护起来，让他们留在京西宾馆。这是因为京西宾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重要宾馆，红卫兵、造反派们很难冲进来。胡耀邦在那里，平平安安地住了两三个月。

毛泽东否定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

在“文革”中，共青团中央曾经突然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通知，要求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前往全国各地。

工作组不是挨了批判，派工作组不是被说成是“路线错误”，怎么又要团中央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呢？

原来，这工作组是专门去“征求意见”。“征求”什么“意见”呢？据说，共青团已经“修”（指修正主义）到家了，已经沦为“刘（少奇）邓（小平）的爪牙”，必须彻底改组或者干脆取消共青团。由共青团中央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就是到全国各地听取意见，如何改组或者取消共青团。当时，江青也参加了意见，他们打算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当

时，全国各省市都在纷纷召开“红代会”（即“红卫兵代表大会”），正在筹备召开全国性的“红代会”，成立全国性的红卫兵中央组织。陈伯达和江青以为，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是“历史的必然”。

就在共青团中央奉命组织工作组、已经进行了两个星期，许多工作组正准备出发，突然又接到通知，说是取消了计划，不派工作组了。

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毛泽东不赞成！

后来才明白，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毕竟是大事，陈伯达、江青必须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不以为然。毛泽东说：“你们不要共青团，我要共青团。”毛泽东还指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毛泽东一言九鼎。陈伯达、江青打消了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念头，所以也就急急忙忙取消了向各地派遣工作组的计划。

他成了“走资派好人”

在1968年10月胡耀邦出了“牛棚”之后，胡克实他们在“牛棚”里也开始松动，比过去自由、自在多了。看守们也向他们透露消息：“你们没事了，快出‘牛棚’了。快了，快了！”

这时，军代表找胡克实谈话。军代表说，你的历史经过审查，没有问题，你在团中央也就是工作上的一些问题，那是“路线问题”，谁都知道的。军代表的话，显然是“解放”胡克实的讯号。

果真，当1969年元旦来临的时候，胡克实就得到通知，可以回家了！从此，他结束了“牛棚”生活。

1969年1月，军代表要胡克实在团中央作个检查，“往深里挖一下”，就可以放他过关。在胡克实写好检查之后，团中央机关在礼堂里开会，胡克实照着念了一遍，从此也就算是过关了，结束了停职反省。

在“解放”之后，没有宣布胡克实恢复团中央书记职务，但是也没有宣布取消他原先的团中央书记的职务，而是让他参加团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算是“结合”了的“革命干部”。

胡克实的孩子初中毕业之后,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听说要保送“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他的孩子需要团中央开一份关于他的政治情况的证明。胡克实记得,军代表在证明上写着,胡克实“属于走资派好人”!

这“走资派好人”,实际上是当时对胡克实的政治结论。对于今日青年读者来说,这“走资派好人”颇为费解。其实,那“走资派”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走资派好人”也就是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好人”!

胡耀邦在家“赋闲”的日子

胡克实谈起了胡耀邦。

他跟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共事14年,而且从1955年至1978年做了23年邻居。

他说,那时候他和胡耀邦一起住在北京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六号。那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前院住着秘书们,中院住着胡耀邦一家,后院住着胡克实一家。

在“解放”之后,胡克实和胡耀邦都到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劳动去了。

直到1971年底,胡耀邦因病终于获准从河南回到北京。一个月后,胡克实也回到北京。胡克实拿出一帧珍贵的照片,送给笔者。这张照片是他和胡耀邦在1972年初的合影,就在他们所住的院子里照的。他们都穿着中式旧棉袄,表情木然,是在那严寒的日子里最真切的写照。

他们回到北京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找他们谈话,说是分配他们前往新的工作岗位:准备分配胡耀邦担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配胡克实担任贵州省铝业联合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面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胡耀邦很严肃地说,作为党的干部,分配到哪里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我作了那么久的审查,在分配工作之前,必须给我一个正式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必须是中央认可的。

自从那次谈话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再也没有音讯。

从此,胡耀邦“赋闲”在北京家中。他趁这难得的“赋闲”之机,在家读了大量的书。胡耀邦家几大书柜里的藏书,画着他的阅读记号,表明他读书非常认真。这些书,很多是在他“赋闲”时细读的。

1973年10月,胡克实调任中央国家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从此,他离开了团中央,在科技领导岗位上工作。

国家地震局本来是一个工作并不很忙的单位,但是在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一下子处于日夜工作状态。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召开紧急会议,胡克实作为国家地震局党委书记出席了会议。一见面,华国锋对他格外热情。那是因为当年胡克实在晋西北工作时,先后担任临县、离石县、方山县的县委书记,属于“三地委”,而华国锋则担任交城县委书记,属于“八地委”,彼此早就认识……胡克实说,华国锋是个谦厚的人。毛泽东在晚年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大约是由于要选择一个没有二心的人。

胡耀邦在家“赋闲”了几家,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

1973年3月10日,传来好消息,中共中央决



胡克实与胡耀邦(1972年)

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邓小平又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75年5月间,胡耀邦被指名来到第四期中央读书班学习。这期读书班有四十多名学员,分成几个班,有吕正操等,都是曾经当过中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这样级别的老干部。读书班主要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读书班的负责人虽说是王洪文,实际上是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他们安排的,打算通过读书班学习之后,安排这批老干部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以与“四人帮”抗衡。

“人品高尚,襟怀坦白”的胡耀邦

在读书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元帅说:“该结个业吧!”于是,1975年7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结业典礼。

在中央读书班上,胡耀邦见到在读书班另一个班学习的苏振华,特别高兴。当年在陕北“抗大”,苏振华是大队长,胡耀邦是政委,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他们多年未见,在结业典礼上相见,互相拥抱,兴高采烈。许多老同志见到胡耀邦,也都跟他握手、问候。

叶剑英、邓小平、江青、王洪文来了。还没有正式开会,叶剑英就问:“怎么没有看见胡耀邦?”

胡耀邦当时坐在后排,一听这话,赶紧站了起来:“‘参座’,我来了,在这里!”

当年,叶剑英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胡耀邦已经叫惯他“参座”。

叶帅马上就说:“谁把你安排在这么后边的?来,到前面来!”

叶帅其实话里有话。

叶帅跟胡耀邦有着深厚的友谊。叶帅好几次到胡耀邦家聊天,散心。有时,就在胡耀邦家吃饭。胡耀邦就到后院叫胡克实一起来吃饭,跟叶帅见面。

那天,胡耀邦也很高兴跟邓小平见了面。邓小平在结业典礼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

胡耀邦早在长征时期就已经认识邓小平。在延安时期有过许多来往。1950年初,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而胡耀邦担任川北行署首长,直接在邓

小平领导下工作。后来,胡耀邦和邓小平同时调往北京。此后,胡耀邦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文革”中,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井冈山》在报道打倒邓小平与胡耀邦时,曾经刊登了邓小平与胡耀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许多通信,这表明邓小平与胡耀邦在当时就存在很密切的关系。

胡克实记起,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当时党中央一月工作会议和三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如何适应形势,健全团的工作,学会作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的问题。会议期间,胡耀邦邀请邓小平前来作报告。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邓小平谈到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以为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关系一层又一层,并不有利于农业生产。只要能够发展农村生产,各种生产形式都可以。他说起他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言外之意,是赞成包产到户。邓小平是在上午讲这番话的,到了晚上,他找胡耀邦,告诉他今天上午的讲话不要往下传达。后来才知道,那天下午,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包产到户……

正是因为邓小平与胡耀邦有过很多交往,所以那天在中央读书班结业典礼上见到胡耀邦,邓小平得知胡耀邦正“赋闲”在家,马上安排他新的工作。

在结业典礼结束之后,叶剑英约胡耀邦到北京体育馆去看比赛。叶帅对胡耀邦说:“你这个人光喜欢看书,也该去看看体育比赛!”就在比赛进行之际,有人跑来告诉胡耀邦,说是邓小平来电话找他。胡耀邦匆匆来到后台,用红机子跟邓小平通话。

胡耀邦赶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到中国科学院。当时院长是郭沫若,正在病中。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就这样,胡耀邦开始了重新工作。略早于胡耀邦,在1975年1月,胡克实也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成员。于是,这两位共青团中央书记又在中国科学院并肩工作。

胡克实说,邓小平有着锐利的目光,思想非常敏捷。邓小平平日话不多,要言不烦,从不拖泥带

水,讲话很深刻。

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文革”的“重灾区”中国科学院进行深入调查,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在1975年9月26日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谈了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胡耀邦进行修改,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认为,这一《汇报提纲》适用于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的整顿工作,送交毛泽东,准备印发全国。但是毛泽东未表同意。

就在胡耀邦忙于整顿中国科学院的时候,邓小平受到“四人帮”的“批判”,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指斥为“大毒草”。胡耀邦随着邓小平的下台而下台,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又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从富强胡同迁出的。当时,按照工作需要,胡耀邦应该住进中南海。胡耀邦不愿住中南海,认为住在那里朋友们来访诸多不便。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住处:那房子在中南海之外,紧挨着中南海的红墙。他请人开了扇后门,直通中南海,便于在中央工作。然而,房子本身在中南海之外,朋友们来访,可以从外面的大门直接进入,不必经过中南海。直到今日,胡耀邦的家属还住在那里,只是关闭了那扇直通中南海的门。

胡克实用“人品高尚,襟怀坦白”八个大字形容他所深知的胡耀邦。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不整人。

胡耀邦早在中央苏区,小小年纪,就蒙受过所谓“AB团”的冤案。从那时候起,十几岁的胡耀邦就亲身体验到被整之苦,冤案之苦。从此,他非常厌恶、痛恨整人。他总是对蒙受冤屈的人,寄予很大的同情。胡耀邦一再强调,对于人的处理必须非常小心。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青年作家刘绍棠蒙受不白之冤。胡耀邦亲自找他谈话,给予鼓励,曾经使刘绍棠在困难的时候得到温暖。

也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曾经为平反冤假错案出了大力。

胡克实说,胡耀邦多年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跟青年心连心。胡耀邦的性格也很年轻。他

直率、真诚、乐观、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廉洁。胡耀邦除了一些重大场合讲话拿发言稿之外,平常即席讲话,从不拿稿子。而且非常具有鼓动性,热情洋溢,富有文采。

八十大寿出版新著

就在我采访胡克实的时候,他家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大摞新书。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刚印出的胡克实所著《科技工作与科技立法》一书。这本书收入胡克实多年以来所写的关于科技工作、科技立法方面的讲话、论文。

据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李丕光告诉笔者,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两个月内赶出的新书,为的是作为献给胡克实八十大寿的一件特殊而又最有意义的礼物。

胡克实作为团中央书记,怎么会写起《科技工作与科技立法》一书呢?

那是因为胡克实自从离开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岗位之后,一直从事科技领导工作。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成员之后,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胡克实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后,在1988年再度当选。他负责科技立法、执法检查等科技法制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时期代表科学院和全国人大出访日本、英国、法国、瑞典、瑞士、美国、意大利等国二十余次,借鉴了许多有益经验。

胡克实的夫人于今也是延安老干部。如今,他们的子女在各自的岗位上忙于工作,夫妇俩在北京安度晚年。胡克实在三年前曾经有过小中风,而且气喘老毛病也一直纠缠着他,但是他的精神很好。

胡克实曾是中共第八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央文教小组成员,中央人大政协人事安排小组成员,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副主席,中国桥牌协会副会长,中国科技法学会会长,中国科技法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 萧 徐)

芷江受降亲历记

● 张 彦

在迎接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日子里 ,我脑海里频繁出现两个永远忘不了的历史画面 :一是“ 八一五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我的直觉感受 ;二是紧接着我亲历芷江受降的那一幕。

那时 ,我是 23 岁的小伙子 ;如今 ,我已经是 83 岁的老头子了。我们这一代人 ,都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1931 年 ,“ 九一八 ”日本铁蹄踏上我东北三省时 ,我才 9 岁。但是 ,我永远也忘不了 :停在南京江边的日本军舰的炮声隆隆震得我们家的玻璃窗直发响。1937 年 ,“ 七七 ”卢沟桥事变时 ,我 15 岁 ,初中刚毕业 ,就跟着父母开始过逃难的日子。一家大小十来口人 ,从南京逃到武汉、长沙而重庆 ,被日本飞机的轰炸赶着走 ,八年啦 ,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甚至 ,我到了大后方的云南昆明上大学时 ,也免不了正上着课也要跑警报 ,在树林里眼睁睁看见日本飞机往下扔炸弹。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真是罄竹难书啊。像我们这样的人所受到的伤害 ,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但是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抗日战争在所有中国人身上塑造的这种救亡图存的民族忧患意识 ,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笔无可估量的巨额财富。

1945 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虽然没有投笔从戎 ,但总想为抗日战争直接做点什么。当时 ,盟军设在昆明的美国新闻处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有个“ 心理作战部 ”(OSS) ,专门负责制作各式各样的传单 ,用飞机在日伪军所在地区分撒 ,以瓦解他们的军心。那年暑假 ,他们特别到我上学的西南联大来招考大学毕业生参加他们的工作 ,我和同学周锦荪主动应试 ,结果很幸运被

录取了。于是 ,我们俩穿上美军咔叽布服装 ,戴上鸭舌帽 ,在美国军官罗克伍德 (Charles Rockwood) 领导下与一名准备做日俘工作的日裔美国士兵阿勒克斯 (Alex) 组成了一个四人小组 ,开着一辆装有发报设备的大型军用吉普 ,由昆明出发 ,直奔湘西敌占区的边缘地带。任务是以“ 美国新闻处记者 ”名义 ,采访从敌占区出来的人们 ,了解关于日伪军情况 ,以英文迅速给总部发回素材 ,供昆明制作各式各样文字或漫画的传单 ,借以进行心理作战。我们感到 ,能够直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出点力 ,哪怕很微薄 ,也是莫大的荣幸。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下午 ,我正在邻近日军占领区的湘西沅陵县一家旅馆里敲打着英文打字机 ,急着要完成一篇关于日军最新动态的报道。突然 ,从大街上传来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嘈杂声音。我连忙丢下打字机 ,就往外跑。跨出大门 ,我傻眼了 !满街的人都好像发了疯似的 ,嘴里高声喊着“ 日本投降了 ! ”,脚底下又是跳、又是跑 ,简直不知道是什么在指挥他们的大脑。奇怪的是 ,我自己也随之失去了控制 ,跟着人的潮流跑去 ,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突然间 ,我发现 ,这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无形中都消失了 ,谁跟谁好像亲如一家人。虽然没有像外国人听到胜利到来时那样疯狂地拥抱亲吻 ,但从来都很拘谨的中国人这时候一点也不拘谨了。谁也不认识谁的男女老少 ,就这么手拉着手 ,跳呀 ,唱呀 ,走呀。路旁 ,摆杂货摊的 ,卖水果的 ,都举起双手在那里吆喝 :“ 欢迎大家来随便拿 !随便吃 ! ”八年了 ,亿万中国人吃了

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谁都有一本要侵略者偿还的血债。今天，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人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这是事先谁也无法预料的，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才会知道。我一生中也就经历过这么一次，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紧接着，我们的任务也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总部命令：我们这个携有发报装备的小组立即开往芷江，去为美国新闻处向全世界发布日本军方代表前来接洽投降事宜的重要新闻。

位于湖南南部的芷江，地方不大，当时大约只有几万人口，但却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建有较大的机场。早在1938年，援华抗日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就驻扎在这里。后来，美国第14航空队，也就是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也以此为基地。但是，这样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闻名的受降之城。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举行受降典礼的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就绪。会场设在一栋由营房改装的黑色西式平房，会场前方马路两旁扎有木板牌楼，中间嵌有一个象征胜利的巨型V字，上端扎有“和平之神”四个大字。会场前面广场上，四根旗杆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会场内，正中墙上悬挂孙中山像，上面和左右挂的是“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横联和条幅。上面一排主座是中美受降大员的座位，下面面对主座的是为前来面呈降书的日军代表准备的一排座位。两旁的座位是为有关官员和记者准备的。整个会场并不宽敞，但是十分庄严肃穆。

8月21日，风和日丽，天高气爽，机场内外，戒备森严。上午11时许，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全权代表、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一行乘坐的专机，在我方三架战斗机自常德以来的护航下，到达芷江七里桥机场上空。该机绕机场低飞以示敬意，然后徐徐降落。飞机两翼按要求作为标志所挂的红色长布带，已经被风吹得所剩无几了。在飞机旁等待他们的是四辆军用吉普，除第一和第四辆负责引路和监视外，中间二辆供日方使者乘坐的都插有象征投降的白旗。此时此刻，机场上虽然早已聚集着来目击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上千的人群，但是喧哗声早已平息，除了新闻记者摆动相机的声响外，鸦雀无声，一片肃穆。

经我方宪兵登机检查有无武器和违禁物品后，今井武夫出现在机舱门口，头戴硬壳帽，脚蹬马靴，身着草绿色哗叽军服，佩带军刀，戴黑边玳瑁眼镜，面带戚容。只有在得到我方负责监督的一位少校军官口令允许后，他才和他的参谋、译员以及飞行员等8人徐徐走下飞机，排成一行，等候检查身份证明。这时候，一个个狼狈不堪的窘态，可想而知。昔日“皇军”不可一世的那种威风，荡然无存。一大群新闻记者的相机，将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及时地收入镜头，直到他们乘坐的吉普被引导朝着接待降使的招待所开去。专门为日本降使准备的招待所是两栋木板平房，板壁上涂有很大的白十字标志。房间内陈设简单，但很干净、整洁。被褥、席子以及日用器具，都是新的。

下午三时，在受降典礼开始之前，会场正中已坐着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右方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为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准将和翻译官。两旁是嘉宾和新闻界的席位，一边入座的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赫赫名将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等人，另一边则早已挤满了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一部分没有获得坐位的只好站在门外了。在日方投降代表到来之前，萧毅肃事先交代各项应注意事宜，并宣布三点：（1）今天在场记者不得发问；（2）日方代表进来时，大家应安坐不动；（3）中方发言都先译成日文再译英文，日方发言都先译成中文再译英文。

下午四时，典礼正式开始。日本军方代表今井武夫、桥岛芳雄、前川国雄及译员木村辰男四人，身着军常服，足登长统马靴。除翻译外，另三个都配有参谋军官绶带。当他们走到会场门前时，立即自动停步，等候命令。直到萧毅肃示意允许，他们才进入会场，然后脱帽、立正、鞠躬后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

萧毅肃首先宣布，自己今天是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日本降使，并要求对方出示说明身份的证件。今井立即立正答道：“本人是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参谋次长今井武夫少将，奉命来晋謁中国统帅接洽投降的全权代表。”并随即呈上他的正式委任状。萧审阅证件后，今井即遵照命令交出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

战区的战斗序列、兵力位置以及各种指挥系统等表册和文件，并呈上日军兵力分布的彩色概要图。当日军参谋和翻译站到桌前说明彩色概要图内容时，记者们蜂拥而上企图拍照摄像，但是立即被冷欣给制止了，因为这是军用地图不许拍摄。

接着，萧毅肃随即将发给驻华日军最高指挥长冈村宁次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当面交给今井武夫带回去转交冈村。根据三种语言的朗读，备忘录主要内容就是列出日本海陆空军在执行投降命令时，应注意的各项任务以及中国战区各个分区受降地点的详细规定和图表等等。然后，日方降使即在《受取证》上用毛笔签字盖章并呈上。大约下午4时50分，受降仪式结束。日本降使随即起立、鞠躬，退出会场。

至此，萧毅肃宣布投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从旁听房间走出，听取萧的报告，验看一切有关日军投降的地图文件，同时接受众人趋前表示的祝贺。当晚，美军柏德诺准将设宴庆祝胜利。何应钦即兴发表讲话，宣布自投降之日起，中日双方即停止敌对战争状态。

正式的受降仪式虽然如此简短，日本军方代表却在芷江停留了52个小时才原机飞返南京。在此期间，彼此双方都没有闲着。中国各方的将领们都在频繁开会研究全国各地日伪军投降的

处置问题，同时就随时让下级军官与日军投降代表进行具体细节的磋商。此中，还包括一个重要节目：作为中国陆军最高长官的何应钦单独接见今井武夫，所谈内容就不得而知了。虽然根据请示在重庆的蒋介石，受降的签字仪式改在南京举行，所有受降的具体安排部署均已在芷江准备就绪。23日晚上，何应钦为庆祝胜利举行了一个鸡尾酒会，包括传媒记者也在被邀之列。有记者问：“为什么接收人员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没有给共产党一个接收地区？”尴尬的何应钦只能支支吾吾以“你认为中国应该有两个政府？”搪塞过去。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这里已经潜伏着内战的危机了。

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了。曾经充当日本侵华大特务土肥原的得力助手、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今井武夫，在芷江受降中所表现的狼狈不堪，至今仍历历在目。然而，当今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却不顾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顽固地坚持去参拜供奉有东条英机等18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他的一位大臣，甚至公开地否认屠杀了几千万中国和亚洲生命的战争，不是一场侵略战争，激起了世界公愤。今天，我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不能不特别警惕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一定要坚决予以遏制和制止。历史是不允许重演的。（责任编辑 萧 徐）

（上接第33页）常冈少将也被击毙。至11月7日，敌人的围攻最后被我军彻底粉碎了。在击破敌人多路围攻的48天战斗中，边区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130多次，毙伤日军旅团长常冈少将以下官兵5200多人，日本侵略军围攻我军的幻梦落了个损兵折将的下场，最后不得不狼狈逃窜。

1938年底，日军明确提出：“华北治安之稳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中共”，并将其第五、第十、第二十七师团由华中调回华北，以加强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进攻。1939年11月，坐镇张家口的伪蒙疆驻屯军司令兼独立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日军1500多人向我涞源地区发动进攻，结果在黄土岭战斗中被我击毙。阿部规秀是接替去年被我击毙的常冈少将来统帅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该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而阿部又是日本军界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阿部

中将被击毙后，日本朝野震动，陆军总部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痛悼此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阿部规秀是日军侵华战争以来丧失的最著名的高级将领。对此，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蒋介石都先后发来贺电，祝贺晋察冀军民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就这样，晋察冀边区在战斗中成长，它依靠全党全军的努力，在全区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赢得了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光荣称号。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边区部队共同日伪军作战28000多次，歼日伪军30万6千多人。民兵单独作战和配合部队作战，歼日伪军29000多人。到1945年抗日大反攻时，晋察冀根据地抗日武装部队已发展到32万多人，民兵发展到90万人，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 萧 徐）

反封建专制里程碑： 邓小平“八一八”讲话

● 杜 光

25年前的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突出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等；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特权，特殊化。对于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邓小平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时光流逝，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了，邓小平言犹在耳，但他所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讲话中，邓小平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弊端归结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我个人认为这是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封建主义在我国各个领域、特别是思想政治领域的严重存在，用“残余影响”这个概念恐怕是包括不了的。

我们为什么对封建专制主义缺乏足够的认识

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指出：“旧中国留

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这个历史特征，决定了我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无孔不入。诞生在这种社会里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对民主革命的反封建的性质和任务，还缺乏准确的理解与把握，以致不能把民主革命坚持彻底；另一方面，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共自身的严重影响也估计不足，没有始终把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作为党自身建设的主要任务。长期以来，在指导思想上我们总是片面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却不很注意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结果，在理论思想和路线方针上就出现了错位：许多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和抵制，而某些封建专制主义的观念和制度，却被看成是社会主义而得到弘扬和发展。就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把“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却忽略了封建主义在中国的严重存在。直到毛泽东建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明确地把革命任务转到反帝反封建的正确轨道上来。不过，他的重点仍在于“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行“耕者有其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而对弥漫于整个旧社会的封建主义政治思想传统，尤其是围绕为确立与巩固专制制度而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思想传统，却没有给予足够的

注意。革命任务的这种政治思想偏向反映到党的建设中来,就是在党的自身建设中,始终忽视在政治思想领域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以统一党内思想为目标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没有涉及反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只是一味地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延安整风在统一全党的理论思想和凝聚全党的力量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实际上也有助长封建专制主义在党内滋长的另一面,如用“山呼万岁”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形式来表达对领袖的爱戴,传唱《东方红》,树立毛泽东个人权威,就是一些鲜明的例证。可以这样说,从中共成立时起,封建专制主义就无声无息地侵蚀着这个革命政党,党的历史上的一切不幸,都可以看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阴影。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辉煌的胜利,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只是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却放过了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这就为专制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于是,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里提到的种种“封建主义余毒”便逐渐孳生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构建起一个集中的有时是专断的政治架构。邓小平曾引述毛泽东谈论斯大林的胡作非为的话说:“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同样,像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由斯大林、毛泽东引发的那些不幸事件,主要根源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沙皇俄国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使然。这些现象为什么不会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偏偏出现在苏联、中国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比较彻底,而苏中两国则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两个大国都没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便匆匆忙忙地“跃进”到“社会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却把封建专制主义掩护下来了。尤其荒唐的是,用来掩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外衣,竟然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被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差异?

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斗争比较彻底的基本原因,是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有了同封建主义抗衡的物质力量。加上他们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政治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双重革命的夹击下才逐渐完成变革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才得以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回过头来看看苏联和中国,在经济上没有经历革命性的经济变革,资本主义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没有经历过深刻全面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命,封建主义、特别是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传统却根深蒂固。俄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王朝,1949年又解放全中国。但这些伟大的革命都没有撼动封建专制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深处的根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反封建的政策,是民主革命的继续和深化。他要通过工业化、电气化和合作化来改变俄国城乡的小生产,从经济上堵塞封建主义复活的途径,因为小生产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得更深更远,他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所要建立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说,在这个前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既要吸取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文明成果,也要避免资本主义剥削带来的种种弊端。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科学思维成果,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顶峰。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列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却把革命的矛头转向本来就没有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和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在临近全国解放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限制反限制为形式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不到三年时间,他就宣称:“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

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这样,他就放过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从三反到反右派、反右倾,他满脑子都想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却看不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猖狂进攻,结果导致专制主义在许多方面的复辟。文化大革命正是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的表演。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恩全集》第1卷第411页)这句话用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真是最恰当不过了。

封建专制主义是我国腐败的主要根源

据某些学术机构调查,近几年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社会腐败问题,而封建专制主义正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在人民中国的历史上,社会腐败首先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沦丧。有的人认为,五六十年代是我国的社会道德面貌最好的黄金时期。此话不无道理。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同志相称,平等对待,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无不怀念当年的良好的道德风尚。不过,这个所谓黄金时期的断语最多只能说是说对了一半。因为,这个时期,我以为恰恰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日益沦丧、精神日益腐败的时期。建国之初,人民群众怀着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比敬仰,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认定自己从事的实际工作是为未来的美好社会加砖添瓦的革命行为,人人都为能做一个新中国的建设者而自豪。这个高尚的理念,孕育着美好的道德风尚——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准则。但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对政治体制的渗透,这些道德准则受到了全面的侵蚀。毛泽东凭借他的文才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与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左二)等交谈

武略和丰功伟绩,获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崇和信赖。建立在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崇拜的基础上的最高权力,使他处于推行毕生理想的最有利的地位。但是,不幸的是,此时他在指导思想上却错误地抛弃了自己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奉行了一条反资不反封的错误路线。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他在借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长期储积的文化思想传统中的专制主义的东西。于是,专制主义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的掩护下,找到了在新中国制度里悄然复兴的机会。邓小平在1980年“八一八讲话”中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领导职务终身制、猫鼠关系等等,都是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这些弊端通过政策的制订和施行而延及社会,破坏良好的道德风尚。祸及社会的主要渠道是一系列政治运动。在三反五反的指导思想上,已经表现出主观臆断的专制色彩,在合作化运动和对反冒进的批判中,进一步暴露出独断专行的家长制作风。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如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可以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正是这些在专制主义指挥下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导致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沦丧,人性凋零。由反胡风肇端而在反右派运动中普遍发扬、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因文贾祸、因言致罪,造成了人

们在字里行间、日常言谈中寻找阶级敌人的恶劣风气。流风所及,戚友亲情、同志情谊,都为阶级斗争的沉重压力所笼罩。运动中固然人人自危,平时也互相戒备,就怕运动来时遭到揭发批判。一旦风暴来临,为了避祸求安,不得不违心表态,揭发检讨,以牺牲原则来求取平安,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道德、诚信、人性、人道主义、个人尊严,都被抛到九霄云外。这种屈从政治压力而舍弃道德的现象遍及全国,甚至连最高领导集团也不例外。在庐山会议上,与会者对彭德怀群起而攻之;“文革”期间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只有一个中央委员弃权——这些不都是屈服于专制主义而抛弃政治道德的典型事例吗?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是政治创伤最为深重,因而精神腐败、道德堕落也极为严重的社会阶层。由于指导思想上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知识分子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充当革命对象的角色,成为专制主义的殉难者。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把范围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送上专制主义的祭坛,导致这个本应成为民族脊梁的社会群体的整体堕落。作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他们在无法忍受的精神煎熬和肉体摧残之下,一点一点地放弃了曾经引以自豪的品格:独立精神、自尊自强、忠于理想,最后只能违心地承认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以自污自辱的谎言换取苟全性命的机会。至于那些被动员起来迫害他们的主力军,既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为了立功,有的是为了自保,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处心积虑地捕风捉影,吹毛求疵,吠影吠声,无限上纲,把别人推向灾难的深渊。政治运动召唤和诱发了同类相残的动物本性,把社会变成一个丧失理智、毫无人性的角斗场。它残害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但影响的却是整个社会,是社会道德的整体沦丧。

不但是历次政治运动,作为经济领域群众运动的“大跃进”对社会道德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各地各级党政组织竞相放“卫星”,虚报产量,牛皮吹得越大越能得到表扬提拔;实事求是地上报实际产量或虚报数量较少的则被批为“白旗”,受到批判斗争,撤职降级。此例一开,人

们群起效尤,弄虚作假成风。直到今天,此风仍长盛不衰。

由以上的简要回顾不难看出,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社会腐败、道德沦丧,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它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社会主义理念的惯性,人们生活上自我约束较严;另一方面,生产力极度低下,物资匮乏,贪污受贿的机会不多,加上没有贫富不均的现象,不致激起人心深处的贪欲,因而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较少出现。我们党领导人民粉碎“四人帮”后,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对恢复社会道德、克服精神腐败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思想解放运动只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在取得第一波的显著成果后便戛然而止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进一步批判和肃清“两个凡是”的专制主义根源,竟遭到不应有的遏制。因此,专制主义所酿造的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不但得以死灰复燃,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导致了全面的社会腐败。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指出的那些丑恶现象,从滥用权力、脱离群众到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几乎没有一种已经克服。目前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如邀功取宠、歌功颂德、假统计、假政绩层出不穷;买官卖官、贿赂成风;假话大话空话充斥报刊等等,都是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社会腐败在新形势下的继续与发展。

不受制约的特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所在

政治体制中的专制主义必然导致权力特殊化,使政治权力转化为特权。不受制约的特权是专制主义本质所在。特权可以随意扩张,随处运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多了,特权就成了可以换取物质财富的特殊商品。权力的异化导致改革的异化,导致经济领域的腐败,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特权成为掠夺人民财富的主要杠杆。如在某些国有企业,领导人仗恃特权,借改革之机化公为私,使企业蜕化为官有企业。他们或是把国有资财转移到自己

子女亲属的企业里,或是收受贿赂回扣,听任国有资产流失;有的企业发不出职工工资,厂长经理却依然吃喝嫖赌,肆意挥霍;有些企业管理者利用产权改革之机,上下其手,掠夺国家资产;有些企业把持垄断领域,垄断资源,控制价格,排斥民有经济,侵害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获取超经济的垄断利润;有些企业连年亏损,资不抵债,国家仍然继续贷款投资,把人民的血汗扔进无底洞。许多民有企业、三资企业更成了掌握各种特权的政府机关的追逐目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费,此去彼来的检查评比,愈演愈烈的赞助摊派,各种各样的收费站点,都利用手中的特权向企业伸手。十几年来,有权审批、检查、收费和向企业索要赞助的单位越来越多,审批、检查、收费、赞助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企业用于审批、检查、收费、赞助的费用更是越来越多,企业不堪负担。审批权是最为有利可图的商品,有些地方,企业从创办到在厂区内搭建一个简易厕所,都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而凡有审批的地方,往往是“雁过拔毛,人过破财。”经济体制改革所创造的大好形势,就这样被那些利用特权致富的贪渎官吏不断蛀蚀败坏着。在农村,基层干部仗恃特权对农民肆行勒索也是花样百出,愈演愈烈。有些地方对农民的专制压迫,已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一时期社会腐败的一个最大特色是权钱交易。在特权和金钱的交易中交易双方迅速致富,社会财富成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的囊中之物。腐败已成为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方式,于是,谋取权力、扩大权力以换得更多财富成了一时风尚。为什么一个又一个省的交通厅长因受贿而判刑?因为交通部门掌握着公路和交通设施建设的审批发包大权,是承包商追逐巴结的对象。近几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后,交通基本建设的大量投入,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广泛的可

能。其他握有审批大权的官员,如工商局长、国土管理局长、水利局长,甚至公安局长、反贪局长、组织部长,近几年都有不少落马判刑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和生产的正常秩序,在社会上破坏了诚信的优良传统,催化着、扩散着为攫取金钱而不择手段的恶劣风气。如:在政治舞台上卖官鬻爵、结党营私、争名夺利、弄虚作假;社会上唯利是图、欺诈成风、坑蒙拐骗、盗贼横行;经济活动中,走私贩私、制假售假、尔虞我诈,缺乏职业道德、服务态度恶劣的现象随处可见,甚至有些不甘堕落的工商业者也被迫走上贿赂的邪路;在学术文化领域则出现了剽窃学术成果、假文凭泛滥等不良现象。腐败已经全面地浸透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只有消除特权,肃清特权所由以诞育的专制主义,才能釜底抽薪,根绝腐败。

政治民主化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佳手段

事实非常清楚,封建专制主义和由它引发的种种腐败,是当前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罪魁祸首,是我们迈向社会主义的最大的绊脚石。因此,改革政治体制必须以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为首要任务。离开肃清封建专制主义而侈谈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舍本逐末,于事无补,而且实际上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期间与杨尚昆等一起植树

掩盖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存在,贻患无穷。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民经济正在日益溶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个趋势要求我们彻底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就使肃清政治体制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显得更为迫切。

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化。民主是反封建的强大武器,这一点已经为欧洲几百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所证实。今天它同样也可以成为我国批判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工具。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也是为社会主义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利剑。但民主必须以法治作为必不可少的补充。法治是民主的制度成果,也是民主的可靠保障。民主与法治互为表里,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是民主的社会,也是法治的社会。没有法治而奉行人治的民主,往往成为专制的遮羞布,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社会;没有民主的法治则是独裁者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社会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法治才能发挥多大程度的作用。我国宪法里规定的种种自由迄今得不到充分实现,就是民主不足反映。

民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它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是否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掌握国家主权,却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严格限制。马克思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马恩全集》第3卷第507页)他还指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同上第19卷第264页)自由是这样,民主也是这样。作为一种社会理念,自由和民主都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没有什么阶级性。但它们的实现程度,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工具和技术先进程度和人的文化素质等)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换句话说,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和阶级状况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实现的。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同上第19卷第22页)从民主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是国家和私有财产出现之后,有产者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

而采取的相对于专制的政治形式。作为国家制度,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都是为了维护有产者的财产所有权而设置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在专制制度下,国家权力为君主独裁者所垄断;在民主制度下,国家权力来自有产的社会成员的授予。如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就是有产者的民主,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奴隶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即使是有产者,他们的民主权利也因占有财产多少不同而有所不同。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者梭伦的所谓政治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公民按照地产收入分为四个阶级;不同的阶级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不同。迄今为止,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虽然比起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制度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本质上仍没有脱离梭伦民主的范围。在私有制社会里,民主始终是有产者的民主,富翁比贫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无产者即使享有一定的民主权利,往往也是不巩固的,不持久的。在已经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选举时人各一票,但富人和穷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则大不相同。富有的阶级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影响立法和决策,贫穷的公民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富有者的利益经常受到政府的关注,贫民的利益只有在选举之前才被参与竞选者顾及。

过去有许多文章都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骗人的,这个断语至少是不准确的。自由民主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它们首先由资产阶级提出是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当资产阶级高举自由民主平等的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冲击的时候,他们代表着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发展方向。但在摧毁封建君主制度,取得政治统治的权力之后,他们却把自由民主限制在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范围之内,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权利则遭到漠视或践踏。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自由民主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不存在谁欺骗谁的问题。自由民主既不能超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也不能越过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范围。但是,在这个历史条件所容许的范围内,人民的民主自由仍有着广泛的扩大余地。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民主权利也不断有所扩大。以普选权为例,法国大

革命后召开的制宪会议，把人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在 2600 万人口中，只有大约 400 万能够交纳白银直接税的人才享有选举权。雅各宾专政时期曾一度实行凡是年满 21 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但很快就被督政府废除，《1792 年宪法》仍规定只有交纳高额税款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后来在 1848 年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1848 年 11 月 12 日发布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才确定了普选权原则，制宪会议代表由普选产生。在英国，19 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宪章运动，其第一条纲领就是要求实现普选权。经过 1867 年和 1884 年的选举改革，直到 1918 年才终于实现比较彻底的普选权。美国国会 1920 年 8 月批准第 19 条宪法修正案，使全国范围的妇女都获得选举权，从 1957 年到 1968 年，国会通过 5 次民权立法或宪法修正案，保障黑人和未纳税人的选举权。从民主在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我们不难预测，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工人阶级的进一步有产化，将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自由民主程度。

列宁曾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毛泽东也说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大多数人民主，对少数人专政；邓小平则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们都把民主列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都没有把民主和生产资料所有权联系起来，没有把民主本质上是有产者的民主这点说清楚。所谓大多数人的民主，应当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就是大多数人已成为有产者。当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是无产者的时候，民主不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就像“全民所有制”并不表示全民都是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所有者一样，侈谈“大多数人的民主”，也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确实已经享有民主，即使在民主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或“人民”的词藻，也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其实，民主本身并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之分，只是在不同的社会里实现程度不同罢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不是什么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应当是全民的民主，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也是全体公民都是有产者的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全体公民都在公有产业中享有一份属于自己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样的社会离我们还很远，因而实现全民民

主的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现实的，但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此，我们在争取实现劳动人民有产化的同时，也完全有理由有必要争取实现以全民民主为发展方向的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不仅意味着公民选举权，而且也包涵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对立法和决策的影响，包涵政权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实现民主的这些基本要求，就为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并防止它卷土重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些要求远没有实现的时候，就谈不上政治民主。有些文章认为我们当前的政治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问题只在于如何扩大这个社会主义民主，那就显得过于不实了。

简短的结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如果从 1894 年兴中会成立时算起，已经 111 年了。一百多年来，为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演出了多少可歌可泣、悲壮激烈的历史剧。当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呼唤的时候，他未必会预见到，在他离开人世已经整整 80 年的今天，封建专制主义仍然能以如此猖獗的形式，如此普遍地继续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以致继承他的事业的后人不得不再次重复他的呼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以政府的权力制衡和公民的广泛参与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是克服以至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只有借助于这个武器，才能实现孙中山在 80 年前所发出的呼吁，和邓小平 25 年前提出的诉求，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我相信，只要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和广大公民，都能认识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理解完成民主革命的时代意义，共同肩负起这个巨大的历史使命，持之以恒，努力推进，我们就可以在告别落后、告别愚昧的同时，告别封建专制主义，告慰革命先烈的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 杜 晋）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即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国策;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这些深得民心、与时俱进的治国主张,给我
国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和更高要求。但是宣传思想战线上的从业人员,对于如何承担新形势下的历史任务,如何向这一更高的要求迈进,认识看来并不很一致。有时媒体甚至借“构建和谐社会”之名,假“正面宣传”之势,重新强调“报喜不报忧”的不合时宜的老做法,只拣好的看、好的听、好的说,还美其名曰与党中央的要求保持一致。事实上,这种做法是对党的宣传思想战线的方针政策的曲解。过去不对,现在就更不对了。

其一,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后,就不是一味地关心高兴的事,倒是常常专拣烦心的事研究。比如,“非典”、“三农”问题、污染、圈地、失业、安全、严惩腐败等,甚至连拖欠民工兄弟的工资也是总书记和总理办公桌上重要的事情。

中央现任领导人下去视察,不仅轻车简从,还中途改变路线,专挑穷的地方跑,差的方面看。这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领导明白“成绩不说跑不掉,问题不说不得了”的理,既然“以人为本”,你关心看起来歌舞升平的高兴的事多了,老百姓就不高兴了。既然从总书记到总理都认为关心烦心的事不会妨碍构建和谐社会国策的实现,媒体还有什么理由要继续强调“报喜不报忧”,甚至这也不准见报,那也不准见报呢?

其二,一些媒体的这种想法、做法,也不符合现在宣传思想领导部门的指示。6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第二版,以头条、大字标题,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在江苏省就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进行调研时的重要讲话。醒目的标题是:《宣

也谈『包容多样』

● 余广人

传思想战线:要以人为本包容多样》。刘云山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用和谐的理念看待事物、处理问题,把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和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统一起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平等交流、民主讨论,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体察群众疾苦,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在服务群众中引导群众,使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

刘云山同志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宣传思想战线的从业人员的工作目标:必须“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不但“要用和谐的理念看待事物、处理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所谓“尊重差异”,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从业人员,不能眼睛只盯着高兴的事,看不到不高兴的事,或者说看到不高兴的事也熟视无睹而片面地正面宣传。因为从全社会来说,“差异”是广泛存在的。而所谓“包容多样”,从浅层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张报纸既要“报喜”,又要“报忧”,说点真话,说点不同意见也没有什么不妥。对此,也要宽容、宽大、宽厚。从深层意义上来说,这是对长期以来在一些人心目中形成的“斗、斗、斗”、“绝对一致”的陈旧观念的最有力的否定。

现在,既然党在宣传思想战线的最高机构的领导同志鲜明提出了要“包容”而不是压制“多样”的号召,那些仍然过分强调什么事都要绝对一致的同志,是否也应该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呢?况且,要不要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还是一个纪律问题。

“天天向上”的任仲夷

● 范敬宜

任仲夷同志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先驱人物。他在辽宁、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他满腔热情地支持改革开放事业的事迹,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传为美谈。他同时又大力支持新闻媒体大胆、积极开展改革开放的宣传,这方面的情况却知者不多。笔者当时是《辽宁日报》的一名工作人员,感受极深。二十多年来一直历历在目,未能忘怀。

力排众议,为记者仗义执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仲夷同志对这一重大战略思想领会特别深刻。他1977年到辽宁不久,就提出“农村抓富”的口号,并在全省发动一场“要不要富、敢不敢富、能不能富、怎么样富”的大讨论。作为辽宁省委机关报,《辽宁日报》在总编辑赵卓同志的组织策划下,把这场讨论报道得声势浩大,有声有色。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抓富活动的深入开展,而且产生了全国影响。

当时,我刚结束十年下放的生活,回到《辽宁日报》农村部工作,躬逢其盛,自然也全身心地投入这项报道。可是事隔不久,到了1979年初,在全国出现了一阵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倒春寒”。一时“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诱发了资本主义势力泛滥”之类的声音甚嚣尘上,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为了批驳这种错误思潮,我在报社领导支持下,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一篇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农村形势述评,发表在5月13日《辽宁日报》上。三天之后,《人民日报》又在二版头条位置全文转

载了这篇述评,并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予以肯定和支持,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做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对于我这样一个久经磨难、刚刚走出厄运的人来说,党中央机关报这样的热情支持,无疑是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但是事后我才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一文见报的当天,适逢辽宁省委召开二级干部会议,不少干部看了报纸纷纷议论:“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如此猖獗,还说是没有过头,纯粹是胡说八道!”“范敬宜这个右派还没有当够!”大有要把我“老账新账一齐算”之势。就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同志在会上力排众议,仗义执言:“我完全赞成范敬宜这位记者的观点,而且我认为文章的标题还应该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会后,他亲自跑到《辽宁日报》社,要见一见“这个记者”,实际上是来为我“打气”。遗憾的是这一天我正好下乡采访,没能见面。任仲夷同志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把我从困境中彻底解脱了出来。

“公私仓廩俱丰实”才是真富

从那以后,任仲夷同志多次让我随他下去视察,更多地了解省委的意图。1981年大年初一清早,他的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我随任书记下乡给“专业户”拜年。当时,农村的专业户刚刚出现,社会上议论很多,许多人认为专业户是一种“资本主义倾向”,是产生“两极分化”的温床。任仲夷同志去给他们拜年,目的是为他们正名,给他

们吃“定心丸”。

在这之前,任仲夷同志针对社会上认为“抓富已经抓过头了”的议论,一再强调:“抓富只是开头,富了还要再富”,“我们提倡的富,是不搞剥削、勤劳致富、共同致富的富,是三者利益一致,当前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富,是遵循党的政策、不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富”。他认为农村专业户(包括养鸡、养猪、养花等等)的出现,是农村体制改变以后发展商品经济的必然趋势,党和政府应当因势利导,做他们的促进派。

那天,我们来到沈阳市苏家屯一家多种经营专业户拜年。在听完汇报后,他在车上对我说了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历史上所有的盛世,都是因为政府实行了鼓励老百姓致富的政策。唐代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描绘开元盛世景象:‘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你看,只有国家和个人都富裕起来,才是真富,才能称得上太平盛世。我们共产党人的眼光,难道可以不如封建时代的文人吗?”

我当时心里明白,他也是在“点拨”我。因为他可能发现我对农村开始富裕起来后出现的某些新问题产生某种疑虑。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不久前,他到营口市参加一个大队干部会议。那年营口市农村人均收入达到200元,人们都认为已经富到了顶,不可能再富了。他就在会上说:“200元就到顶了?我相信,只要坚持这样干下去,三年以后完全可以达到500元。”当时在会场引起一阵哄笑。任仲夷同志大声说:“你们笑什么?你们的笑不是好笑,是被我吓笑了。500元算什么,你们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能真富起来吗?”

我对任仲夷同志说:“等到营口市农村人均达到500元那一天,我一定写一篇报道,把您这个情节写进去。”三年后,营口市农村果然达到了任仲夷同志要求的目标。但是,他已去了广东,我也调到了北京。于是,我履行诺言,写了一篇通讯《在当年被“吓笑”过的地方》,并把报纸寄给他看。他非常高兴地给我写了回信。

一定要体谅新闻媒体的难处

任仲夷同志非常重视新闻工作者,也非常体

谅新闻工作者。有一件事情使我终身难忘。

农村致富大讨论开始之初,任仲夷同志在省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做了一个重要论断: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在取得政权之前,是要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由奴变主”;在取得政权之后,是要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由穷变富”。

记者在写这篇会议报道时犯了踌躇:历来对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怎样表述的:领导党员和广大群众向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现在怎么能说主要是领导他们“由穷变富”呢?记者担心这样的提法会犯“原则性错误”。报社农村部的同志考虑再三,也觉得不大好把握,但这又是省委第一书记经过深思熟虑的重要讲话,不敢擅动,最后商量出一个“淡化处理”办法:新闻不作突出处理,不上一版头条,放在一版中间,那两句话也不在标题中出现。这条新闻见报后一直未见任仲夷同志提出任何意见,我们便以为他已默许。直到十多年后,我在广州见到任仲夷同志,闲谈中我提起这件旧事,说明自己当年思想不够解放,他才恍然大悟说:“哎呀,当时我真有点不满意,想打电话问问你们,后来想想你们也许有为难之处,算了吧!你要不说,我至今还蒙在鼓里呢!”

权重一时的省委第一书记,能够如此宽容,处处为媒体着想,实在令人感动。

“记者是我的主要信息来源”

任仲夷同志经常说:“我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业务部门,一个是新闻媒体。许多事实证明,媒体提供的信息往往更真实、更生动。”

正因为如此,他多次轻车简从来到《辽宁日报》报社,找几个编辑记者聊天,借此了解一些情况,也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在他面前,大家都能毫无顾忌,畅所欲言,双方都有收获。

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个有趣场面:有一天,大概是“清除精神污染”期间,任仲夷忽然来到报社,找了五六位部主任、编辑座谈。会上有一位同志向他反映:现在有些幼儿园的老师,教孩子唱一些不健康的爱情歌曲,如《我有一颗火热的心》,这样会污染儿童的心灵。

任仲夷同志听到这里,立刻插话说:“你讲

的情况只能说明现在的好儿歌太少,不能说是精神污染。两三岁的儿童懂什么爱不爱的,不过是跟着阿姨唱就是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托儿所还教孩子唱《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哩,你能说他们唱了就懂政策和策略吗?”

那位同志继续反映:现在部队里有些刚入伍的新兵,感情脆弱,一边洗衣服一边流着眼泪哼唱《再见吧,妈妈》。这样会涣散军心。任仲夷同志听了立刻站起来,很动情地说:“同志啊,人是有感情的。解放军也是人呀,十几岁的娃娃刚刚离开家,想妈妈是人之常情。出操当然应该唱‘雄赳赳,气昂昂’,洗衣服时唱唱《再见吧,妈妈》未尝不可。难道你就不希望儿子想你吗?”

他就是这样,善于在谈笑之中,用富有人情味的通俗语言,说明一些理论、原则问题,解开人们的思想疙瘩。

“马克思是怎么讲的?”

大概是1982年,大连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演员在台上拿着麦克风边走边唱,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因此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有的报纸连续批评这是“港台资产阶级腐朽台风”,还为此写了内参。大连在辽宁,辽宁当然很紧张。作为辽宁省委的机关报,《辽宁日报》是否也应该呼应?总编辑赵阜同志就让我去向任仲夷同志请示。

记得那天下午,任仲夷同志在办公室里听完我的汇报,沉默了半晌,忽然很认真地问我:“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讲的?”

一下子我被“将”住了,只好回答:“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既然‘老祖宗’都没有讲过站着唱是无产阶级的,走着唱是资产阶级的,叫我怎么表态呀?”

接着,他很严肃地说:“我认为,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只有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

“那我们报纸怎么办呢?”我有点着急了。

任仲夷同志笑笑说:“那是你们总编辑考虑的问题。”

说实在话,我回到报社以后,没敢原原本本

传达任仲夷的原话,只是说了大意,把最尖锐的部分“贪污”了。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话太“超前”了,至少十年以后才证明他的见解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

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是永远有自己独特的表达风格:寓真理于诙谐之中,让听者自己去思考,去判断。正如司马迁说的:“微言谈中,亦足以解颐。”

“对少先队员只能说‘天天向上!’”

现在,任仲夷同志已经九十高龄了。虽然身体已不如前,但头脑活跃如故,思维超前如故,幽默乐观如故。每当有人问起他的健康状况时,他总是笑着回答:“我的一只眼睛已失明——一目了然了;一只耳朵已失聪——偏听不偏信了;一个胃已经切除一半,无所谓(胃)了;一个胆也已摘除,变得浑身是胆了。”这种对生命的乐观态度,真是少见。

党的十五大召开,任仲夷同志以八十多岁高龄当选代表前来参加会议,这是绝无仅有的特例。他下飞机后首先来到《人民日报》报社,想看看我和参加大会报道的记者。当他离开报社时,时任总编室主任的江绍高同志(现在副总编辑)说了一句:“祝任老健康长寿!”不料任仲夷同志突然停止脚步,正色说道:“你这话说得不好!”大家都愣住了,问他为什么。他说:“凡是被人说健康长寿的,都说明他快要‘差不多’了。哪有对少先队员说‘健康长寿’的呀?对少先队员只能说‘天天向上’嘛!”说罢,他立正举手行了个少先队礼。

几年后,在广州开会的一次晚宴上,人们要我来说几句祝酒词。我就讲了这个情节,立刻全场欢跃,纷纷举杯,响起一片“天天向上”声。

确实,没有比“天天向上”更能生动逼真地传达任仲夷同志的精神状态和精神世界,更能表达对这位可敬可爱的“超龄少先队员”的敬慕了。

(责任编辑 萧 徐)

邓小平岳西反“左”

● 王传代

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03页,有段文字读来令我们岳西人特别深思与怀念。文曰:

杀人问题。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我们到大别山以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过去张国焘就犯了乱杀人的错误。这次,岳西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在一个乡杀了很多,影响到附近几个乡的工作都垮了。有些被杀的所谓狗腿子,十有八九是穷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有些群众讨论杀人问题时,一面举着手,一面低着头,散了会没走到家就失悔。说明错杀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

总起来说,在土地会议以前,右的情况很严重。今天,从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倾向,但不是主要的。

邓小平的这段文字的背景是:1947年夏秋,刘伯承、邓小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称二野)一、二、三、六等四个纵队共12万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以风卷残云、锐不可挡之势,粉碎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先后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淮河等重重障碍,连克十几座县城,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终于在8月底先后进入大别山区。9月19日,刘邓大军三纵教导团、20团由纵队副司令员郑国仲率领,在原坚持岳西游击斗争的皖西支队的配合下,由舒城出发,一举攻克岳西县城,解放岳西县。

刘邓大军解放岳西县城之后,三纵司令部和皖西区党委进驻汤池畈,将随军工作团成员分配到地方,结合原坚持岳西游击斗争的干部,重新组建中共岳西县委,成立岳西县爱国民主政府和

县大队。同时把岳西县划为衙前、五河、河图、河口、主簿5个区,分别向每个区派出工作组,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分浮财、分田地,在运动中成立农会。岳西县委派往河图区的工作组组长张殿奎,河南人,地主家庭出身,原为刘邓大军随军工作团成员,带领工作组进驻河图区开展工作。张殿奎由于出身不好,为了显示自己立场坚定,工作中施行极“左”政策,动辄杀人。9月下旬,在店前下街一次杀害12人,并带走12人到五河沙村枪杀。10月,在店前河东上角沙湾一次杀害7人。12月中旬,在河东河口关押51人,除程小初(时年16岁)、胡裕启两人被保出外,49人全部被杀害,其中胡柱三一家四人被杀。当时河图区前后被杀害的就达200余人。大多数是农民、商人、学生,少数是地主、恶霸、狗腿子、地富子弟和曾任过国民党乡、保长人员。

工作组杀人最多的是河图区,其次是主簿区,其它三个区也有乱杀人现象。当时乱杀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工作组太“左”,大开杀戒;二是孬子掌权,点头杀人;三是以公报私,乱杀无辜;四是主犯不在家,杀其家属;五是说杀就杀,不论罪行,感情用事。

张殿奎在河图区施行极“左”政策乱杀人,当地人民惶恐不安,见到解放军和工作组人员就逃,致使地方工作无法开展。事件很快涉及周边地区,农会分田分地无人要;有些苦大仇深的农会会员也对共产党丧失信心,被迫叛变,与地主相勾结,谋杀共产党工作组成员。五河、河口、衙前、主簿等区的刘烈、肖丙毋、肖三庭、秦斌等20多位区级干部被谋杀,全县乡村干部被杀的达105人,还有大批群众被杀害。

面对农会反水、工作组遭殃的事实,中共岳西县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是由于警惕性不高,麻痹大意,眼不明,手不快,以致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失,只有“先下手为强”。于是全县正反两方面的杀人事件愈演愈烈,加之国民党政府军队和还乡团武装反攻倒算,国共双方在岳西进行了频繁的拉锯战,岳西人民又处在腥风血雨的战乱之中。

1948年1月,中共皖西区委了解此情后,立即给一地委(下辖岳西、太湖、宿松、潜山、怀宁等县)发出指示信,指出岳西乱杀人的错误,并告诫不可重复历史上过“左”过右的错误。同年3月,中共皖西区党委针对当时被动形势,发出“赔偿中农”、“赔偿工商业”、“赔偿敌区被搞错的对象”、“改善军民关系”、“争取地富和俘虏”等五项纠正“左”倾政策的指示。遵照区党委的指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卢仁灿亲自处理岳西乱杀人事件。地委在河图区南庄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制止镇反扩大化,枪毙张殿奎,以平民愤。会后书写张殿奎的罪状,四处张贴,将张殿奎捆绑游乡示众,后在店前六邑中学召开公判大会,宣布张的犯罪事实,尔后当众枪毙。张殿奎临死时才恢复了人性,向组织承认自己该杀,唯一的要求是请组织上抚养他河南家中的老母亲。

处决张殿奎,大快人心事,从而消除了岳西人民的恐慌心理,密切了军民关系。事件虽然发生在岳西,而及时纠正极“左”事态发展的决策者却是置身于大别山前方指挥所、领导大别山的内线坚持游击战争的邓小平。当时中共皖西区党委给一地委指示信处理张殿奎事件,是根据邓小平的纠左思想作出决策的。

据时间推测,处理张殿奎事件,邓小平、李先念正在金(寨)麻(城)边境检查工作。在检查工作中他们发现当地在土改时陆续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打击地、富过程中,侵犯了中农利益,有的地区把一部分中农作“土豪”来打,分地、富浮财时,不少中农的财物也被分掉。各地分财物,一般只有少数积极分子敢要,而多数基本群众则不敢要,或只敢要弱小地、富的财产。有的白天勉强接受,夜晚又返还地、富。有的明的分田,背后却同地、富保持租佃关系。一些地痞流氓利用外来干部不了解当地情况冒充“积极分子”,霸占斗争果实,

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此外,有些地方还发生了破坏城镇工商业和乱捉人、乱杀人问题。结果,使党在政治上蒙受损失,给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是政策上发生了‘左’的偏差,必须纠正。”邓小平、李先念当即将此情况进行通报,并指示“各区严重注意”。

1948年1月30日,邓小平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题为《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策略问题》的综合报告,2月8日又向中央写了题为《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并建议:在新区我们没有牢固地站住脚以前,不宜搞土改,应采取适合新区实际情况的稳妥政策,具体措施就是在新区实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政策。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上述两个报告给予充分肯定,毛主席在报告上作出批示:

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希望你对你处能联络的同志或骑马能送信的同志或当面接洽的同志,将你所提的那些策略观点、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3月,中原局在宋集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作报告,再次总结了经验教训,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应该做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

宋集会议后,大别山两个新解放区坚持贯彻党中央和中原局关于新区工作的指导方针、政策与策略,相继开展了纠正“左”的错误工作,停止了土改,纠正了乱分、乱打(杀)、乱没收的做法。

4月25日,中原局在河南鲁山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在贯彻中央提出的五个问题时,就以岳西出现的乱杀人事件为例告诫中原的干部(即文章的开头那段文字),报告中“岳西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即张殿奎,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岳西乱杀人事件的高度重视。正是从这个事件中,邓小平引发对全国政策主要倾向是“左”的认识。这一认识不仅对当时解放区纠正农村极“左”政策,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30年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时,邓小平的“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一贯思想在中国发展中也具有重要意义。(责任编辑 萧 徐)

诺门罕战争：日本第一次惨败

● 杨大卫

诺门罕是位于内蒙呼伦贝尔盟与外蒙之间的一片半草原半沙漠的荒原，旧译“诺门坎”。1939年5月至9月，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军与苏、蒙军几十万人，在这块不毛之地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此战双方调用了除海军以外的所有兵种和现役装备，尽出主力大动干戈，以关东军惨败而告终，日本陆军省被迫承认“诺门罕之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首次惨败”。

不过此役后人提及甚少，诺门罕战后，苏联深陷欧洲战场，此战很快被湮没于浩瀚的卫国战争重大战役中，鲜有提及；日本在国力、军力强盛之时，尽占天时地利攻击苏联，不料关东军险些蚀光了老本，自然更不愿宣讲；伪满洲国二战后灰飞烟灭，残渣余孽作鸟兽散，也无多少记录；蒙古虽称此役为建国后惟一战，但宣传有限、影响不大。因此，诺门罕战争世人知之不多，国内有关此战的研究和公开出版物更不多见。2005年5月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国内第一部从日本、苏联、中国多角度透析诺门罕战争的纪实图书——《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

一根小小的导火索引燃了早已埋好的炸药——诺门罕战争揭开了序幕

诺门罕之战是在双方有所准备但都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匆忙打响的。1936年6月，日本《帝国国防方针》把苏联列为了第一敌对国，并悄悄着手战争准备。8月，日本制定了或北进苏联、或南下南洋的《国策基准》，紧接着又与德国签订

了《德日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极为亢奋的日本认为有纳粹德国在欧洲帮忙，可以放手在远东大干一场了，诺门罕处在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平静之中。

但斯大林并没有睡着，1938年10月，远东红军第57军更换完新装备开入蒙古。作战对象直指海拉尔的日军第23师团。这个师团以好战和擅长进攻而著名，师团长小松原长期为日本驻苏联大使馆的武官，是日本陆军中为数不多的“苏联通”，关东军的用心路人皆知。

1939年5月，“满”蒙在哈拉哈河畔意外地发生了一次小冲突，关东军将领们闻之欣喜若狂。经过多年精心培育的战争种子，终于在“满”蒙边境破土而出，关东军司令部指示23师团立即扩大战事，出兵诺门罕。诺门罕战争的进程如同战后一个日本老兵形象的回忆：“当时日本就像是一个半大小子，舞舞扎扎地向（哈拉哈河）河畔的俄国彪形大汉频频挑衅，最后大汉恼火了，一拳将毛小子揍到河里。”

第一次诺门罕之战关东军吃了个“窝心拳”

开战伊始，东京认为“大肃反”后的苏军已不足为虑，狂妄地宣称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对付苏军3个师。关东军各部队好战情绪被激发起来，据战后日军心理机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参战的日本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90%以上的军官对苏军情况一无所知，却毫无理由地轻视对手。”当时日军整个处在一种病态的“亢奋”中，蠢蠢欲动。

1939年5月27日,日军向苏蒙军发起攻击,第23师团骑兵联队和重装甲车部队虽包抄奇袭蒙军指挥部得手,但很快被苏军坦克包围,一交手,关东军便尝到了苏军的厉害,日军的重装甲车比铁皮罐头厚不了多少,根本不是苏军坦克的对手,一会儿便被打成零件状态;日本骑兵面对苏军这些横冲直撞的“钢铁怪兽”束手无策,只好绝望地挥舞着马刀,砍得装甲丁当乱响。苏蒙军1个喷火坦克连和装甲车营轻而易举地全歼了日军这股快速部队。正面进攻的日军也没好到哪儿去,被苏军密集的炮火打得丢盔卸甲、损伤过半,灰溜溜地撤回了海拉尔。

关东军擦拳摩掌半天,没想到上来就吃了个窝心拳,小松原中将为轻率出击感到一阵后怕,只好丧事当成喜事办,悄悄地咽下了这颗苦果准备再战。

亚洲史上第一次坦克大战——第二次诺门罕之战

6月20日,第23师团全体出动,小松原带着2万多人浩浩荡荡地向诺门罕进发了,同时出动的还有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7师团主力,这个师团在日军中牌子硬,名气大,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双料王牌,被公认是日军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1939年7月,《纽约时报》这样评价道:“日本第7师团的士兵们在齐齐哈尔附近尘土飞扬的草原上长期接受高强度训练,主要集中于三种日军所重视的技能:刺杀、射击和冲锋。他们反复练习肉搏战,这是一支最精锐的部队。其官兵据说全来自北海道,那地方被认为盛产顽强和冷静的武士。”

被誉为“国宝”的第1坦克师团是全

日本当时仅有的一个坦克师,从来就没舍得用过,这次也上了前线;关东军航空兵主力倾巢出动飞抵海拉尔机场。为了第二次诺门罕之战,关东军动了老本。可令东京想不到的是,此刻他们的对手已换成了苏军一代名将——坦克战专家朱可夫!在广阔的大草原上跟朱可夫玩大兵团作战,小松原等人就有些小儿科了。

日军的计划是步兵主力渡河迂回包抄,坦克师团正面强攻,但坦克攻击并不顺利,从7月1日起,第1坦克师团的多次冲锋都无功而返,苏军顽强地把守着河东岸阵地。只有7月3日晚,第4坦克联队利用大雨掩护和苏军的麻痹,奔袭苏军第36摩步师重炮阵地侥幸得手。从战术意义上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奇袭,这也是日军坦克部队在整个诺门罕战争中惟一的一次胜利。

7月4日,苏军将偷渡过河的关东军步兵主力击溃后,朱可夫将军开始腾出手来收拾正面的日军坦克,苏军两个坦克旅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冲入日军战车群中。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近千辆各型战车相互厮杀,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烟尘弥漫,亚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会战开始了。苏军的T-28、T-26、T-130、BT-6、BT-7坦克和BA-6、BA-10装甲车等各型现役战车相互配合,简直把诺门罕当成了新武器实验场,打得日军八九式坦克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日军坦



关东军在草原上行军,这些骄横的侵略者大部分葬身于诺门罕

克和装甲车,很快变成了一堆堆冒着黑烟的钢铁垃圾。此战之后,日军坦克部队基本瘫痪了。安冈坦克师团的溃败极大震动了东京,认为造价昂贵的坦克不宜再用。其实有一点不好明说,用士兵组成“肉弹”攻击简单、便宜,还能体现日军的“勇敢”。

朱可夫将军战后这样评价日军坦克部队:“坦克非常落后,基本战术动作也很呆板,死盯着迂回和侧击这一种办法,很容易被消灭。”整体上看,日军坦克部队在整个二战期间既无战术也无技术。

在正面鏖战的同时,关东军航空兵出动了三个旅团奔袭了苏联的塔木斯克机场,这是亚洲空战史上第一次大机群成功突袭敌方机场,战术上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苏军前线飞机损失大半,一时丧失了制空权。不过,苏军新型的伊-16战斗机投入战斗后,很快夺回了制空权,苏联空军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双机进攻队形,首日交锋使用火箭弹将6架日机打得凌空爆炸。苏联空军英雄斯克巴里欣甚至创造了正面撞毁敌机自己却安全降落的奇迹,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多个王牌被陆续击落后,关东军的飞机更多时间是呆在地面上。

这期间,日军还卑鄙地动用了石井部队,(即臭名昭著的七三一细菌部队)秘密向哈拉哈

河投放了鼠疫、鼻疽等烈性传染病菌,由于苏蒙军的饮用水来自后方铺设的输水管,所幸没有大的伤亡,日军虽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还是有不少士兵在极度干渴下偷偷喝了河水,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战后日本关东军军医部统计,整个作战期间前线共有1173人因病因不明死亡,关东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肉弹”没顶住炮弹——第三次诺门罕之战

第二次诺门罕之战打响不到半个月,关东军损兵折将已近万人,坦克、装甲车、飞机、野战炮等技术兵器损毁过半,日军隐隐感到苏军并不像东京所想的那么好对付,于是破釜沉舟,决定动用珍藏的远程重炮部队。7月15日,关东军驻满洲各地的炮兵联队纷纷忙碌起来(包括驻旅顺的守备炮兵),重型履带牵引车吭吭哧哧地将一门门炮管硕长的加农炮从洞库中拖拽出来,关东军拿出了全部家底。

7月23日,日军大口径火炮一起开了火,整个诺门罕战场火光冲天,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炮击,据记载为日本陆军史上首次,关东军这次要砸锅卖铁拼老命了。不过日本炮兵从未受过超远程射击训练,也从未经历过饱和射击,虽打得

热火朝天,但前沿传回消息说效果并不好,精度尤为不够。战至中午,炮群一口气打出了近万发炮弹,这种消耗在日军战史上是惊人的,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几天关东军就得破产。更令关东军恼火的是重炮相继发生故障,多门重炮炮架折断,炮身过热、膛炸、炮管烧蚀等事故层出不穷。

下午,转移到新阵地上的苏军炮群开始反击,大量炮弹发出令人恐惧的呼啸声,暴风骤雨般砸在了日军炮兵阵地上,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面对苏军排山倒



《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出版座谈会

海般的打击,日军还击的火力近乎于呻吟,步兵甚至请求旁边的炮兵千万不要还击,以免招来更猛烈的打击。日军记载:“苏军的还击远远超出预料,密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从未见过的,阵地被黑云一般的烟尘覆盖,能见度只有两三米,浓烟遮住了视线,到处是伤员、尸体和损毁的兵器,无一处完好的炮位。”炮战延续了三天,日军已毫无还手之力,骄横的日军垂下了头,炮兵决战又输了。

既然空、坦、炮方面接连失败,日军只好又回到步兵“猪突冲锋”——即像野猪一样不顾一切低头猛冲的老路上,这是日俄战争时的老套路。入夜后,数万名日本步兵一起冲出了掩体,端着刺刀呐喊着发起了集团冲锋。一时间日军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响彻了整个诺门罕夜空,令人毛骨悚然。月光下,几万把闪亮的刺刀明晃晃地折射出一股凶残的杀气,关东军的眼睛都红了。

当日军冲到苏军阵地前沿时,苏军突然打开了车载探照灯,几千发照明弹也先后升空,暴露在强光下的日军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就成片成片地被打倒了。在指挥官带领下,日军继续不顾死活地冲锋。多年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使日军普遍有一种亡命徒似的作风,但亡命徒式的勇敢并不能改变其失败的命运。据战后统计,关东军连续几次大规模夜袭作战,共伤亡5000多人;苏军仅阵亡263人,防线后缩2—3公里。观战的德国武官目睹了日军这些疯狂的举动后,瞠目结舌,给国内发回的报告中称日军的战术水平至多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

横扫千军如卷席——朱可夫的反击

诺门罕的战事持续了3个多月,日军虽一再受挫,却丝毫没有退意,一切迹象表明,继续防御无法遏止日军的疯狂意图,连续的胜利使苏军士气高涨,该大反攻了。苏军总参谋部决定总攻时间为8月20日(星期天),因为按照惯例,日军前沿部队的军官有半数要轮流到海拉尔去休假。进攻的命令20日凌晨2点45分传达到一线连队,



《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封面

对面日军阵地一片沉寂,苏军反攻做到了最大的突然性。

总攻第二天,苏军两翼包抄的装甲部队顺利会师,完成了对日军的分割包围。同时,强大的炮火和密集的轰炸将日军所有前沿炮兵阵地、观测所、通讯站完全摧毁。第203伞兵旅突袭敌后,成功地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日军已成瓮中之鳖。东京不肯认输,怎么也不愿相信堂堂的“大日本皇军”会失败,命令部队立刻反击,不能坐以待毙。(从总体上说,日本军队的作风二战时期应该算顽强的。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几乎没有成建制缴枪的部队,这是日军惟一可以标榜的一点资本。)

8月24日凌晨,反攻部队纷纷从坍塌的工事中爬了出来,等日军完全脱离了阵地之后,苏军的炮火铺天盖地般打了过去,无处躲藏的日军伤亡惨重。一天的反击中,日军仅仅前进了不足两公里,但伤亡却是可怕的。有些地方尸体多得摞在了一起,让人无处下脚。日本战史记载:左翼进攻部队只剩下7名军官和87名士兵,旅团长

小林少将右腿被打断,险些让人踩死;右翼进攻部队中了苏军埋伏,森田彻大佐率队冲锋被打成了“筛子”。关东军的疯狂反击失败后,防线全线崩溃,苏军追击到将军庙一线停了下来,歼灭关东军主力目的已基本达到,斯大林不想在远东引发苏日大战。

诺门罕前线的日军最后只剩下400余人,建制跑出来的只有骑兵联队百十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辞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切腹自杀,参谋长冈本双腿被打断,后来这位大佐在海拉尔医院治疗时,不知怎么惹恼了伤兵,被人用刀活活地砍死在病床上。整个诺门罕战争期间日军损失了近50000人,步兵第23师团、第7师团、第8国境守备队(旅团)、第1独立守备队(旅团)和第1坦克师团几乎损失殆尽,11个特种兵联队彻底丧失了战斗力。高级军官的伤亡也是空前的,日本报纸哀叹:“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的伤亡是日俄战争后从未有过的”。

9月3日,关东军停止了一切战斗行动。东京肯罢战的原因一方面前线已无可用的兵,一方面缘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消息传来,无疑给日军当头一棒。签约前德国根本没打算跟日本通气,希特勒从心里瞧不起这个弹丸小国。当初《反共协定》签订后,日本一直追在德国屁股后面要求再搞个军事同盟,而希特勒则哼哼唧唧,始终不予明确答复,日本首相为此曾先后与德国进行了70多次磋商而未果,没想到德国却悄悄地先与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签订了和平条约,弄得日本狼狈不堪。日本政府颜面尽失,内阁只好宣布总辞职。在这次战争中,日本不仅军事上一败涂地,政治上也输得精光,成了国际舞台上一个令人耻笑的跳梁小丑。不久,“南进”派渐占上风,东京重新调整国策。日本从此将目光移向了太平洋和东南亚,准备与美、英分羹。

“这是一场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战争”,1939年7月20日,《纽约时报》的社论这样评价苏联红军和日本军队在蒙古草原上的这场苦斗,时报不屑一顾地嘲讽道“(他们)在人们注意不到的世界角落里发泄着愤怒”。直到两年后日本人的炸弹劈头盖脑地扔到了珍珠港,美国人才明白过来,恰恰是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一战改变了日本的作战对象,恰恰是他们根本瞧不起的这个弹丸

小国给了他们致命一击!美国人为自己的骄傲和轻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麻省理工学院的洛伦兹教授曾说过:“亚洲腹地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或许几周后能引起南太平洋的一场风暴。”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可能微乎其微,但产生的“蝴蝶效应”却令人瞠目。诺门罕战争便是典型的一例,当初谁能料到亚洲腹地一场不起眼的边境冲突,会为轴心国的最终失败埋下伏笔。

从政治意义上看,此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初期嚣张的侵略气焰,而且使日本被迫将“北进”侵苏的国策改为“南下”袭美,苏联从而避免了与德、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德国法西斯。在莫斯科战役中,苏、德双方当时拚得灯尽油枯,幸亏关键时刻苏联抽空了远东边境的二十个亚洲师调往欧洲,才给了德军致命一击,扭转了欧洲战场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没有诺门罕之战,斯大林绝不敢冒此奇险。另外,诺门罕战争期间,正值我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此战使日军向关内增兵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有力支援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诺门罕战争后,一贯骄狂的日军对苏军产生了心理障碍,日本基本死了与苏联再战之心,东京最终决定调转枪口袭击英美,不久日军便奇袭珍珠港,将隔岸观火的美国拖下了水,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最终日本兵败亚太战场。可以说,诺门罕战争是二战早期最精彩的一个伏笔。

从军事角度上看,苏联通过此战检验了陆、空军的各种新装备,锻炼了“大清洗”后新提拔的年轻军官,也提升了曾一蹶不振的士气。特别是发掘了一代名将朱可夫,为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储备好了帅才(朱可夫后来参与指挥了苏德战场几乎所有重大战役,每每都能化险为夷,被誉为“苏德战场上的消防队员”,而朱可夫的成名之战就是诺门罕战争)。苏军还在此役中首次实施了空降作战,首次使用了“进攻防御”和“夜间强光照明”的战术,首次采取了电子干扰战和心理战,后勤部门还创造了超远距离连续补给的世界奇迹。所有这一切都在后来的卫国战争中得以广泛采用,给德国法西斯以沉重打击。

(责任编辑 萧 徐)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长历程

●
解力夫

聂荣臻感叹：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干部太少，兵力单薄

1937年10月，平型关战役结束之后，八路军一一五师留下少量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由聂荣臻将军带领，开创敌后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师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的两个分队，还有总部特务团的两个连。此外，还有三四三旅派往平山地区的工作团和孙毅带的随营学校。加在一起总共不过3000人，这就是当时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基础。敌我兵力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开展工作，这点力量是很单薄的。特别是缺乏干部。当时同志们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留下的部队和干部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红军时期的骨干。

当时的局面的确是非常困难的。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华北敌后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原来的国民党军政官员都逃之夭夭了，在这个广大区域中，已找不到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敌特横行，人民情绪极度恐慌。所有的大中城市和绝大部分县城，都被日军占据了，破败的农村到处呈现出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

“那时，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干部太少，兵力过于单薄。”聂荣臻对记者说，“我深知在偌大一个地区，留下的兵力不过3000人，为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最关键的是必须要更多的武装力量。然而，这些力量从哪里来呢？如何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完成开创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呢？”受命之后，聂荣臻考虑的是，必须使每个同志懂得党中央决策的重要意义，把党中央放手发动群众，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图，变为每个指战员的自觉行动。最初部队住在五台山的庙宇里。尽管山峦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同志们手足冻裂，但是，大家仍然热烈地讨论着这个问题。

聂荣臻首先向大家分析了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艰巨性。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北）平汉（口）、（北）平绥（远）、正（定）太（原）、（大）同蒲（州）四条铁路之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成功地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就会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它可以拖住敌人，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它可以打击和摧毁汉奸组织，使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

它也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它不仅今天能配合全国军民进行战斗,以箝制日本侵略军的战略进攻,而且在将来会成为反攻日寇最前线的有力阵地。

聂荣臻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就能克服一切困难。他要求部队首先在靠近铁路、公路的地方开展工作,打击来犯之敌,积小胜为大胜,在战斗中削弱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号召和领导下,各支小部队广泛出击,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深受群众拥护,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

杨成立威震敌胆,各方支持,部队壮大

由杨成武将军率领的独立团,在腰站战斗之后,于10月初夜袭察哈尔省南部的涞源县城,守城日军仓惶溃逃,涞源遂告光复。随后,他们又成功地进行了冯家沟伏击战,以小的代价换取了毙伤100多名日军的胜利,并乘胜收复了晋察冀三省交界的广灵、灵丘、蔚县、阳原、浑原、易县等县

城,开始向平西平绥路和平汉路北段推进,在晋察冀边区的北部解放了一大片地区。到了10月底,杨成武的独立团已由出征时的1700人发展到7000多人,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另外还组建了各地游击支队和县大队,队伍一下扩大了好几倍。

独立第一师成立后,杨成武立即派出地方工作团,深入宣传党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界“抗日救国会”。接着,在晋察冀三省的结合部——恒山地区建立党的特委,各县也分别建立了县委、区委和抗日民主政府。至此,党政军和抗日群众组织,在这块根据地的7个县初具规模了,并且不断向其他地区开展工作。

为了做好上层的发动工作,涞源县城解放后,杨成武将军特意召集了一次绅士座谈会。事先发了请柬,还准备了几样菜。当杨成武招待绅士们用过饭之后,才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知识的出知识。等杨成武讲完,绅士们一个跟着一个开始表态,大多是恭维奉承之辞,赞扬八路军英勇作战,表示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但就是不说自己要捐多少粮款。好些人眼睛都望着当地大财主王莆,意思很明白,就是要看这位大财主“献财”呢!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骑兵部队越过内长城后向华北敌后挺进

这时,王莆捧着烟袋,连吸了几口,然后缓缓站起身来,向杨将军欠下腰,不慌不忙地说:“在下是小有家产,各位高邻也有目共睹,这是鄙人多年血汗积累,不必相瞒。而今国难当头,抗战是民族大义,在下无缚鸡之力,不能效前方将士为国捐躯,难道还不能为国捐财吗?鄙人认

捐！”他伸出了五个指头。

“五千？”一个绅士惊问，“这个数字不算小。”

王莆一摇头，背着手高声说道：“暂时先捐5万元，若抗日政府认为不够，王某还可再作考虑。”顿时惊叹声四起，好些绅士脸色都变了，王莆捐5万元，自己该捐多少呢？

王莆又说：“奉劝诸位一句，国将不保，家何能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与其让家财落入敌手，为何不支援抗日。望诸位三思。”王莆言辞慷慨，可敬可佩，在他的带动下其他绅士也认捐了。有的说“量力而行”，捐了1000元；有的说“鄙人甘当而下之，不敢与王兄比肩”，捐了800元。事后，大财主王莆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先后捐了近10万钱粮，比涞源全县的财主所捐的总数还多。从他身上，使人感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力量，这项政策深得人心，把一切能团结的人都团结到抗日的旗帜下了。

就这样，在各方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杨成武的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他所开创的地区成了晋察冀军区北面、东面的门户，是通往平西、平北、冀东以至东北的通道。他们要守住晋察冀军区北大门，就要经常和从北面张家口、大同出来的日本侵略者的“蒙疆驻屯军”和从北平、保定出来的日本华北派遣军及其附庸齐燮元的伪军作战。发动群众抗日，开辟这块地区，这就是杨成武和他的指战员们所面临的任务。

冀中抗日武装与吕正操部队紧密结合，力量更加壮大

就在杨成武部队在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取得了飞速发展的同时，冀中的抗日武装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就派孟庆山来冀中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孟庆山是红军的一个团长，河北蠡县人，参加过宁都起义。在他临离开延安前，毛泽东主席曾亲自指示他，要他在日寇大举南进、国民党溃退时，在他家乡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民，不放松一切时机积极组织武装，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孟庆山一到石家庄就向河北省委传达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他们

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训练骨干，地方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壮大，中共抗日救国主张日渐深入人心。因此，1937年9月，保定、石家庄、沧县等地沦陷后，中共保属省委就在定县、安新、蠡县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自卫团共2800多人。冀中的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就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官员纷纷从平津保南撤、人民要求抗战的时候，中共地下党员吕正操率领原东北军五十三军万福麟三八八旅的一个团和国民党脱离关系，改为人民自卫军，提出“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主张，得到全团多数官兵的拥护。这支军队完成改编后，立刻与五十三军断绝了电台联系，毁掉了密码。为了鼓舞斗志，并由地下党员胡乃超创作了《人民自卫军军歌》。歌词是：

神圣的自卫战争，
是民族最后生路。
大家向前！
倭寇逞强夺我东北，
更无厌蹈进长城关，
寇已深，国将亡，家已破，
我们要起来，
誓收复旧河山！
遵守党的铁的纪律，
团结成救亡血战线，
统一意志冲破一切艰难。
为生存而战！
为收复失地而战！
勇敢！前进！打回东北去！
这是人民自卫军！

这支1600多人的武装一旦脱离了国民党，站到共产党的旗帜下，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北上途中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每到一处就宣传抗日救国，检查群众纪律。10月末，部队到达蠡县，受到中共河北省保属特委和军委书记孟庆山等人的欢迎。这支部队和地方党一结合，如鱼得水，产生了巨大力量。在党的领导下，这支军队迅速发展壮大，他们战斗在从滹沱河到大清河广阔的平原上，到处打击敌人，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政权，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而且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颇受人民拥护。因此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支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就发展成一支拥有七万人

的强大抗日武装,并在五十多个县,近一千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权,成了我党在河北省中部平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

在北岳恒山和冀中平原抗日武装飞速发展的同时,1937年末聂荣臻所派出的另外几支部队,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老红军赵尔陆等人率领的工作团和少数部队,活跃在五台山以西地区,依靠地下党和党领导的同盟会,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建立我党领导的县区政府,在晋察冀边区的西部十几个县搞得轰轰烈烈。由王平率领的工作团和刘云彪率领的骑兵营,以阜平为中心,在附近各县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建立抗日政权,发展起许多支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把抗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落实到偏僻的山村,使以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的腹地逐步稳定。由周建屏和刘道生等人率领的工作团和小部队,活跃在正太路以北的山地。他们在当地组织的支持下,在平山建立了以平山子弟为主的抗日救国保家团,并在井陉、获鹿、正定、平定、阳泉、寿阳等地农村,组织起若干支游击队,使晋察冀边区的南部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为抗日根据地的拓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为了加强各地区的武装和便于指挥,八路军总部决定,立即建立隶属于晋察冀军区的四个军分区。各个军分区不仅有各自控制的区域,还有纵深发展的活动范围。在对敌斗争中,各地人民踊跃参军,使晋察冀的武装部队得以迅速发展,每个军分区都成立了三个主力团,再加上县区人民武装的配合作战,在很短时间就使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晋察冀根据地已拥有完整的县五十余个,人口近千万人。

根据地的创立,抗日武装的迅猛发展,很快提出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缺乏干部。为此,军区开办了军政干部学校,由富有军政培训经验的孙毅将军担任校长。这所学校从实际出发,开门办校,实际斗争需要什么,学员就学什么,教员就教什么。军政学校的学员,大部分是河

北、山西的中学生和小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平津的流亡大学生。另一部分是部队输送的优秀战士和基层干部。这个学校的头两期就培养了900多名干部。与此同时,晋察冀根据地兴办了许许多多党校,训练了几千名干部。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大大振奋了敌后军民的抗战精神。根据地的发展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日本侵略军为保证其后方和铁路运输的安全,在军区成立仅半个月之后,就调集20000多兵力,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沿线,分八路围攻这个刚刚建立的根据地。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在敌人疯狂进攻面前,人民武装沉着应对,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这次反围攻共歼日伪军2000余人。这一胜利使初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受到了考验和锻炼。边区人民用丝帛做成锦旗,奏着笙箫鼓乐,欢迎部队凯旋归来。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特别是这次反围攻的胜利,给这一地区造成了新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要建成一个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还必须建立和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不仅从军事上,还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形成相当巩固的基础才行。党中央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早在1937年9月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的时候,就成立了晋察冀临时省委,同出征的八路军部队一起负责发动群众和建党的工作。1938年后,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一地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又成立了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分局,先后由彭真和聂荣臻担任书记。

根据地的建设,除了及时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以外,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建立边区政府,以领导和团结全边区人民进行抗战。1938年1月11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城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一百多个县的各界代表149人。其中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有各抗日军队的代表,有各抗日阶层群众的代表,有蒙、回等少数民族的代表,有宗教代表,并有来自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代表。代表们从深山僻壤,从冀中平原,从游击区和敌占区,跋山涉水远道赶来,聚集一堂,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经过五天的酝酿和讨论,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区的军事、行

政、财经、文教、民运工作等各种决议案，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聂荣臻九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边区政府成立后，制定和实行了统一政策。在财政方面取消军队自筹粮款，实行统一财政管理。全边区一切脱离生产的抗日工作人员，一律按供给制待遇，大家都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为了发动

所有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晋察冀根据地很注意发展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尽力改善人民生活。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功地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美梦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它诞生之日，就成了根据地军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辽阔战场。日本侵略者本打算侵占华北以后，继续执行“速战速决”的方针，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它没有料到就在它的后方受到了八路军日益频繁的袭击，使它的精锐部队连吃败仗。在这里，战争不是趋向于结束，反而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激烈，陷在泥坑里拔不出腿来了。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后方，曾连续调集重兵，对初创的晋察冀边区进行过多路进攻，结果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使它感到极度的苦恼和不安。9月份，敌人又经过周密的准备，集中了一一〇师团、一〇九师团、二十六师团和独立第二、第三、第四混成旅团，共计50000多兵力，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各线发动对五台和冀西山区的围攻。敌人这次出动的部队，几乎是清一色的日军，进攻的目标是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和我們控制的县城。接受以往的教训，他们采取分进合击，多路围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领导同志。左起：关向应、彭真、聂荣臻

攻，步步为营的方针。

从9月中旬起，晋察冀边区军民就处于战云密布的状态中。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军区和边区政府及时进行了备战动员。聂荣臻司令员还提出了“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保卫家乡”的战斗口号，在全边区进行反围攻的组织动员和战斗准备。由于边区军民已经有了反围攻的锻炼，并采取了正确的作战原则，所以经常以成功的游击战抗击敌人，使敌人找不到我军固定的阵地，往往扑空，连连遭到我军袭击。

9月20日，敌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率部从孟县出发，渡过滹沱河，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山东南的柏兰镇。当时，我军区领导机关在耿镇石咀附近的一条山沟里隐蔽，当敌人经过牛道岭时，一个伏击给予敌人重大杀伤。9月29日早晨，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唐延杰率一个警卫连，对正在集合整装待发的敌军突然袭击，把清水大队长及其部下多人当场击毙。这次围攻开始时，清水十分嚣张，一再扬言要占领五台。结果刚到牛道岭就丧了命。具有十分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发誓要攻占五台的狂徒，被装进棺材，由他的部下抬着进入五台城。敌人出版的画报上还刊登了一幅“抬尸进五台”的照片。

10月28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常冈少将，率200多人由广灵去灵丘视察督战，途经邵家庄，被我伏击部队歼灭，（下转第10页）

第三次长沙会战

● 马仲廉

抗日战争时期，长沙经历了数次炮火。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进占岳阳逼近新墙河时，国民党军惊慌失措，以为日军逼近长沙，就下令实施“焦土政策”，将长沙付之一炬。此后，1939年11月至1942年1月，中、日两军在此曾进行了三次会战。1944年6月间，在长衡会战中，长沙又一次遭受炮火浩劫，并被日军占领至1945年日本投降。

本文概略介绍中、日两军第三次长沙会战情况。

日军支援香港作战，我军制定“天炉战”计划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时，日军中国派遣军第23军由广州进攻香港。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英军对日作战，命令各战区部队向当面日军进攻，以牵制日军。命令第四战区部队向日军第23军进攻，以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命令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进入缅甸，直接支援英军防守缅甸。

12月14日，日军发现中国军队第2军、第4军由长沙附近南下。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与攻击香港的第23军联系后，决定第11军向汨罗江一带进攻，以牵制中国第九战区部队的南下。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决定以第3、第6、第40师团为主攻部队，第3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4旅团由南昌向修水方向进攻，配合主力作战。日军参加此次战役的总兵力约7万余人。12月15日，日军第11军决定于12月22日前后开始作战行动，计划在汨罗江两岸歼灭中国第20军和

第37军后结束作战，预定时间为两周左右，阿南惟畿将军指挥所设在岳阳。

长沙地区属中国第9战区部队防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了针对日军进攻长沙的“天炉战”计划。所谓“天炉战”，按照薛岳自己的解释：“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网形据点或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之兵力，施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致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其作战方针是：“战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之目的，在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俟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预定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决战时重点保持于长沙以东地区。”

12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第73、第79军分别开至宁乡、益阳和淅口、株洲地区归第九战区指挥；同时将已南下的第4军调返株洲、淅口地区集结待命；调驻广西宜山的第74军进驻衡阳。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决心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诱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之间地区歼灭日军。为此，于12月20日20时下达作战命令。主要内容是：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指挥第26军、第79军及第194师进驻浏阳，日军攻击长沙时，第26军从东向西，第194师从南向北反击。副司令长官王陵基，指挥第78军、第72军进驻平江。第78军在敌进攻长沙时协同第37军从东北向西南侧击。副司令长官杨森，指挥已在平

江的第20军、第58军。第20军首先巩固现阵地后,向王桥、三江口侧面阵地转移,从东向西侧击,并由北向南尾击汨罗江以南之敌。第58军于敌新墙河渡河时由东向西侧击。第37军巩固汨罗江南岸阵地,之后向社港市、更鼓台、金井间山中转移,在敌进攻长沙时协同第78军从东北向西南攻击。第99军在确保归义以西阵地之后,敌进攻长沙时由北面向东南攻击。第10军死守长沙。第73军进驻宁乡、益阳为总预备队。以上预计参战兵力约24万人。薛岳的战区指挥所设在长沙岳麓山。

日军突过汨罗江,我军转入侧翼地域

1941年12月14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令参加进攻的日军开始向岳阳以南预定地区集中。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分别于20日、21日在新开塘附近和托坝附近集结完毕。第3师团因受到中国游击队的袭扰和破坏道路,迟至25日才全部到达龙湾桥附近。第6师团和第40师团的先头部队,至18日起即各以一部兵力向新墙河北中国守军的前进阵地攻击,以掩护其主力的集结与展开。

中国第九战区第一线守备部队为第27集团军的第20军。该军沿新墙河南岸由左至右展开。第20军第134师的右翼阵地,突出于新墙河北。日军为了进占新墙河北岸渡河进攻出发地,第40师团以两个联队于22日先期向油港河南岸守军阵地进攻。激战一昼夜,于23日进至箬口。当日晚间,阿南惟畿在岳阳指挥所下达了进攻命令,命令部队于24日开始进攻。

12月24日,日军第6师团全部进至新墙河北岸,占领了渡河出发地。左翼第40师提前发起进攻,并于当日14时在箬口附近强渡新墙河。守军第134师坚强抗敌。日军于当日傍晚渡过新墙河,突破守军阵地,向潼溪街攻击前进。中国第27集团军急令第58军新11师由黄崖寺向杨林街前进,由东向西侧击日军,策应第20军作战。日军右翼第6师团于24日傍晚开始进攻。当日夜乘大雨和黑暗强渡新墙河。守军第133师除留一部兵力守备纵深各据点外,主力向南岳庙、洪桥以南转移。第134师也退守十

步桥东西之线。

25日晨,日军第3师团随第6师团之后涉过新墙河,从右翼投入战斗,沿粤汉路东侧攻击前进,与守军第58军展开激战。守卫傅家冲、洪桥两据点的第398团第2、第3营数次击退日军的冲击,终因兵力悬殊,两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26日,日军以一部兵力围攻守军第20军纵深阵地,并抗击第58军的侧击,主力向汨罗江北岸地区突进,当日晚进抵汨罗江北岸。其左翼第40师团进至长乐街。

27日晨2时,薛岳下令第37军加强汨罗江南岸防守,令第20军、第58军向东南山区撤退,准备尔后对日军的反击。此时,滞留在日军后方守备据点的部队已大部突围撤走与主力会合。

接着,日军对防守汨罗江的中国军队展开攻击。

防守汨罗江的中国军队为第99军和第37军。12月27日,日军第3师团的骑兵联队于11时左右首先由归义附近渡过汨罗江,突破守军阵



会战之前的长沙城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地,进至栗桥以北,掩护其主力渡江。第6师团和第40师团的先头部队也于傍晚先后在兰市河和长乐附近强渡汨罗江,占领了南岸滩头阵地。28日,日军第3师团主力全部过江进入南岸,并沿粤汉铁路两侧向南突进。第6师团及第40师团的渡江作战,受到守军第37军的顽强阻击,进展缓慢。

日军企图围歼在汨罗江南岸的第37军。阿南惟畿于28日晚下令第3师团向左迂回至第30军后方的福临铺。于是,该师团由大娘桥连夜兼程东进,29日凌晨进至新开市附近。薛岳令第140师防守新开市附近阵地,原在此地防守的第99师退守湘阴和营田。当日晚间,日军第3师团及第40师团主力已全部进入汨罗江南,与守军第37军形成对峙。而后,第37军奉令向金井以东山区撤退,转至外线待机反击日军。

12月30日,日军3个师团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守军发动猛攻,并于当晚分别进至福临铺和金井一带。至此,中、日两军在新墙河与汨罗江地区的作战告一段落。

日军发动此次战役的企图是策应第23军攻占香港,牵制第九战区兵力不使其南下,而香港已于12月25日为日军占领,策应的任务已经

完成,原定进入汨罗江南的作战计划也已完成。

日军决定进攻长沙,我军积极准备应战

日军突进至汨罗江南岸以后,阿南惟畿认为战役进展顺利,此时又得到长沙守军薄弱的情报,遂决定部队继续南下攻占长沙。

阿南惟畿在作战之初即有攻占长沙的意图,并得到第3师团长的支持。军部的参谋们认为此次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应按原计划撤回原防。军部作战主任参谋岛村距康中佐提出进攻长沙应慎重从事的意见,引起阿南的强烈不满。阿南独断决定改变原作战计划,向长沙追击,并分别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大本营陆军部申诉理由,请求认批。

12月29日,阿南接到飞机侦察报告说:中国军队已向长沙退却,认为正是乘势攻占长沙的大好时机,遂不待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指示,即命令第3师团向长沙追击,同时向派遣军总司令官提出独断请罪。当日傍晚,阿南下达了进攻长沙的作战命令。

日军第3师团奉命后立即发起追击,连夜兼程前进,30日夜渡过捞刀河,接着准备渡过浏阳河,经东山向长沙南郊前进。第6师团进至梨梨市渡河点附近担任警戒任务,并作为进攻长沙的第二梯队。第40师团进至金井一带牵制东面山区的中国军队,并掩护第3师团和第6师团的后方。独立混成第9旅团29日到达岳阳后,立即向关王桥前进,以保障进攻长沙主力的侧背安全。

12月30日,蒋介石致电薛岳,指出:“一、敌似有沿铁道逐步推进攻占长沙之企图。二、该战区在长沙附近作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长沙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当日,薛岳致电蒋介石表示:“本会战职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心。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获得伟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1)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

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2)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3)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延误战机会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息。”

12月31日,日军第3师团到达梨市并准备渡过浏阳河,第6师团进至麻林以南,第40师团也进到长沙以东。日军各师团已进入第九战区部队的预定包围圈中。于是,战区令各集团军于1942年1月1日子夜开始攻击敌人。这时,蒋介石命令第73军、第74军、第4军从湖北、广西、广东等地急进到宁乡、衡阳、株洲。野战重炮兵第1旅从衡阳前进,进入长沙市对岸的岳麓山阵地,准备支援市区守军作战。

防守长沙市区的部队为第10军李玉堂所部。12月30日,李军长制定了保卫长沙的作战计划,并命令各部队迅速完成各据点工事,特须有独立作战之准备,详密划分守备区域和通讯联络;充分准备粮弹,统治湘江内船只。命令所属第3师以主力占领长沙城垣;预10师占领自水陆洲、猴子石、金盆岭、黄土岭、林子冲、左家塘、半边山之线;第190师占领左家塘、杨家山、鞍子山、湖蹟渡、复兴寺附近、新河正街之线,阻敌进攻。

在长沙保卫战准备过程中,薛岳曾下手令给长沙的党、政、军各机关部队,规定了详细任务,并命令第10军军长李玉堂统一指挥长沙的文武官员,以必死的决心,必胜的信念,协同一致,完成保卫长沙的使命。从12月23日开始,长沙市的人口、物资即向后方疏散。守城军队加紧进行阵地修整,在长沙郊外配备第一线守备兵力,准备战斗。

日军攻击长沙市区,我军坚守阵地与敌激战

1942年1月1日,日军展开了对长沙市区的进攻。当日8时,日军第3师团渡过浏阳河后向长沙郊区前进。11时许,向阿弥岭南北之线的守军预10师阵地发起攻击。激战到16时,守军阵地被日军突破。预10师退守半边山、左家塘一

带既设阵地抵抗。18时左右,守军阵地再被突破。在战斗中,守军第29团第1营伤亡殆尽。日军继续进攻,被守军阻于军储库、邬家山阵地前。

1月1日的攻城作战刚刚开始,日军第11军便迫不及待地致电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祝贺元旦胜利!

这时,日军第11军情报部门破译了薛岳令各集团军向长沙附近集结,准备围歼日军的电报。阿南急令第3师团加紧攻击,企图在第九战区部队形成包围前攻占长沙。于是,日军第3师团与守军预10师在军储库、邬家山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战。从1日夜至2日凌晨,中、日两军在长沙东门、南门外展开激烈战斗,反复肉搏,阵地多次易手。在战斗中,第29团团长沙新善、团附曾友文等阵亡。第28团与敌英勇战斗,歼灭了被围于白沙岭的日军部队,获得了日军作战命令,阵中日记等文件,从中得知日军弹药粮秣携带数量甚少,以及其进攻计划,各师团位置等重要情况。第九战区立即将此情报通报正在从三面向长沙推进中的外线各集团军,并令各集团军按预定计划快速向进攻长沙的日军合围。

另据日军战史资料记载,在1月1日的战斗中,日军第3师团直属加藤大队大队长被击毙。守军在其尸体上缴获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命令以及携带的弹药数字不足的文件。薛岳看到后,非常高兴地敲着桌子说:“虽仅一张薄纸,却比万挺机枪还重。”

1月2日,日军第3师团继续组织进攻。守军顽强抵抗。守备南门外修械所高地的预10师第28团,战至仅剩58人,终于保住了阵地。第30团将日军第6联队第7中队歼灭大半。经过两日的战斗,日军第3师团因补充困难,弹药将尽,已无力组织强有力的攻击,被迫改为守势作战。

1月2日晚,蒋介石为鼓励士气,致电薛岳和第10军军长李玉堂等守城官兵,指出:“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10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10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10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10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

摧破强敌,获得无尚光荣。望激励所部完成使命,不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1月3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加入攻城战斗,攻击长沙北门、东门、南门间守军阵地,激战终日。日军除一个中队一度至湘江岸边外,其余全部被守军击退。

围攻长沙城的日军死伤惨重,弹药将尽。且处于被中国军队包围状态下,面临绝境,不得已已在3日夜间决定撤退。这时,阿南惟畿司令官无可奈何地写下一句诗:“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以此安慰情绪低落的幕僚们。

日军为了隐蔽其撤退企图,于1月4日撤退之前,对长沙市区再次发动猛烈攻击,均被守军击退。当日晚间,第3师团和第6师团乘夜暗脱离长沙战场。

日军在撤退时仓皇失措,许多尸体未及处理,作战物资到处遗弃。据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处长的赵子立回忆说:“第10军首先发觉日军由长沙南部撤退,即派小部队向长沙北部夜袭,这更增加了日军的混乱。当时正值隆冬,他们把大衣军毯撂了许多,带不了的武器也来不及破坏了。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这次却未及烧完。”日军撤退的翌日早上,赵子立同薛岳等由岳麓山回长沙二里牌驻地,车过八角亭后,看见日军遗弃的尸体很多,二

里牌也有少数尸体和死马。后来参谋长吴逸志由耒阳回到长沙,让人把已经掩埋的日军尸体全部扒出来,埋在一起,堆一个高台子,并立石留念,上书:“倭寇万人冢”,傍书“陆军中将吴逸志题”。虽然没有万人,但冢中也有几百具尸体。

第10军保卫长沙,苦战四昼夜,终于击退进攻之敌。1月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第3师、第190师、预备第10师授予民族荣誉旗,授予李玉堂二等宝鼎勋章,并晋升为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

日军狼狈溃退,我军追歼逃敌

预计到攻击长沙的日军即将撤退,蒋介石于日军撤退的前一日,即1月3日,训令薛岳司令长官:“一、该战区应速严令各部向长沙附近敌人围击,务确实截击敌人归路,包围捕捉敌人于战场内而歼灭之。二、应速以一部先期击破汨罗江敌人,占领各渡口,并即令孔荷宠部配合游击队,迅速向武昌挺进袭击。三、如敌突围北窜,应以第73军由长沙下游渡江,另以一部由金井附近分向汨罗江北岸超越追击,封锁汨罗江各渡口,阻止敌人退却,主力向敌跟踪猛烈追击。同时以有力一部向岳阳挺进,乘虚袭取之。四、向敌追击时,第10军仍应守备长沙。”同日,蒋介石又

电薛岳,指出:“一、此次湘北会战,特应注意下级干部及士兵之战功,随时予以奖赏,并呈报本会备查。二、新墙河以南及汨罗江两岸地区,应即发动群众,乘敌后方空虚,彻底施行交通破坏,使敌退却时不能迅速脱离战场。”



我军开赴长沙(第三次会战)

第九战区发觉日军撤退后,立即命令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的各部队改变任务,转为由不同方向围追堵截歼灭撤退的日军部队。以罗卓英副司令长官指挥第26、第4、第79军为追击队;以杨森副司令长官指挥第20、第58军为堵击军;以王陵基副司令长官指挥第37军、第78军为东方截击军;以第99军军长傅仲芳指挥该军为西方截击军。要求彻底歼灭败逃之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薛岳发给各部队的电令最后说:“此次北溃之敌,伤亡惨重,弹尽粮绝,无论追击、堵击、截击,各军应绝对快速机敏,勇猛果敢,索敌而歼灭之。如有作战不力,任敌安全逸者,决依法重惩。其俘获甚多者必从优叙奖。”

日军第3师团接到撤退命令后,于4日黄昏开始向东山撤退,5日凌晨2时到达东山时,受到中国第79军的堵击。第4军一部由长沙城南向槩梨市迂回,向日军第3师团侧击。日军第3师团在第79军和第4军夹击下,陷于混乱,伤亡甚众。由于浏阳河渡桥已被第79军炸毁,日军被迫沿浏阳河南岸向磨盘洲退却,企图仍由来时的渡河点徒步渡河,但遭到北岸第79军所部密集火力的堵击,死伤溺死者500余人,因而改向槩梨退却。至6日凌晨,该师团退至浏阳河北岸与第6师团会合。此时,第4、第79、第26军跟踪追敌至槩梨市附近,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两个师团被迫并列向北退却。至7日凌晨退到捞刀河北岸,枫林港地区。日军第40师团在春华山地区受到第78军的攻击,然后向金井方向退却,沿途又不断遭到阻击与侧击。7日夜,该师团脱离了与第78军的战斗,退向学士桥。

1月8日,日军第3、第6师团由捞刀河北岸继续北退,沿途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截击、侧击,退至青山市、福临铺、影珠山地区时,被中国军队包围于该地区。阿南惟畿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南下解围。8日晚,该旅团对影珠山发动攻击。在该地区担任堵击任务的第20、第58军立即反击日军,经彻夜激战,将该旅团击溃,并将其一个大队包围于影珠山附近。战斗至9日10时,该大队除一名军曹逃脱外,大队长山崎茂以下官兵全部被歼。日军资料对该大队被歼情况作了如下记载:“天明后,在山上双方的混战极为激烈,官兵们不断负伤倒下。10时左右,我弹药用尽,在到处的

草丛中,可以听到伤员的呻吟声和自绝的枪声,山崎大队长负伤,满身是血,但仍继续指挥战斗。最后山崎大队长终于决心殉国,于是命本部附斋藤军曹突围向上级报告关于夜袭及其后战况与决心殉国等情况。该军曹巧妙地突破敌线,日落后回到旅团司令部,报告了情况。斋藤军曹走后,山崎大队长再度遭到迫击炮弹的轰击而死亡。接着士兵们就用刺刀互相刺杀或者用手榴弹自爆而死。”

1月10日,日军第6师团向北突围,被第20军和第58军分割包围。阿南惟畿得报后,即令第3师团、第40师团及第9旅团解第6师团之围,并集中兵力向北撤退。11日,日军第6师团及第3师团陆续突出中国军队的拦截线。第40师团亦从春华山东北学士桥北撤。日军一面撤退一面抵抗,至12日退至汨罗江北岸。15日,日军退至新墙河北原防地,至16日,基本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第11军指挥所撤回武汉,会战结束。

会战期间,赣北方面日军一部曾向西出动,配合主力作战,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于1月5、6日间退回原防地。日军第1飞行团动用飞机50余架,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给中国军队造成一定伤亡。此时,中国空军尚未恢复实力。但在日军撤退途中被包围于福临铺地区时,中国空军第二大队从成都起飞轰炸机9架,至长乐街轰炸,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返航途中遭到日机8架战斗机的攻击,损失轰炸机两架。但以轰炸机的火力击落日机一架,击伤其两架。

此次会战,第九战区战绩公报说,日军伤亡56944人,俘虏日军139人。我军伤亡29217人。而日军战史公开的数字是,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发动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此时,日军南方军正在横扫菲律宾、马来亚等地区。而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却遭到了惨败。日军资料说,其损失为进攻香港作战部队损失的2.5倍。此次会战的胜利,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对提高反法西斯战争盟军的士气,对支援美、英在太平洋战场作战也有一定的作用。

(责任编辑 萧 徐)

抗战胜利催生一本小刊物

● 袁 鹰

60年前的1945年8月10日以后几天,上海满街是爆竹声、锣鼓声、欢笑声。虽然日本天皇裕仁的所谓“终战诏书”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这最后一个法西斯强盗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已经传遍全世界。从1937年“8·13”在上海点燃起全民抗战的圣火以来,整整八年了,上海老百姓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下,饱受杀戮、抢劫、压迫、欺凌的煎熬,苦苦等待了八年岁月,如今等到了天亮,看到了强盗的末日,眼看那不可一世的太阳旗终于黯然降落。那令人战栗、令人窒息的搜捕、封锁、暗杀、丧失自由的屈辱生涯,那物价飞涨、限制用电、排队买户米、人命朝不保夕的苦难年月,终于都像梦魇一去不返。想到这一切,怎不叫人欣喜欲狂!

然而,消息杂沓而混乱,有人从无线电短波里听到美国飞机在日本投下两颗威力很大的原子弹,听到苏联对日本宣战,红军分几路攻入我国东北围歼日本帝国主义最后的主力关东军。汉奸的报纸摇身一变,竞相刊登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于是,上海人都带着惶恐、迷茫的眼神,看到这样一条新闻:

在重庆的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一是电令他的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电令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所属部队就地驻防待命,在各战区作战部队,“应接受各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不得擅自行动”;三是各地伪军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对蒋介石的命令,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发出通令,拒绝接受,指出它“不仅公不公平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蒋介石令特务头子戴笠以“军事委员会”名义,任命汪精卫傀儡政权的伪上海市长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指挥”,让他继续把持一批武装,维持治安,配合国民政府的接收。这名大汉奸居然张贴布告,俨然仍是“市长”面孔,要上海市民“严守秩序,切勿兴奋过度,致招不测之祸”。

日本占领军的上海陆军司令部也张贴布告,继续杀气腾腾地禁止悬挂“敌性国旗”,禁止喊口号,不许张放花炮,取缔一切未经检查擅自发行的出版物。

那几天,上海的局势仍然扑朔迷离,不像是炽热的夏季,倒像是阴霾沉沉的黄梅天了。

地下党组织领导我们的丁景唐同志分别向沈惠龙、冯大文和入党不久的我传达党中央布署:新四军立即向上海进军,解放这个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地下党领导紧急布置全体党员在各自岗位上立即行动,作里应外合准备。老丁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赶紧编辑出版一份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小型刊物,刊物名字他也想好了:《新生代》。本来,从1944年冬,在老丁领导下,惠龙、大文和几位爱好文艺的大学生吴君尹、袁万钟、陆兆琦等利用关系创办了一份学生杂志《莘莘》,其后我也参加编辑工作,到8月份,已经出了四期,其中还出了在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助学义卖活动的专辑,拥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读者。如今胜利了,不再继续出《莘莘》,就用剩下的纸张印

魂——地下军》的文章,最后借一个地下军工作人员之口,说了这么一句话:“为了祖国的复兴,我们都准备流更多的血与生命,去争取法兰西历史上的光荣。”如果将“法兰西”三字换成“中华民族”,也可以作为代表我们一些地下党员心声的。

我赶写了一篇速写——《从黑夜到天明》,记下日本投降消息传来最初那个夜晚的一角情景,单薄幼稚,只是如实素描。现在附在本文后边,提供给读者作为了解六十年前“8·15”在上海的一点参考。

这份小刊物,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两个星期就编印出来,大文通过原来《莘莘》的发行关系,将它迅速送到收报摊上。我没有仔细查有关资料,这份刊物虽小,很可能是抗日胜利后在上海出版的第一份刊物,而且是党直接领导的,比其他报刊都早。刊物上没有编者姓名,没有发行人,出版人“新生代出版社”也属子虚乌有,纯粹是个“地下出版社”。过了几天,到几个报摊上去问,都说是“卖光哉!”我们听了都很高兴。

正当我们三人紧张地着手准备第二期刊物的時候,老丁来传达党中央新的布署:新四军暂时不打上海,所有地下党员坚守岗位,继续作长期隐蔽的准备,应付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后的新形势,迎接更加复杂、剧烈、尖锐的斗争任务。

我原来天真地满心以为新四军即将进入上海,革命即将胜利,此时不免有点怅然,同惠龙、大文分手,各自走上新的岗位。走在满街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马路上,心里激动地想:总有一天,马路上会挂满红旗的。那时候估计大约又要度过七八年漫长时日,谁想到仅仅四年以后,前身正是新四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粟裕将军指挥下,浩浩荡荡地开进这中国第一大都市,红旗就飘扬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了。

附录:

从黑夜到天明

1、深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深夜。

跟八年来每一个深夜一样,没有月,也没有星星,一片黑黝黝的。

跟八年来每一个深夜一样,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有人在疯狂、酗酒、荒淫,有人在饮泣、叹息,也有人在等待,希望……

深夜,跟八年来每一个深夜一样。

可是,在深夜里有人在蠕动着了。

2、消息

有人在蠕动着了,噤噤喳喳地小声谈话,声音是急促的,压不住秘密的欢喜。

一个好消息——成千成万的人们等着的。在八年来苦难的日子里日日夜夜等待着的。

——真的?

日本投降了?

——投降了!

——投降了!

3、人声

——投降了!

终于声音渐渐大起来了,黑夜压不了它,就如纸团包不住熊熊的火焰。

弄堂里开始有了人声,像几十条几百条溪流汇聚到海洋,人声宏亮起来了,宏亮起来了。

人们在弄堂里穿来穿去,互相询问着消息。

一个年老的俄罗斯女人,被一帮人围着,她显得极度地兴奋,指手划脚地,用并不好的英语粗声粗气地告诉人家怎么从俱乐部听来这个意外也是意中的消息。

弄堂里没有人再睡着了,大大小小都在门口,东也是一堆人,西也是一堆人。

4、欢欣

东也是一堆人,西也是一堆人。

——这就好了,也该过点太平日子了!

——不是么,八年的罪受得好苦好苦,现在可抬头了。

提起这八年来的生活,谁都会有一长串辛酸的记忆,一长串眼泪和叹息的日子,然而,人们,笑吧!就像现在这样,尽情地笑吧!把许多积成堆的仇恨、痛苦、羞辱,都消失在笑声里吧!世界上还有什么更欢欣的事呢?

——没想到也有一天重睹汉官仪!

人群中有一位老先生,笑着摇动着他的花白胡子。

小孩子们大声的叫着好,拍着手欢呼着,欢呼着。

5、疯狂

欢呼着！欢呼着——在霞飞路上。

俄罗斯人，犹太人，中国人，全成堆地推到马路上来了，年青的，年老的男女握着手，拥抱着……

笑声，叫喊声，歌声……到处都是，到处都是。

霞飞路上，光耀的电炬照着一群群欢喜得疯狂的人们，每个吃食店，酒吧间，咖啡馆都挤满了人。

啤酒——六十万一瓶！

一个犹太人亲善地拍拍一个拉车的肩膀：
——明天要用老法币了。

另一个说：

我们都是自家人！

人们欣喜的疯狂，没人想到休息。

6、熬夜

没人想到休息，人们都在准备熬夜。

再没有灯火管制了，电灯辉煌地亮着。

弄堂里人群渐渐散了，在自己的家里围坐着，做父亲就告诉子女那一年逃难的情景。在梦做完的时节，回想梦中的一切，就成了一件可爱的事。

人们都巴望着快点天亮，大家都打算出去。

有一人看了一下表——才四点。

没人能睡觉，谁都睡不着。这一夜比哪一夜都长。

睡不着的人们又起来，想着，谈着，笑着，天亮了。

7、天明

天亮了！

8、恭喜

天亮了，这么长一个黑夜终于度过了！

还没等到太阳出来，街上已经满是人了，一大群一大群地跟着，见着熟人，老远就招呼！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哈哈！

学生，工人，小孩子，伙计，小职员，娘姨，卖

菜的，车夫，都在街上挤来挤去。

——到底也有翻身的一天！

——没有白等，天有眼睛的。

东边，太阳露出脸来。

9、国旗

太阳露出脸来。

于是，有人扯起了鲜红的国旗，不久以后，大街小巷都飞扬着了。这面旗子，不是除去那条黄色三角带的旗子，而是叫人怀念了八年——胜利的旗子！

自行车嘀铃铃地穿过来了，车头上插了一面旗子。

孩子们手里，摇着纸制的旗子。

国旗店里挤满了人，每个人走出来手里全拿着一面旗子。

国际饭店、大新公司……所有高楼的顶上，在蓝色天空下，愉快地招展夺目。

就在高楼上的国旗底下，有人放出了第一声爆竹。

嘭——啪！

10、爆竹

嘭——啪！

立刻，聚在大街两旁行人道上人们轰动起来。

——好……哎！

放爆竹的人洒下五彩的纸屑，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在空中飘荡着，于是又是一阵雷似的欢呼。

——好……哎！

一辆军用卡车驶过，几个垂头丧气的日本士兵，惊惶地看着这群热烈的人们。人们胜利的欢呼声，由于军用卡车，更响亮了。

——欧……！

——欧……！

为这响亮的声音召唤，人们从各方面汇合起来了。

——伟大的人民！

(1945年8月中，原载《新生代》创刊号，1945年8月28日出版)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两 张 老 照 片

● 阎明复

《炎黄春秋》今年第六期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结缘南斯拉夫》，并登载了几张照片，其中第22页上的《彭真率团访问南斯拉夫》的照片，由于我的疏忽，错误地提供了彭真同志于1965年率团访问印尼的照片。为此仅向编辑部和广大读者表示歉意。

最近返京后，我找出了1957年1月彭真同志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同铁托总统合影的照片。（见44页照片）现提供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如蒙刊用，不胜感激。照片上的人物是：前排从左至右：周叔弢、胡子昂、章伯钧、李济深、彭真、铁托、区棠亮、某某、乐松生、唐贤耀。后排从左至右：武新宇、阎明复、唐建文、某某、伍修权、南斯拉夫友人、柞容祯。

这是我保存的唯一一张彭真同铁托的合影。

两位共产主义老战士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在斯大林的高压手段下，铁托毫不屈服。面临赫鲁晓夫的气势汹汹的突然袭击，彭真庄严宣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可以粉碎，但是压不扁的，我们只服从真理，而决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毛主席赞誉铁托“是一块铁，不怕压”。对于彭真同志来说，同样的赞誉也是恰如其分的。

《炎黄春秋》第六期刊登的“彭真率团访问印尼”的照片，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见证。那是1965年的5、6月的事。当年彭真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和全国人大代表团参加印尼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庆典活动并访问印尼。印尼共成立于1920年5月23日，1926年领导了印尼民族大起义，遭到荷兰殖民主义者残酷镇压，被迫转入地下。1935年重建印尼共中央机构；日本占领时

期，印尼共投身于抗日斗争，1945年二战结束后积极参加推翻荷兰殖民统治的八月革命，推动了印尼共和国的成立。1948年，印尼共再次遭到残酷镇压，重新转入地下。1951年，印尼共公开活动，组成了以艾地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坚持反帝、反殖斗争，致力于同民族资产阶



级建立统一战线，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到1962年已拥有二百万党员，在印尼民众中有广泛影响。彭真同志就是在印尼共发展达到顶峰时期率团参加它的四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给我们代表团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首都雅加达最大的体育场举行的庆祝大会，印尼共领导



人艾地、苏加诺总统和众多的高级军政官员同数十万民众同庆共产党的生日。这次庆典的重头活动是举行跨印尼各大岛的党旗传递活动：成千上万的民众在各地迎接传来印尼共的旗帜，最后到达雅加达大体育场，人数众多的传递队伍走进体育场，在场的民众高声欢呼，锣鼓乐喧天，在身着民族服装的队员们簇拥下高举党旗的旗手昂首阔步走上主席台，红旗没有送给艾地，却献给了苏加诺总统。我们代表团中有的同志是土生土长的印尼华侨，曾长期献身当地党的事业，看到此情此景不禁感慨万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看到印尼共的发展壮大、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戴，从内心深处替他们高兴，同时在虎视眈眈的武装到牙齿的强大对手眼皮底下如此炫耀自己，是福是祸，难以预料。当时彭真曾提醒艾地要防止突变，并向艾地建议，要组织两套领导班子，一套在地上，一套在地下，地下领导班子可以住在中国，可惜艾地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庆典后四个月，9月30日，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人集团推翻了苏加诺，开始大规模镇压印尼共产党，几十万印尼共党员和艾地等主要领导人惨遭杀害或关入监狱。从此，印尼共进入最困难时期，第三次转入地下。

我们代表团的访问即将结束前，艾地邀请彭真和代表团到茂物的一座印尼共的农场去休息。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地跨赤道，大部分地区为热带雨林地区，终年高温。我们虽然身着薄薄的夏装，室内整天开着空调，但仍然终日汗流浹背，一回宾馆就跑去“冲凉”。而距离雅加达仅50多公里的茂物，虽然海拔仅266米，却气候宜人，另有一番天地。印尼共的农场在茂密的森林中，到处都是不知名的热带的奇花异草，平展的草坪上放着几条长木椅，长条桌上摆满了热带水果。宾主一边品尝奇异的水果，一边聊天。艾地指着剥开的榴莲说，这种水果营养价值极高，有水果之王的美称，闻着臭，吃着香，类似中国的臭豆腐。但代表团中好像无人敢问津。我记得，彭真同志谈到这次访问的印象，说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要看到逆转的可能，要有两手准备，吸取历史上两次被迫转入地下的教训。同志间感情胜于手足，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不知不觉快近黄昏，有人大声建议，乘天色尚早，一起合影吧。于是就有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见45页照片）照片上的人物大多数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只能举出还能叫出姓名的人了：前排左二张上明，左三、四和五为印尼共领导人，左六彭真，左七艾地，左八陈郁，左九某某护士长；后排左二朱庭光，左四过家鼎，左五阎明复，左六李之玉，左八伍应光。这张照片可能是艾地和他的几位战友同中共领导同志的最后一张合影。

李昌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

● 史义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概念,最早是李昌于1979年向中央提出来的。

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昌,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是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时还必须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他向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提出了这个主张,立即获得赞同,两人就此事曾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随即这个概念写进了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中,在这个讲话中关于精神文明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李昌在会上致信邓小平,建议中央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个总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凡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赞成的。但我觉得,在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可以考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叶副主席在1979年国庆讲话中提出的。我体会,它既包括教育发达、科学昌明和文艺繁荣等实体部分,同时也包括道德、传统、风尚等意识形态部分。比

如:有理想,即有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理想;讲道德,即个人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遇有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民主团结,勤劳朴素,学文化,重科学,讲卫生,有礼貌等。前者(实体部分)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们可以努力推进的,而后者(意识形态部分)则是广大人民都能出力参加建设的。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动员工农商学兵、男女老青幼参加这个建设,从而把广大人民的思想集中到一个明确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目标上,更有力地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工作。

.....

此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们的高度重视并印发给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者,大家都表示赞同。

198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2月10日出版的《半月谈》杂志第三期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李昌同志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题目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半月谈》杂志为此加了编者按,欢迎广大读者在《半月谈》杂志上开展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讨论。

李昌在信中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叶副主席在1979年国庆讲话中提出的。”使理论界一直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概念是叶剑英同志提出来的。为此,2005年4月19日,笔者就此事问了李昌同志的夫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同志,她说:

我曾就此事问过李昌,他说,说叶帅提出来的不是更权威吗?对精神文明建设不是推动更大吗?我劝他写篇文章记述一下这件事,他也不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不计较这些事情。

邓小平在当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邓小平说: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从邓小平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出是受李昌这封信的启发。

1981年2月,在全国开展起以“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12月,在人民解放军中兴起“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苦困难,不怕流血牺牲)。活动的开展使我国城乡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有了新的起色。这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扭转党内风气起了良好的作用。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并定为新时期总任务的基本内容之一,即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更高的地位,列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定为新时期中国人民奋斗目标之一,并强调“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1983年4月,在“五讲四美”的基础上又加

了个“三热爱”,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内容。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全党同志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5年第7期目录

文坛景观	欺世盗名的“读经”运动 ——兼及“文化保守主义” “堆泥游戏”何时休	张远山 王文元 李 培
名人心曲	从提倡“咬菜根”谈起	周泽雄
不吐不快	我为什么反感当今杂文 向柴可夫斯基致歉	梅疾愚 板儿爷
书林折枝	《聊斋》识小录二则 厚黑面具下的孔孟之心 ——读李宗吾《厚黑学》	黄全彦
千古诗心	谈一谈“刘项原来不读书” 是不是“韩信不听话” 有没有毛泽东纪念鲁迅的两首诗	关天道 李国权 彭明道
灯下随笔	在“荡妇”的怀里疯狂 ——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	赵 维 朱晓军
边走边看	也谈“强者精神”与“盛世情怀” 市井陋俗之传统 “鱼烂”的金题玉蹙	曲彦斌 赵 刚 张云江
空谷回声	对上帝的一种误读 关于诗人朱湘身后事 ——石定乐先生《想起朱湘》正讹 马寅初赞美张勋吗?	万龙生 李 慧 理 钊
枕边闲笔	明朝色情文学流行泛想	雷池月
史海钩沉	从文化的源头顺流而下 ——古都史话之五	王贵成 朱旭晨
风雨人生	畅饮政治苦酒的文人 婚恋中的郁达夫	欧阳维诚
科文经纬	话说抽屉原理	周英杰
来稿摘登	袁世凯行贿之一例 和 谐	李明月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 5.00元
地 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 话 0731-5791300 5563097 传真 0731-5790197

上个世纪的一场民营电影梦

● 章立凡

1979年春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我陪女作家胡兰畦先生到协和医院去看望阳翰笙先生。

阳翰老在“文革”中遭到江青的残酷迫害,此刻虽已获得自由,并住进了高干病房,但由于两个“凡是”威风仍在,这位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战士的政治结论(即所谓“四条汉子”及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等罪名)迟迟没有作出。他一提起此事就十分激愤:“我的问题早就查清楚了,他们还想压住老子永世不得翻身!”

胡兰畦是大革命年代十分知名的革命女杰,茅盾的小说《虹》里的女主人公梅女士,就是以她为原型的。1949年以后她一直被冷落,1957年又成了五十多万“右派”中的一员,此时也尚未成为“出土文物”。

这两老是四川老乡,又都是父亲的故交,有我同去,话题自然会转到父亲身上。阳翰老说:“乃器先生同我是老熟人了,四十年代他投资拍进步电影,我还是牵线人咧!”胡兰畦说:“翰笙,我真搞不明白,把乃器这样一个好人,整得怎样惨!为啥子我们的革命成功以后,要把好人、正派的人,一批批整倒、整死?!”

阳翰老没有回答她这个有关“精英淘汰”的问题,只是关切地问我:“你爸爸的问题怎样了?”“‘右派’帽子在1975年就摘掉了,现在恐怕人走茶凉,没有人为他说话。”“要争取嘛!你发出声音,人家就不好假装没听见啦!”

当时已有中共中央要对“右派”重新甄别的消息,这番话提醒了我——消极等待是不行的,于是开始写申诉信。父亲的错案一年后获得改正,我也始终铭感阳翰老在关键时刻的提醒。那次的交谈,还触发了我对父亲与电影业历史渊源的关注。

记得“文革”中有外调人员来调查父亲与电影界友人的关系,他坚持按历史事实写材料,并与来人发生了争执。

事情还得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谈起……

再造“联华”,三人投资两个外行

电影事业素有“梦工厂”之称,父亲则是近代史上一位有名的“逐梦人”。

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主持《东方杂志》时曾有一项壮举——一百多位知识分子在该杂志1933年新年号上,同时发表“新年的梦想”,父亲也是撰稿人之一,并预言中国将要发生一场“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1946年他又发表《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抒发自己的未来中国之梦。他在文章最后写道:“如果梦境是理想的,现实是不是愚蠢的呢?理想固然未必完全能实现,但是,智慧至少可以使它大部分得着实现。”他的文化建设理念,在抗战结束后的上海,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机会。

影音声光的特殊魅力和大众传媒效应,使电影艺术成为20世纪最有效的传播手段之一。国民党政府竭力将电影事业垄断在自己手中,抗战胜利后又接管了敌伪电影产业。为与国民党争夺电影文艺阵地,在周恩来的推动下,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等以战前联华影业公司同人的名义,酝酿筹组民营制片机构——联华影艺社。当时担任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的父亲,由是开始了经济上的“触电”,投资联华,拍摄巨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

父亲与左翼影剧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抗战

爆发前的救国会时代,当时各界纷纷组织救国会,电影界人士也组织了电影界救国会,他与夏衍、阳翰笙等的交往即始于此。抗战期间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他与影剧界的朋友也常有过从。据参与发起联华影艺社的任宗德先生回忆,1946年三四月间,在上海爱棠新村任宗德家中,由阳翰笙主持,袁庶华、史东山、蔡楚生、蔡叔厚、任宗德等一起商议,袁庶华(中共地下党员,父亲在上川公司的老部下)提议章乃器参加,蔡楚生提出请夏云瑚参加,得到大家的赞同。任宗德回忆说:

章乃器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工商实业家,他主持的上川公司颇有实力,在上海滩以至长江流域都很有影响。请他出面,可以使即将成立的制片机构带有浓厚的民营商家色彩,在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下便于运作。夏云瑚与国民党方面人士的交往更深更广,他的朋友何龙庆抗战后由重庆稽察处处长调任上海稽察处处长,这些关系可供利用,可作掩护。夏云瑚与阳翰笙、蔡楚生等进步文化界人士有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上演《屈原》、《清明前后》等进步话剧时都出过力,加上他精通电影的经营发行,所以,大家都欢迎他参加进来。经过工作,章乃器和夏云瑚表示同意,参加了筹备会议。后来,为了交涉使用战前联华电影公司摄影场地等事,郑君里、孟君谋等人也参与了筹备商议。

联华影艺社于1946年6月成立,父亲被推为总召集人,议决分别由史东山、蔡楚生负责,准备拍摄故事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一笔制作经费十万美元,由章乃器、任宗德和夏云瑚三人分担。任宗德回忆说:“其中,章先生出资最多,我次之,夏云瑚最少。”“凡有重大事务,由章乃器召集有关人员商议决定。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阳翰笙、袁庶华和蔡叔厚。而在艺术创作方面,则由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徐韬、王为一等人负责。那时,章乃器和我对经营电影业都完全是外行,阳翰笙、孟君谋、夏云瑚等内行权威人物说

怎么办我们就怎样办……”

父亲晚年对我谈起这件事时说,联华的三个投资人中间,任宗德和我算是同行,都是搞酒精的。抗战期间汽油匮乏,使用无水酒精代替,利润很高。他投资创办了国防酒精厂,我在上川也办了个酒精厂,都是同业公会的成员,彼此早就熟识。夏云瑚是四川袍哥中辈分不低的人物,当过重庆国泰戏院的老板,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对电影制作发行也比较内行。我那时对电影制作是外行,完全是凭着一股热情而投入,这里面水有多深是不清楚的。后来不得不中途退出了……

一人退出,“联华”改组成立“昆仑”

联华影艺社成立时的誓言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同人们热情高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由史东山编导、王为一为副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于1946年9月24日在徐家汇摄影场开机。不久,由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投入了拍摄。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憧憬着一个和平、民主的新



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剧照



1931年史东山、蔡楚生、孙瑜、周克合作拍摄影片《共赴国难》时的工作照

国家出现。但这个战后建设之梦,很快就被独裁政治下的体制性腐败所打破,促使人们从胜利的喜悦转向了冷静的反思,这两部史诗式的巨片,就是这种历史反思的产物。

《八千里路云和月》取材于随军抗敌演剧队队员的艰苦生活,影片中江玲玉、高礼彬等爱国青年千里转战,抗战胜利时竟无处容身;而江的表兄周家荣战时大发国难财,胜利后又成为巧取豪夺的“劫收大员”。作品以生动的电影语言,描绘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长卷,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黑暗。

在大师史东山的导演下,这部影片的故事、场景和人物,都十分贴切到位。抗战胜利、腐败加速的冷酷社会现实,使影片激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史东山借女主人公江玲玉之口,发出了至今仍振聋发聩的谴责:

这个世界,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民产,人人都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不敢言……

这是人的世界,永远这么不拿别人当人,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得太平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上海纱厂女工素芬与教师张忠良一家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沉浮,揭示

了中国女性在战乱中的悲惨遭遇,对于张忠良在大后方纸醉金迷中的堕落,实施了灵魂的拷问。这是广大观众至今仍十分熟悉的故事,本文就不赘述了。

父亲晚年曾谈到,当时制片耗资巨大,几乎吃光了他手头所有的流动资金,不得不四处调集头寸,以保障拍摄的正常进行。据说他解决燃眉之急的方法之一,是找老朋友吴蕴初帮忙,这位“味精大王”照例会给他一张产品提货单,倒手就可变出现金来办事。

由于资金紧张,两片的制作十分艰苦。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用的是一台老式法国“拜尔豪”单眼摄影机,每换一个镜头,就得拆下来调试一次;而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结尾的暴风

雨场景时,不得不抽用污水喷洒,搞得演员苦不堪言。为应付国民党当局的电影审查老爷,长袖善舞的夏云瑚只好到处送红包疏通。

《八千里路云和月》在1947年春公映大获成功,父亲却在巅峰到来之前选择了退出。任宗德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作为总召集人的章乃器先生日渐感到自己在创作、管理尤其是在经济上都作不了主,也不及时向他通报有关情况,愈来愈对联华影艺社的状况不满意。1947年2月,《八千里路云和月》完成上映,《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拍摄了一半,但所投入的十万美元资金已全部用完,联华影艺社面临着拍摄经费的巨大缺口。此时,虽然《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炮打响,受到好评,但是章乃器先生还是坚决地表示了退出联华影艺社的态度。章先生退出的理由有二:一是影片的摄制预算、成本、开支控制不住,随意开销,难以经营;二是夏云瑚不好相处,难以共事……

其实对民营电影制片机构的经营模式和发展蓝图,当时也存在不同见解

作为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父亲显然不喜欢电影界“草台班”式的习气，希望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进行管理。他对中国战后电影业的发展颇具雄心，据说第一步计划筹集美金十二万元，完成一两部大制作后，再吸引外资扩大到六十万美金的股本，参照好莱坞的制作运营模式，组成一个民营影业托拉斯，与官办电影公司分庭抗礼，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为中国的民族电影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他虽然认同左翼电影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但这套发展蓝图，显然与中共的领导方针不大合拍，后者一向是以俄为师，更重视电影的政治宣传效应。

联华影艺社于同年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由于在发展方向和人事上的分歧，父亲所代表的上川企业公司资金，没有转成昆仑影业公司的股本，仅作为对《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的投资。根据昆仑公司在1950年给父亲的信件记载，在分红比例上为两片三集发行收入的四分之一。

1957年“反右”时，父亲的民营电影发展方案被翻出来批判，作为他“投靠美帝”的罪证。虽然两巨片皆在他主持联华影艺社时期开始制作，但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完全没有提及，成了银幕背后的历史隐身人。

巨片公映，民族电影压倒西片

《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天亮前后》于1947年9月完成，与原联华影艺社摄制的上集《八年离乱》以及《八千里路云和月》一道，统一由昆仑公司发行。《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昆仑推出的第一部影片，但它是以前联华影艺社的名义出品的。任宗德说：“电影海报上的制片人标明的是陶伯逊、周伯勋，这是为了应付国民党审查机构，因为陶、周二位与国民党方面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实际上的制片人应该是章乃器、夏云瑚、陶伯逊和我四人。”

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初，并未考虑将该片分为两集。联华影艺社改组为昆仑公司后，筹得新的资金续拍。因素材内容丰富，又考虑到投资的阶段性，才分为上、下两集。故电影海报上，《八年离乱》标明联华影艺社出品，而《天亮前后》标为

昆仑影业公司出品。

《八千里路云和月》公映引起了轰动，被西方影评家称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半纪录影片”。田汉曾评价该片说：“这戏据说以一万八千的预算而用到五万万，超过一般国片的成本，曾使某些短视的投资者摇头却步，但这钱证明没有浪费，它十足替战后中国电影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

在票房价值上，《一江春水向东流》更胜一筹。该片于同年10月在上海首映，连映三个多月，场场爆满。据当时报刊统计，首轮观众人数为712874人，占全市500万人口的14%以上，平均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人看过此片，创造了1949年以前国产片的最高上座纪录，票房超过好莱坞进口片。上海的大光明、美琪等头轮影院，历来专映西片，此时撤下了美国影片上映该片。

《一江春水向东流》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鸿篇巨制，也是毫不夸张的。记得我幼年观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此片，是上、下集分开放映的，上、下午各看一集，觉得时间甚长；上小学后再次观看，则是上下集连映，反而短了许多。后来才知道原片全长七个多小时，1956年方剪裁为三个多小时。

两大史诗巨片的诞生，使昆仑公司的事业达到了巅峰。主角白杨、陶金成为如日中天的“影后”和“影帝”，主要配角吴茵、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也拥有上好的口碑，吴还获得了“东方第一老太”的美誉。

两片是中国影坛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的扛鼎之作，也永远奠定了史东山、蔡楚生在中国电影史上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

电影是艺术与技术高度结合的艺术形式，虽然两人都属于“水磨功夫”的电影大师，但风格却有所不同：史东山怜香惜玉而有豪侠气，作品大气磅礴，长镜头、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独具匠心，常念及“胶片来之不易”，临场惜墨如金，镜头处理干净利落。他能够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以三个多月的时间制作出《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巨片，其技术水平可见一斑。而蔡楚生则是柔情似水的才子型，细磨剧本且着意煽情。而于镜头技术运用则不甚自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临场拍摄，实由郑君里完成。蔡楚生自称：“我是艺术第一，找钱是公司老板的事”，故其影片制作成本甚高。1949

年后史担任电影局技术委员会主任，蔡则任艺术委员会主任，虽各得其所，亦不谓无由。

今天的观众在观赏中国老片时，常为片中演员的“话剧腔”所苦，这是那个表演艺术由舞台向银幕转型年代特有的痕迹。影评家邵牧君在评价史东山的艺术成就时，谈到了白杨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表演：“从少女时代的天真热情到中年时期的沉静抑郁，无不神情并茂，曲尽其趣，连台词也一洗拿腔拿调之病。同一位白杨，在相去不远的时间内，又主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相比之下，表演成绩便有明显差距，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导演的功夫了。”

分道扬镳，三人行终成独角戏

联华影艺社于1947年5月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名称是任宗德起的，寓意“攀登电影艺术高峰”，得到大家的赞成。昆仑影业公司的投资人为夏云瑚、任宗德和蔡叔厚，按股本比例计算，夏占六成，任占三成，蔡占一成。蔡叔厚这一成，实际上是代表中共地下党组织出资。夏云瑚任董事长，负责行政、发行，任宗德任厂长，管制片、生产，蔡叔厚任总稽核，统管财务。

任宗德说：夏云瑚当时投资的五万美元，是在新加坡的唐瑜以预付片款方式筹集，寄给昆仑拍片的。“夏云瑚收到这笔资金后作为自己的股本投资昆仑，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蒙在鼓里。后来《一江春水向东流》在新加坡上映获利甚巨，夏云瑚将五万美元归还了唐瑜，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向昆仑投入多少资金”。

《一江春水向东流》即将完竣之际，夏云瑚提出要撤资出国，另谋发展，同时力主将昆仑归并到文华影业公司老板吴性裁的麾下。吴在战前就是老联华公司的三巨头之一，战后在上海独资组建了文华影业公司，经济实力雄厚，早就有意兼并昆仑。由于阳翰笙、史东山和任宗德都反对兼并，夏云瑚甚为不悦，坚持要撤资退股。

《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国内上映获得成功，夏云瑚携拷贝远走海外，行前提走了约五百两黄金的股本，从此在资本上脱离昆仑。根据阳翰笙的意见，保留了他的董事长名义。夏在香港、新加坡发行公映此片，盈利颇巨。任宗德说：“这些发行放

映收入，夏云瑚一分钱都没有交回昆仑公司。后来，我到香港要他交账，他说赚的钱全用光了，现在还欠人家的账哩。有些用度，也不能告诉你，你也不必再问了！”

回收投资难是电影投资人永远的困扰。近年我查到上川公司协理黄玠然等给父亲的数十封商业信函，其中谈及上川董事会“对于电影款项，对方历次失信，甚为不快”。父亲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流亡到香港，继续从事民主运动。他偶然读到报上刊登的电影上映广告，发现两片在海外发行，却没有将收入返还给投资人，于是向夏云瑚等提出交涉，收回了一部分投资。

父亲为了自己和同人的生活，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用这笔钱加上其他资金，建筑豪华公寓并从事房地产买卖，经营得十分成功。这一时期内地白色恐怖严重，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等皆已转移到香港，任宗德也经常往返于沪港之间，并设立了昆仑香港分公司，与父亲也有来往。

1948年底，父亲接到中共中央的电邀，便毅然舍弃产业秘密北上，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和新国家的建设。

致命一击，拍《武训传》血本无归

自1947年冬起，任宗德以昆仑影业公司总经理身份，成为事实上的掌门人，昆仑公司进入了“宗记合作制片”时期。此后昆仑公司出品的影片《新闻怨》、《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都是任先生运作资金拍摄的。

这些影片都是民营电影的优秀代表作，但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人民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精神消费成为奢侈，票房效果不佳。在政治、经济的形格势制之下，昆仑公司巅峰已过，再也没有出品像《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大制作。

任宗德对昆仑公司的管理进行了改革，健全了制度。但他的经营仍十分艰苦，不但卖掉了洋房来拍电影，还经常向朋友轧头寸。他从一位利润丰厚的企业家，变成了“烧钱”的电影事业家。我曾查到任宗德1949年元月向上川公司借款的字据，是以“宗记制片”的《新闻怨》、《万家灯火》在新

加坡的部分发行收入作为抵押的。

1949年5月11日,任宗德曾约黄玠然在香港会晤,谈及夏云瑚迟迟不交出国外发行账目,对其作风深致不满,但“以多年交情与业务合作关系,未便破脸”;任先生提议与上川公司再度合作制片,但黄对合作早已失去信心,以“资金不宜过于分散”为由婉拒。

任宗德晚年曾谈到:“解放前后,著名爱国实业家古耕虞老先生资助昆仑拍摄《武训传》投资三万美元,交给夏云瑚,也是不知下落。”

就是这部《武训传》,把昆仑公司推上了绝路。该剧的电影剧本,是导演孙瑜在陶行知先生推动下,根据清末奇人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创作的。仅拍摄了三分之一,即因时局变化中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夏衍等人的推动下,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历经层层审查之后,于1950年2月开始续拍,主要演员赵丹对武训角色的把握十分到位。孙瑜对这部巨片期许甚高,希望会有《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成就。为此任宗德筹集了约相当于七八十万银元的制作经费,最终增补为上、下两集。

1951年初,《武训传》拷贝送到北京,请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审查,同时在中南海请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中央首长“审映”,获得肯定,其后毛泽东也调看过此片。

《武训传》通过审查后于同年2月在全国公映,一时好评如潮,昆仑同人欢欣鼓舞。但4月25日报刊就开始了对武训其人的批判,并扩大到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责该片犯了“投降主义”错误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武训传》的全面围剿。

身为中宣部电影处长的江青,此时已成为毛泽东在电影领域的“哨兵”。



《武训传》剧照

当她还是三十年代上海滩的电影演员蓝苹时,曾与夫君唐纳发生婚变,重回旧情人俞启威的怀抱,唐纳因失恋而两次自杀,皆获救。陶行知先生曾作《送给唐纳先生》一诗劝谕说:

夜莺不比燕子 / 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 / 如果拖泥带水 / 不如死了您的心。 / 如果她不爱您,而您还爱她 / 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灵。 / 把一颗爱她的心 / 移到她所爱的幸运。

明太祖朱元璋因早年当过和尚及乞丐,登基后忌讳臣下说“僧、光、化、电”一类字眼,触讳者必遭奇祸。“夜莺”蓝苹因此恨上了恩师陶先生,获得“她所爱的幸运”后,借批《武训传》批判陶行知,也就不足为怪了。青年时代就富于革命造反精神的毛泽东,曾与同窗萧瑜以乞丐身份旅行,浪漫地体验自虐的快乐,此片也会唤起他对这段社会底层生活的回忆。

慑于威势,党内赞扬过此片的人物(包括周恩来在内)纷纷检讨,郭沫若、夏衍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都被迫在报刊和座谈会上进行公开的自我批判。

雨暴风狂,影坛精英凋零殆尽

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艺术,是以民营电影为载体的。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

春水向东流》的辉煌之后,民营电影在政治大变局中走向没落。苦力支撑中的昆仑公司,经济上早已入不敷出,捉襟见肘。50年代初任宗德及昆仑公司写给父亲的书信中,已多次提到无力偿付欠款。那时投资大片与今天的“电影洗钱”不同,投资人是要自己承担经济风险的。《武训传》禁演后,任宗德欠下巨额债务,陷于破产境地,昆仑公司就此一蹶不振。

国民党时代留下七家民营电影公司,在1949年至1952年间陆续拍摄了五十八部电影,除《武训传》外,昆仑公司的《我们夫妇之间》、文华公司的《我这一辈子》、《关连长》及长江公司的《两家春》等,皆为影响甚大的作品。

民营电影以《武训传》遭批判为开端,迅速走向灭亡。连年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使电影艺术日益工具化,国家话语占据了影坛,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也紧随其后,开始了由缪司向婢女演变的进程。江青则成为电影事业幕后最大的权势人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史东山首当其冲。30年代江青为进入电影界,曾托魏鹤龄向他引荐,但东老认为此人顶多是个二流演员,未予重视;于是她又通过司徒慧敏结识蔡楚生,才获得了电影《王老五》中的角色,后来又拍过《狼山喋血记》。抗战期间她去了延安。

1949年东老推掉了海外片商十二万美元的片约,毅然北上参加新政协。50年代初,他和江青同列为“电影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江曾两次挟嫌报复未成。1955年批判胡风时,江青两次带卫士深夜登门,逼迫他就胡风案件做检讨(江无端怀疑他是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电影部分的执笔者)。一周后,重病中的史东山自杀身亡。他服毒后曾自行用灰锰氧洗胃,如及时抢救,尚有生还希望,但被电影界某负责人以须“请示中央领导”为由阻止。

东老在遗书中说“整风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份遗书被上交中央领导。当时周恩来正在接见班禅,临时中断接见听取紧急汇报,当场落泪。而周公所能做的事,是调动专列将一具玻璃棺材从上海运到北京,为这位老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并由文化部长沈雁冰签发了一纸《革命干部死亡证明书》。一桩文化名人自杀的公案,就在这刻意的哀荣中沉入海底,直到“文革”

中才被江青重新翻出,扬言“史东山是对党不满自杀的。”

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的同人也连遭厄运。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吴茵及其夫君孟君谋双双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这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扯起“虎皮”的“旗手”更是丧心病狂,欲将知其底细的电影界同事们统统置之死地而后快。蔡楚生是早年识拔她的“伯乐”,1949年后改走政治路线,为了革命宣传的需要,还把《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女主人公素芬的投江自尽的结局,改为到解放区投奔革命。“文革”中蔡被残酷斗争,迫害致死。其他电影人中,郑君里、孙师毅、徐韬、孟君谋、上官云珠、舒绣文等也未能幸免。阳翰笙、孙瑜、白杨、陶金、赵丹、吴茵等虽劫后余生,但艺术生命早已被提前扼杀。“文革”结束后,批判现实主义电影有过以谢晋为代表的短暂回潮,如今几成绝响。赵丹临终前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夏云瑚1957年从海外归来后,翌年被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聘为顾问;“文革”初期他身陷囹圄,1968年含冤辞世。蔡叔厚50年代受“潘汉年、扬帆案”的牵连,一直不被信任;“文革”中被捕,1971年也成为秦城监狱中的冤魂。倾家荡产支撑左翼电影的任宗德,1954年被安排到电影局基建处当一名副处长,后调至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工作,“文革”中又备受磨难;晚年定居香港,写下《我与昆仑——一个中国早期电影制片人的自述》存世。

曲终人散,云月水流皆成绝响

昆仑公司于1951年9月与长江电影制片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1952年1月又并入准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简称“联影”),1953年民营电影业全部转为国营垄断体制。国营体制没有生存压力,却有《武训传》的前车之鉴,电影从业人员的企业心和事业心日益消沉。

至此,自1905年发轫的中国民营电影业,经历了四十八年的凄风苦雨,最终在中国大陆成为历史。电影制作本来就是一种高风险投资,在艺术被过分政治化、工具化的社会背景下,电影投资失

败的几率更高。综观联华影艺社及昆仑公司从辉煌走向幻灭的全过程,企业家和事业家都不可能成功,只有投机家才能左右逢源。父亲的民营电影之梦早在国民党时代就已彻底结束,他作为企业家对两片投资的利润,至此也没有了下文。任宗德在抗战胜利时,也是一位拥有巨资的民族企业家,转变角色成为电影事业家后,最终在50年代初以破产告终。返观父亲在到达巅峰前的急流勇退,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抉择。

夏云瑚在海外活动十几年后回国,任宗德说:“他见到我时倒是很客气,但只字不提昆仑公司财务资金之事。我当时也不便追究,彼此间维持着一般的关系。”不久,夏独自与电影局、中影公司就最后处置昆仑公司影片版权及财务等事,签署了协议,将昆仑公司应该保留和享有的权益一概交出。事后任宗德得知此情,很有意见,曾向电影局有关领导反映过。父亲当时已钦定为“右派头子”,更完全被排除在外。

中国电影界历来是史、蔡并重,1949年以后,《一江春水向东流》曾备受褒扬,《八千里路云和月》则被长期冷落。翻开1963年成书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明显感到一种“抑史扬蔡”的意味。

在50年代初完成的《新儿女英雄传》中,我们已找不到史东山电影所特有的个人印记,但这种印记在其电影学术观点中仍然凸显。1949年7—9月间,他曾发表过三篇文章,对未来中国的电影方向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在《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内电影的主题和据点》一文中说: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应该不止是写工农兵,而也应该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工农兵的利益选择一切题材来写……

终究是形势比人强,他因此挨过江青的整,被指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后来电影五人领导小组讨论长影厂的出品《荣誉属于谁》时,他又当场对江青的专横提出异议,成为这个女霸王的眼中钉。到1955年批判他的老朋友胡风时,江青再度登门施压。他在便笺上写过“对胡风是人身攻击”的字句,又揉成一团扔进纸篓。苦闷中东老曾对夫人透露:“她说主席要她来关心一下电影方面的事……我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摆布?”数日后即辞别人世。

90年代初,我曾拜谒史东山先生的夫人华旦

妮女士,她在30年代曾怠慢过江青,“文革”中也横遭报复,被诬为“军统特务”投入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五个子女全遭株连。老夫人十分健谈,见到故人之子,兴奋地讲起当年的一些往事。我本有意询问东老辞世的经过,但恐怕触动老人的伤心事,欲言又止。

东老的女儿史大里曾谈及,虽然父亲的遗书被收走,她却从现场收存了三张字条,其中两张写着“漫不在乎个人的成败,但求得为人民服务”、“莫使烦恼和忧虑扰乱了我的神经,需要的是彻底的睡眠和休息”,还有一张为“患得患失是最下等的品格”。她透露:“父亲辞世之际之前,曾与母亲有长谈,但母亲对谈话内容至今守口如瓶。”如今老夫人已重病在床,这件事可能将成为永远的秘密。

不久前,我与东老的长孙史晨原,对坐于北京郊外的茶室中,谈起他祖父的人生悲剧。他不认同某电影史学者关于史东山作品反映出自杀倾向的观点:“我祖父不是那种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艺术家,他是个温和、细腻、有良知的人,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处境和爱情;以浪漫的、理想化的视角来看待现实,期盼并热爱新中国;但在新中国里,他做不了违背艺术良心的事情,被逼到墙角之后,唯一的解脱只能是弃世……白杨认为,他是以死抗争的英雄式人物。”

告辞出来时暮色已深,月光下浮云流动,银汉依稀。我恍觉有无数之目光,透过云层注视着万家灯火中的尘世,那些电影人的亡灵,或许正在时空中游荡,他们曾用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呼唤一个新时代的降临,却又被这时代所吞噬,这诡异莫测的夜空,便是他们永远的银幕……

人生无不散之筵席,时代留旷世之悲怆。文化专制是理想主义者的坟墓。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思想一旦被屠杀,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史东山在50年代“玉碎”,蔡楚生到60年代也未能“瓦全”,两部巨片是他们艺术生涯的最后辉煌。两位大师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和章乃器、任宗德、夏云瑚三人的民营电影之梦,也正如两片的片名一样,历经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后,最终“一江春水向东流”……

(责任编辑 萧 徐)

建国初《大公报》的一段曲折

● 王 鹏

1949年2月27日在解放后的天津创办的《进步日报》，是解放区新创办的第一份民营报纸。关于《进步日报》的创办，还得从天津《大公报》的停刊说起。

天津《大公报》的停刊

《大公报》是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中经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盘后组建新记公司，该报的声誉和影响逐步扩大，成为旧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份大报之一。《大公报》以天津为发源地，又陆续创办了沪版、汉版、港版、渝版、桂版。抗战胜利后，该报以沪馆为总馆，统辖各馆业务。但在1948年10月底，《大公报》（总管理处）总编辑王芸生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离沪抵港候船，准备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因此，总馆对各分馆暂时起不到“统辖”作用。天津《大公报》为维持局面，组建了临时馆务委员会，坚持每天出报。

1948年底，解放大军包围平津。此时的天津，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极力顽抗，迫害进步人士，一片恐怖。天津《大公报》在张琴南的带领下，坚守岗位，保护财产，并以自己的言论，有力地配合了平津战役的最后胜利，为天津的解放做出了贡献。1949年1月1日，该报发表题为《迎岁之辞》的社评：“今年可能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岁序更新，曙光甫启，敢望我同胞抱定信心，燃起希望，



向前迈进，凭借着光辉活泼而有生命力的信心和希望，就可以发挥无穷的力量，而克服一切苦难。敬贺同胞新岁健康，并祝今年大量进步。”2日，又发表题为《新年的新希望》的社评：“中华民国已度过整整三十七年，然迄今为止，人民对于国事，多是消极被动，听天由命，而绝少积极主张，主动参与的事实。要中国繁荣强盛，必须人民积极而主动，要排除本身疾苦，尤须人民积极而主动。‘民主’为今日主宰国族命运的人们所昌言，而中国人民大众对于国事应取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则是天经地义。我们愿祝这最低度的期望能于今年实现，更愿全国同胞从新年开始努力，争取这最低度期望的实现。”对中国的前途寄予期望。这一时期，天津《大公报》临时馆务委员会审慎把握言论尺度，以保全平津文物和工业基础为重点，压迫城内守军不得借“倚城作战”而肆意破坏，斥文化界、工商界中的南逃分子，鼓舞倡导工人护厂运动，深望各界坚守岗位，安心工作，以迎接光明。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当天中午全市戒严，断绝交通，炮声隆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警备司令部连连中弹。张琴南、李光诒、于效谦、刘洪升等报馆同人坚持继续编报，报道了天津解放的消息，张琴南还撰写了一篇庆祝解放的社评。印厂工人们用

手摇平印机印报,一张张掀过……直至印完,天已破晓,15日的报纸出版了。清晨,市民涌上街头,而报童和报贩们却未出现。《大公报》职工拿着新印刷的报纸,在报社门前摆了一张张条案,充当临时报贩,当街叫卖起来。正在市民争购时,来了两位佩带军管会臂章的解放军同志,友善地劝告他们,在未获得军管会批准以前,暂停发售。这一天的报纸(15日),仅售出5881份。

天津《大公报》酝酿改组

早在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关于在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对于像《大公报》这样的私营报纸,按照“决定”精神,“不得没收,亦不禁止其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在出版时应令其登记”,对报社人员“一般采取争取、团结与改造的方针,应以我们党员及进步分子为领导组织新闻团体,进行学习,改进工作与生活等方式,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天津解放后,中共天津市委由于缺乏经验,决定将天津各报一律停刊。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发出了《关于不要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给平津两市委的指示》,19日又发出了《关于天津旧有报纸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指示》,23日再次发出了《关于天津大公报、新星报、益世报的处理办法的指示》,纠正了一些不妥做法。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天津市委改而采取了“对停刊各报除已确定封闭者外,即以秩序恢复为理由,先令出版,待审查后再发许可证”的办法,以做补救。

天津解放以后,津版《大公报》处于停顿状态。张琴南等报社领导不知应该怎么办,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因都是单线联系,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具体指示,也不知该怎么办,而报社内的200余名职工的生活因工作停顿而陷入困境。张琴南找到军管会,希望代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很快得到批准。报社职工都参加了折叠书页印张的装订劳动,维持了职工生活。但津版《大公报》还能不能出版,大家心里都没有底。这时,杨刚、孟秋江、宦乡受党组织的指派,一身戎装来到报社,其中杨刚、孟秋江大家并不陌生。杨刚是1928年参加共产党,并于1939年

任《大公报》编辑、记者,孟秋江也曾是《大公报》战地记者。他们到报社后,马上联络了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杨邦祺(李定)、李光诒、胡邦定、傅冬菊、刘桂果等,投入了报社的改组工作。

从1949年2月3日开始,报社编辑人员分成小组,学习政策,检讨过去。许多人提出取消“大公报”三个字,代以新名继续出版。19日,报社召开临时职工大会,230余人参加。大会通过了4项决议:第一,原津版《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向军管会申请登记,再行出版。第二,通过了《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第三,通过了《进步日报暂行章程(草案)》。第四,选举了临时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临管会”)的组成人选,张琴南、杨刚、宦乡、徐盈、孟秋江、李纯青、高集、李光诒、彭子冈等9人为委员。20日,“临管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临管会”主任由宦乡担任,副主任由张琴南、徐盈担任,还决定了《进步日报》的领导人选:宦乡任总编辑,李纯青任副总编辑,杨刚任主笔,高集任新闻编辑部主任,孟秋江任采访通讯部主任,李光诒任社会服务部主任,赵恩源任研究室主任,徐盈任经理,杨刚、宦乡、李纯青、张琴南、徐盈任社论委员会委员。同时,报社内的中共党组织也组建了,杨刚任党组书记,李光诒任支部书记。

1949年2月21日,张琴南、徐盈、王秉衡等代表“临管会”来到军管会文教部,递交了申请出版《进步日报》的请示:“天津《大公报》同人一致决议停办天津《大公报》,联合愿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工作者共同创办《进步日报》。当于本月十九日举行临时全体职工大会,通过职工同人宣言与报社暂行章程及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名单。次日,临时管委会举行会议,推定经理、编辑两部负责人员着手筹备各项事务。现全体职工二百三十余人均加紧工作,并渴望能够早日核准出版。”2月26日,天津军管会发出由主任黄克诚、副主任黄敬签署的给《进步日报》社的“通知”。“通知”说:“兹据天津《大公报》同人代表张琴南等前来本会陈述该报同人一致决议进行改革,出版《进步日报》。今后以站在人民立场上从事新闻事业为宗旨,一切言论记事务,均以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为依归,并以民主集中制之原则进行内部组织与管理,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选定张琴南等人为委

员,以宦乡为主任,张琴南、徐盈为副主任。经本会审查,认为尚属可行,准予登记出版。”这样,《进步日报》就完成了全部出版登记手续。

经过“临委会”讨论,确定了《进步日报》的编辑出版方针:第一,“本报读者对象应确定为初中以上的学生、教师、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职工、店员、一般市民以及一切政治上还未进步或开始进步的群众”。第二,“本报应反映上述各阶层人士的生活意见,并根据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从解释法令文告、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实践中给以教育帮助,使能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团结他们在政府周围”。第三,“本报坚决拥护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并应尽最大的努力,揭发敌人,孤立敌人,瓦解敌人,发动民众,热烈支持前线,促进革命战争迅速获得全国性胜利”。第四,“本报应为扩大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革命阶层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第五,“本报同情并支持全世界反帝人民,特别是东方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自由独立的斗争,并反映其动态”。第六,“本报应反映、宣传、阐释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和行政措施,同时亦应根据具体真实的事实,对所有偏向或违反政策之行为,展开建设性的批评”。第七,“鉴于本市接收阶段似以大体上可告段落,今后中心任务似将转入恢复与改造阶段,本报应配合此项转变,鼓励并协助人民组织起来,消灭反动残余,重建人民民主的经常秩序,系统地建设人民革命政权,推行新民主主义政策”。

《进步日报》的创刊

1949年2月27日,天津《进步日报》创刊。它是解放区新创办的第一张民营报纸,但情况极为特殊,报社内建有中共党组织,又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领任何方面的补助和津贴。它既不同于解放前的私营报纸,也不同于解放后的各级党组织的机关报。

在《进步日报》的创刊号,刊登了两篇著名的文章,一篇是由张琴南、杨刚、徐盈、高集、彭子冈、赵恩源、李光诒等署名的《进步日报 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另一篇是《进步日报 是如何产生的——大变革中的一个故事》。这两篇

文章经新华社播发通稿,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当时西方各大通讯社都作了报道,着重指出它是中国解放区出现的第一份民营报纸,并评论说,允许民营报纸在解放区创刊,标志着中共新闻政策在转变,同时预示着在经济政策上对私营企业在放宽。但香港《大公报》编辑肖乾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1949年2月27日晚,正当我轮值全面负责报纸版面时,忽然在刚送来的当晚新华社的电讯稿中,瞥见一条消息:‘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并转发了《进步日报》的两篇文章。这时,各版编辑统统放下工作,争相来看这篇晴天霹雳的新闻稿,各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那时,香港《大公报》接到新华社发来的电讯,只字不改,一律照登。肖乾拿着新华社的那篇电讯稿连同《进步日报》那篇《代发刊词》,他迟疑了,要不要把全文发到排字房?“也就是说,要不要第二天早晨在香港以及全国各地千千万万读者面前痛搥一通自己的嘴巴?”肖乾说:“感情上难以接受,而政治上我又担当不起这个扣发的重责。可惜当时杨刚和王芸生都已相继北上,不然的话,也轮不到我来值班负责全面。于是,我就过海去找住在九龙的夏衍——他那时代表中共地下党负责同港版《大公报》联系。从他翻阅新华社通讯稿时脸上呈现的茫然神色看,我估计天津的党组织在这个改名问题上,事先并没有同香港的党组织有过任何联系。夏公沉吟了好一阵子,然后咬咬下唇,果断地对我说,一字不改地照发。于是,港版《大公报》次晨就在世界新闻史上开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新纪录:在自己的报纸上登出痛骂自己的社论。那天出版的港版《大公报》也应是收藏家们的一宗珍品。”

在《代发刊词》中,对解放前的《大公报》作了严厉的批判:“我们是前天津《大公报》社的从业人员,现在开始来办一个新的报纸——《进步日报》。利用这个时机,我们要向全国各界人士作下面这番自白。……我们要说一说《大公报》的真实面目。大家知道,在北洋军阀时代,《大公报》是依附于军阀官僚买办统治集团而生长起来的。等到蒋介石代替了北洋军阀,建立了卖国独裁的反动政权以后,它就很快的投到蒋介石的门下,成为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并列举了在近二十年来每一重大政治事件中,《大公报》和蒋介石政权

结成了“分解不开”的事例。在谈到《大公报》主持人“善于在所谓的‘社评’宣传上运用狡诈手段”时,《同人宣言》写道:“他们懂得如果完全正面为罪恶昭著的反动统治阶级说话,是徒劳无功的,因此,他们总是竭力装成‘在野派’的身份,用‘在野派’的口气来说出官僚家要说而不便直说的话……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它所骂的是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和二、三等的法西斯小喽罗,它所捧的是反动统治者的基本政策和统据国家地位的法西斯匪首,即其所谓‘国家中心’。长期处于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的读者,看了大公报的小骂,觉得很舒服,无形中却受了它的‘大捧’的麻痹。大公报以‘小骂’作为欺骗读者的资本,也以‘小骂’来向他们的主人要索更多的代价。……因此,大公报在蒋介石御用宣传机关中,取得特殊优异的地位,成为反动政权一日不可缺少的帮手。”《同人宣言》还表示了决心:“现在,我们有机会永远脱离《大公报》这个丑恶的名义而工作了。我们利用天津《大公报》原有的物质基础,创办这张簇新的人民的报纸。如果我们在《大公报》中工作的期间也曾犯过对人民的过失,我们将以今后认真的工作自赎。而我们从来所自信的一片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诚心诚意,将能不受拘束地充分地发扬在工作上面,使我们不能不万分的兴奋鼓舞。”

这篇著名文章的观点,是明显有误的。正如当时参与《同人宣言》署名的李光诒(中共党员)所说:“那篇《宣言》等于是份宣判大公报死刑的判决书。”对于这些明显有误的看法,当时的“临管会”成员之一的李纯青(中共党员)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撰写的论文《抗战时期〈大公报〉》,以其亲身经历和感受,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逐一批驳,力图以一个老大公报人的良心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来还其事物的本来面目。

后来,毛主席亲自决定保留沪版《大公报》,实际上是对前述不实之词的否定。

《进步日报》出版发行一周后,3月7日该报发表题为《新闻事业的新方向》的社论,畅谈了对新民主主义的新闻事业的认识。社论说:“本报创刊已经一周。我们的态度和作风,读者大致都有了解。在这里,我们愿就自己所感觉的新闻事业的新方向提出来谈一谈。……我们认为新闻事业首先是服从于经济政治的方向。它不是脱离了经济政治的事实而超然自在的东西。它一方面是剥削及压榨阶层控制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人民反抗剥削和压榨的武器。因此,新闻事业的方向就不能不有两种分歧。一个是压迫阶级的方向,另一个是人民的方向。……我们以为解放了的新闻记者和读者,应该认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虽然太阳在它突破了乌云忽然出现的时候,是难以看清,似乎生疏的,但是热与光的吸引力却会使我们自动的欢迎它,跟随它。我们的新方向就是我们的太阳,它会引导我们走向更丰富更广阔的人民的世界。”

《进步日报》创刊后,由于领导和编辑力量强,宣传上很有生气。但不久,杨刚、李纯青调往上海《大公报》,宦乡调到外交部工作,领导力量出现“真空”。8月9日,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给中共天津市委并华北局暨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



王芸生(左一)在上海《大公报》和《进步日报》的合并酒会上

《进步日报》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改变和充实组织机构的问题。经上级批准,《进步日报》领导机构和人选为:孟秋江任党组书记兼经理,张琴南为总编辑,徐盈任主笔,李光诒任副经理兼新闻编辑部、采访部、印刷部主任,胡邦定任社会服务部主任,研究部主任赵恩源,彭子冈任采访部副主任。

这一时期,《进步日报》每天发行2万多份,收支平衡,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银行贷款也能按期归还。报社在经营方面,充分利用原有《大公报》管理经验,狠抓广告工作,除春药、迷信、反动、可疑的广告拒登外,积极拓展广告来源,在创刊半个多月后就在第一版用整版刊登广告,收入逐步增加。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对《进步日报》这期间的工作是满意的,曾有这样的评价:“前《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以来,为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在知识界、工商界中发挥了某种特殊的作用。”

《进步日报》与上海《大公报》合并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读者主要阅读《人民日报》等几份中共机关报刊,像《进步日报》这样的“民营”报纸,不被读者重视,其发行量逐年下降,最少时只有1.8万份,甚至有些订户不再订阅了,形势日趋严重。特别是在编辑方向方面的缺陷,也是发行量下降的原因。例如,只是“一般的注意到面向知识界、工商界,发扬特点,与《天津日报》分工。但在客观上,尤其是后一时期,缺乏应有的特色,社论减少,采访跟着《天津日报》跑,两家报纸趋于雷同。再有就是私营报纸采访问题以及各机关部门发布新闻的问题没有解决,致使引起若干争执、抢先和排挤的现象,报道工作难以深入。”加之当时报社内部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发挥得不够,也削减了工作干劲。与此同时,上海《大公报》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发行量下滑,经营出现隐忧。1952年夏,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帮助解决报社的暂时困难。不久,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王芸生,当面向他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即:“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馆,报名仍叫《大公报》。

作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全国性政治类大报,分工报道财经政策和国际新闻。两报合并迁京,富余人员由津沪两地政府负责接收,安排适当的工作。”王芸生听罢愁云顿消,激动得说不出话。毛主席见状便风趣地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意思是说,原津版《大公报》易名《进步日报》,现在又恢复了原名,王芸生便是收复失地了。王芸生还担心两报合并后不好管理,更担心两报的编采人员不熟悉财经业务,怕承担不起这项重任,搞砸了。毛主席笑着鼓励他说:“你们两家本来是一家人嘛!《大公报》人才济济,团结起来,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悉了吗!”

1952年秋,中央宣传部指派孟秋江、李光诒到上海《大公报》了解该报人员的情况,准备北迁合并时遴选。是年底,孟秋江、李光诒和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副总编辑李纯青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谷牧、副部长夏衍、姚溱共同议定了上海《大公报》人员去留的原则,决定编辑部人员基本北上,经理部和印刷厂人员根据需要择优录用,留沪人员由上海方面另行安排。随后,决定北迁的人员分批北上,立即开始筹备出版北京《大公报》。

1952年12月29日,《进步日报》刊登“启事”说:“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为了加强力量,有效地在建设祖国、保卫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分担宣传报道任务,决定实行合并,于1953年元旦起在天津出版《大公报》。今后《大公报》的报道方针是:报道国家经济建设,宣传保卫世界和平。对国家财经工作,特别着重于贸易、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工商业等各个方面的报道及讨论;同时以较大篇幅,加强关于国际新闻的报道及讨论。为此敬告全国各地读者,并希多予指导与协助。”因国家正在北京为《大公报》社筹建新馆,该报暂时在天津出版。合并后的《大公报》,王芸生任社长,孟秋江、李纯青任副社长,张琴南任总编辑,李光诒、孔昭恺、赵恩源任副总编辑,孟秋江任党组书记。

1953年元旦,《大公报》在天津出版,自此创办了三年零十一个月的《进步日报》终刊。1956年夏,《大公报》的新馆在北京宣武区永安路18号落成,10月1日《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发行了。

(责任编辑 萧 徐)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兴起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这是 20 世纪中国第二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上承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先声,下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潮是人的重新发现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复兴。历史的灾难,常常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引发全民族进入一个反思的年月。人们追寻那场劫难的根源,并上溯 50 年代末以来几十年间,中国人民经历的曲折、挫折、不幸的缘由。人们发现“神道”的沉重,“兽道”的施虐,“人道”的泯失,人的价值的跌落。展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深感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尊重人、重视人之紧要。伴随着人的觉醒,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人们惊异地发现了一个不完全相同于传统诠释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不完全相同于长时间被曲解了的、“掐头去尾”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准确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人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人道主义是题中应有之义。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中长期被践踏的人道主义思想,从尘封的著作中发掘出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并把它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应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些“掐头去尾”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把马克思早期的,虽不成熟却是与晚年马克思一致的思想,如《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对晚年恩格斯的思想,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通信,漠然对之。完整地、准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是人,是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哲学,它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目标,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以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19 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就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是一个自由人

《人的哲学论说》序

● 顾 骥

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实现这个崇高的人道目标建立起来的。广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重视人的价值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怎么能把这种价值评价体系排除在外呢?这种价值体系又怎么能仅仅局限在伦理道德观之内呢?我国历史上缺乏尊重个人发展的文化传统,但有久远的人身依附和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下,对于 20 世纪第二次启蒙运动汹涌而来的人的哲学潮流所作的抵抗,其顽强程度可以想见。迨至马克思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时,其冲突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令人欣慰的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潮,愈来愈掌握了群众,20 年后,党中央在庄严的中央会议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口号,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根据党中央的建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这应看作是新的启蒙运动的重大认识成果。

薛德震同志是我国著名哲学家、理论家。他熟谙马克思主义,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他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理论上觉悟较早。在这场新的启蒙运动中,推波助澜,卓有建树。他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即单独或与人合作,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作了较系统的论证。它不是静止的、教科书式的阐释,而是锋芒犀利的论战。他的文章有严谨的科学性,又有生动的论辩性,文章聚集还显示出系统性。薛德震同志在这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所作的理论贡献,这本《人的哲学论说》便是史证。回首往事,斗争是异常艰巨的。当有人要“埋葬”马克思主义“异化”科学概念的时候,薛德震同志坚持不改对“异化”理论维护的初衷,这是要有点勇气与骨气的。薛德震同志是我同乡,我们曾共事于人民出版社,他的这本文集中的文章,过去读过一些,这次又集中读了一遍,深受教益,并感钦佩,这本文集在当下出版,正逢其时。

重读冯玉祥 再看国民军

——评人民出版社新书《国民军史纲》

● 马长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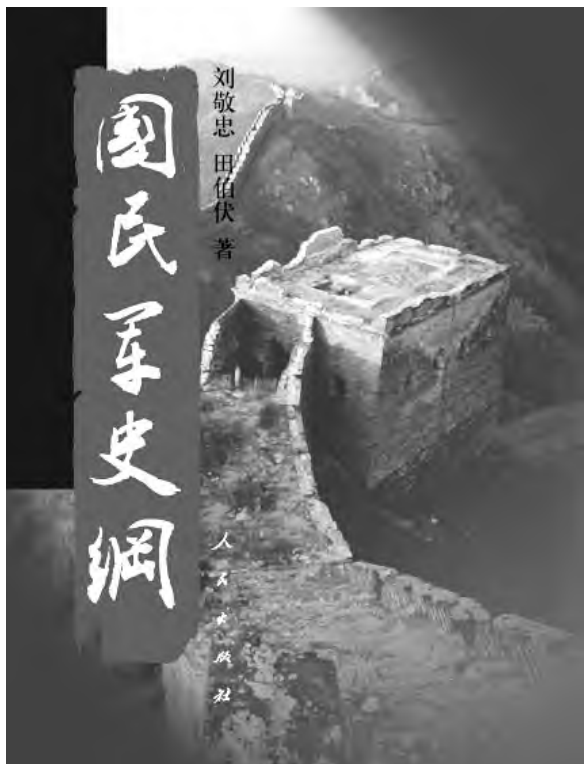
国民军成军于1924年10月北京政变,结束于1927年4月下旬,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虽然国民军存在的时间仅有两年六个月,但是这两年六个月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直、奉、皖、国、鲁、晋各派军阀的纵横捭阖,国民党、共产党、苏联、日英美法等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以及伴随其间的溥仪被逐出宫、北洋集团再分裂、中山先生辞世、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南口大战、大革命失败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使这段历史显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新书《国民

军史纲》,以国民军为主线,将这段纷乱的历史进行了梳理。

以往出版的有关国民军的专著,或为冯玉祥西北系军事集团人员撰写,局限颇多;或偏重于论述冯玉祥在国共两党帮助下的“进步倾向”,而较少论及其负面,对一些与其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略而不论。本书作者皓首穷经,二十余年来遍阅史料,以求实存真的史学精神结成了《国民军史纲》一书,为全面认识国民军及其统帅冯玉祥拨开了重重迷雾。

国民军的主要创立者和领导者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生于直隶(今河北)青县。行伍出身,辛亥革命前为北洋军第二十镇管带(即营长),并参加了滦州起义。1912年—1915年,在袁世凯亲信陆建章的扶植下(冯妻刘德贞为陆之内侄女),冯迅速被提升为旅长,所部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为冯氏起家的资本。此后,冯参与反袁护国,反对张勋复辟,支持护法战争。1921年,冯所部扩编为第十一师,冯任师长,兼陕西督军。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任河南督军。冯虽依附曹锟却非曹嫡系,故始终受到直系吴佩孚等的排挤,被调任陆军巡阅使闲职。冯勤于练武习文,且治兵有方,颇重视军队教育,或宣扬传统道德,或求诸西方基督精神,但始终缺乏明确的政治理念。

冯玉祥因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而名声大噪。冯、胡、孙在北京政变后组成了国民军并分任国民军一、二、三军军长,冯兼任总司令。冯玉祥驱逐逊清废帝溥仪出紫禁城,又数电邀请孙中山北上,一时博



《国民军史纲》封面

得了社会的普遍同情。然而,冯玉祥并不理解孙中山事业的意义,在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同时,又促段祺瑞复出主军,加张绍曾为总理主政,试图把各派政治力量纠合在一起,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奉系张作霖挥师入关,在追歼直系残余的同时更欲染指京畿。奉系害怕冯玉祥独控北京政权,极力捧段再起,参与策划了北京政变的段祺瑞此时已无军事势力,只有靠奉、国两大实力派的支持才能上台。冯、张均力主对长江各省直系实力派用兵,段则坚决反对,试图保存直系残余为己用,以维持对奉、国两系的政治均势。冯玉祥在各方的军政压力及既得利益诱使下,改变了自己拥戴段



冯玉祥将军一家(前排右二为李德全夫人)

孙合作,建立一个左倾色彩的中央政权的政治初衷,最终和奉系及段祺瑞达成了组成执政府的政治交易,段以执政名义集元首和总理于一身。段祺瑞独自出山总揽大权使冯玉祥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不仅无法向孙中山等左派人士交待,国民军所获实际利益比期望的又少得多,在奉军的强大压力下冯又不敢力争。这种结果是冯玉祥军阀实用主义立场及个人性格所决定的。冯玉祥一生中,在很多重大军政事件的处置上都有虎头蛇尾、瞻前顾后、摇摆不定的特点。这在北京政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北上途中所说的:“当初北京发生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色彩,后来……就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到别种力量的牵制,不像革命运动。”

孙中山北上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段祺瑞则积极筹备“善后会议”与之在政治上相对抗。国民军在总体上对“善后会议”是支持、捧场的态度,并力争在会上谋取更多权益。善后会议的前前后后,国民军一、二、三军配合得相当默契和巧妙,使自己成为会议的最大收益者。会前,冯玉祥为急剧扩充到15万人的国民军一军争得了较稳固的地盘和军队编制;会议期间,国民军二军巩固了其在河南的统治地位,并为国民军三军取得陕西奠定了基础。本书用大量史料,证明冯

玉祥《我的生活》及李泰棻《国民军史稿》中称国民军及冯本人对“善后会议”持反对立场,实属不实之词。

冯玉祥等人对国共两党及苏联的实用主义政治态度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当段祺瑞复出已成定局之后,冯玉祥十分明了,国民军很难和皖段及奉张长期合作,段、张之间也有矛盾,但在政治问题上却有很多共同点。国民军一军虽然控制着北京,但在政治上没有掌握中央的任何权力,军事上又承受着奉系的巨大压力。冯玉祥急需扩充所部军队,但他既无金钱又无武器,所以只能向国民党靠拢,并由此而从苏联取得军火武器,舍此别无他途。中共、国民党、苏联也将冯玉祥的国民军作为联合的对象。冯玉祥接受左翼力量的一些建议,如在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允许国民党组织在国民军中公开活动等等。有鉴于此,左翼政治力量均认为冯玉祥有较大的进步;中共也认为国民军倾向革命,是一支区别于奉直军阀,“较为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而右翼势力则攻击冯玉祥及国民军“赤化”,在华的外国记者都不再称冯玉祥“基督将军”,而改称他“赤色将军”了。实际上,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政治表现有复杂的背景,其“进步”的局限性极大,功利实用色彩颇浓,往往处境困窘时与孙中山联系较

多,反之则少。苏联顾问也抱怨说:“冯在军中对政治工作严加限制,只是在需要和符合冯的利益时才许可。”尽管如此,冯玉祥与北洋其他军阀相比还是有区别的,他背后没有帝国主义,并始终表现出坚决的反帝立场和爱国热情。所以,他有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基础。但是直到南口大战前,冯玉祥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变化。

多年以来,学术界对冯玉祥及国民军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评价甚高,认为是“国民军思想划时期之转变”,“从此,冯玉祥对基督教信念彻底幻灭,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摘掉了自己“基督将军”的帽子。实际上,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冯玉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最感兴趣,本身又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背景,与一些反动军阀人物在“五卅”运动中的沽名钓誉式的表态有区别。在20世纪20年代反帝群众斗争日益高涨的大背景下,冯玉祥能够言辞激烈地表态,并坚决地采取了一些支持群众运动的举措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本书作者研究发现,在“五卅”运动爆发后,冯玉祥并没有立即公开表态,其发通电的时间比岳维峻(二军胡景翼的继任者)、孙岳还晚四天。冯玉祥之所以到6月8日才发通电表态,是顾虑到支持人民斗争会增加自己的“赤化”色彩,所以先去征得了奉系张作霖的赞同后才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的。1925年7月13日,“五卅”运动尚在高潮之中,冯玉祥就发出了有名的防止“赤化”的通令。他认为共产主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正如李大钊曾对苏联顾问说的:“你们以为冯玉祥当真有志于革命活动吗?即使他再活这么多年,他也成不了革命家。”

1925年11月22日,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奉系将领郭松龄在直隶滦州发动了反奉战争,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迅速回师占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张作霖措手不及,处境岌岌可危。郭松龄起事前曾同冯玉祥达成反奉密约。密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保证奉系李景林在直隶地盘的基础上再得热河。郭松龄深知自己要想反奉成功,必须得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即必须得到李景林的支持。但是,原本态度犹豫的李景林最终参加了反奉密约是冯玉祥未

曾预料的。北京政变后,正是这个李景林把直隶从国民军手中夺走的,使国民军失去了惟一的出海口。国民军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当看到郭松龄的军事发展异常顺利时,国民军悍然违反密约中保证李景林地盘的约定,进军直隶、天津、热河,将本来已成盟友的李景林又变成了敌人,使郭松龄反奉功败垂成;否则,不待北伐奉系已被打倒。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将郭松龄反奉失败的罪责归于李景林而闭口不谈自己的背约行动,实为替自己开脱责任。

对大革命时期历史的研究,长期存在重南轻北之弊。其实,北伐战争的胜利除了国共两党浴血奋战之外,实得益于北方历时四个月的“南口大战”。1926年4月下旬,奉、直、晋三系军阀组成“讨赤联军”,总兵力五十余万,在多伦—南口—晋北绵延千里的战线上向国民军发动进攻,而攻击的中心点就是北京西部的南口。国民军十六万人坚守南口四月后撤退到了绥远。本书作者认为:南口大战是中外反动派对国民军在当时中国政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判断错误造成的。一方面,他们视广东国民政府为偏师,不予重视;另一方面,竟把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一心想留在北洋军阀集团的国民军当作了主要的围剿目标。阴差阳错,国民军充当了“革命的盾牌”。南口大战历时数月,不仅吸引了张作霖、张宗昌等属下的部队,而且长时间拖住了直系吴佩孚主力十余万人,北伐军乘机在两湖用兵,一举成功。南口大战,应视为国民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军及其统帅冯玉祥与北洋军阀集团决裂的标志。冯玉祥及国民军从此转变为有比较明确政治纲领并站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的武装力量。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参加国民革命,不过是将上述转变公诸于世罢了。

一个历史人物或为革命者,或为反动者,除了本人的主观因素外,历史大势的影响,甚至造化弄人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断无天生的革命者与反动者。作为史学家去论史论事论人,应能做到正面事不溢美,负面事不隐讳。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称持平之论。以此衡量《国民军史纲》,是当之无愧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美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 张宇燕 富景筠

依照通行衡量腐败程度的国际标准,现今世界约有 10% 的国家腐败水平最低,美国即名列其中。然而,一个世纪以前,美国腐败的泛滥程度和恶劣后果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文打算通过对这一特定时段内美国腐败与反腐败历史演进轨迹的描述和理论分析,归纳出导致美国腐败滋生、蔓延、猖獗、并最终被相对有效治理的原因或规律。

腐败的概念和类型

一般认为,公共部门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或背叛公众信任,或为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或物品,从而造成公共财富的损失。

对腐败进行分类的标准很多。大体而言,它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即体制型腐败和收买型腐败。

体制型腐败含义为:政治行为者通过有选择性地授予经济特权或限制准入来创造经济租金,并利用经济租金巩固、加强其对政府的控制。这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政治行为者操纵经济系统,政治过程腐蚀经济生活。换言之,财富创造者的权利时刻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投靠、依附于政治权势集团。

收买型腐败含义与之相反:各种经济利益集团通过行贿政府官员影响立法司法、政府管制和政策制定,并最终服务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此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行为者操纵政治,经济利益腐蚀政治过程。经济学中讨论的所谓“俘虏理论”,即公职人员受贿而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虏,便属于典型的收买型腐败。

从相当意义上讲,体制型腐败和收买型腐败可以被视为“腐败色谱”的两极,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腐败大

都两者兼有之,区别在于哪一种腐败的色彩更浓重些。一般而言,体制型腐败色彩越重,损害就越大。

美国历史上腐败的时间路径与表现

美国历史上腐败丛生,触目惊心,而且从统计上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国自 1815 至 1975 年间的腐败现象,计算出“腐败与欺诈指数”并描绘了腐败指数曲线。这些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历史上腐败高发期共有三次,它们分别集中出现于:1840 年前后,指数在 0.611 至 0.870 之间;1857 至 1861 年间,指数在 0.711 和 0.837 间;19 世纪 70 年代,即共和党总统格兰特执政期间(1868-1876),指数创下 1.03 的历史纪录。自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腐败与欺诈指数逐步走低,并在 1914 年前后出现 0.16 的最低水平。该指数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又微幅上扬至 0.274。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美国腐败与欺诈指数基本保持稳定,大体在 0.2 的水平上轻度波动。

美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收买型腐败。带有浓重收买型腐败色彩的典型实例,是一种被称作“政治机器”的政治组织和以其为中心的制度安排。政治机器兴盛于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 20 年代。它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而是通过老板和各利益集团的幕后交易来运转的。鉴于地方政府的职位均由竞选获胜者控制,故公职人员大都与当政者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由庞大的官僚体系负责执行以恩惠换选票的具体操作,乃政治机器的另一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选民期待政府维护自身利益、提高福利水平,政党则以利益分赃为诱引招揽选票,官僚为保住饭碗或扩大利益而介入其中,老板及其帮凶游刃有余于三者之间。由于

利益均沾,这种收买型腐败在全美甚嚣尘上。至1890年,政治机器已控制了美国20个大城市中的一半以上,并支配着当时绝大多数的美国城市政府。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政治机器,是纽约市的坦慕尼协会。

在三个高峰期内,政治机器制造出的腐败归为行政、司法、立法腐败三种类型。

行政腐败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分配公共职位。每一个被政治机器掌控的城市,都拥有众多政府部门和成千上万可以被用于犒劳或施惠的工作职位。仅就纽约市而言,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该市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所垄断的市政职位多达4万。不仅如此,机器老板还牢牢控制着市议会席位和地方检察长的任命权。

二、偷窃国库。政治机器具有自我保护的优势,即在方便公职人员攫取好处的同时,还使这种攫取变得更加安全和隐蔽。有了这种庇护,一些利欲熏心的政治家和官僚便敢于铤而走险,贪污受贿。前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1853—1855)威廉·特威德(William M. Tweed, 1823—1878)任坦慕尼协会老板期间(1868—1871),纽约市腐败达到了顶峰。据不完全统计,他直接或间接盗取国库的金额不少于3000万美元(按1870年美元价格计算),甚至高达2亿美元。窃取国家财产的另一种形式是违法出租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典型实例是哈丁总统执政期间(1920-1924)的茶壶顶丑闻。内政部部长福尔于1922年分别把怀俄明州茶壶顶和加州爱克山的海军石油保留地秘密出租给石油大亨。两笔交易都没有采取竞争性投标方式。经调查发现,福尔共收取了40多万美元作为促成两笔交易的“劳务费”。

三,泄漏与利用内部信息。公职人员牟取暴利的另一个途径是泄漏内部信息或直接利用这类信息进行投资。任何与城市建设规划有关的内部信息,如高架桥的搭建、高速公路的铺设、街心公园的改造等,都可以被政治家和官僚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预先廉价买入附近地皮,在市委员会将计划公布于众,该地皮价值攀升后抛售,以套取巨额收益。

四,在政府采购中巧取豪夺。其典型表现是,以签订政府工程项目采购合同的形式将巨额财政支出转移给私人企业。许多城市的财政资金被存入与政府关系良好的商业银行;城市医院的药品和贫困居民的救济物资供应权被特定企业垄断;街道清扫、垃圾收集等市

政服务被外包给指定承包商,其中,见不得人的脏款或回扣都进入了腐败官员们的腰包。

五,违规出让特许经营权。通过出让特许经营权从私人企业获取贿赂和回扣的现象,在19世纪末的美国政府官员中是司空见惯的。圣路易斯一家名为“市郊铁路公司”(Suburban Railway Company)的总裁查尔斯·特纳被证实向该市上议院和下议院的立法者行贿14.4万美元以获取价值为300万美元的特许经营权。通过不断向新公司发放竞争性特许经营权,这帮官员还“导演”了多起公司间的兼并与反兼并战,从而坐收渔利。

六,实施弹性管制。在管理被禁止或受限制的行业时,公职人员通过向私人集团大开方便之门聚敛了巨额财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许多城市政府对赌博、烈酒和性服务场所的建立实行管制。在纽约、费城、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匹兹堡、芝加哥等大城市普遍存在公职人员课征行业准入费的现象。其中,纽约和明尼阿波利斯的市政官员和警察公然收取贿赂;而在费城,这种索取则较为谨慎,即由一些“财团”来承担好处费的征收工作,继而将其分发给政府官员。为坐享垄断租金、防止竞争对手进入该行业,私人企业会源源不断地向官员们支付回扣以促成于己有利的政策或规定的颁布与实施。在联邦酒精缴税率被大幅提高期间,许多酿酒商为偷税漏税大肆贿赂财政部官员,并以远低于票面价值的支付获取纳税凭证。据证实,在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百余名财政部官员因涉嫌受贿被定罪,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威士忌酒帮事件。

美国的司法腐败和立法腐败与行政腐败相比毫不逊色。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通往司法公正的道路被金钱和权力堵塞。政治机器影响并操纵着各州和地方法官的选派过程,并把持着法官席位的任命权。于是,许多法官纷纷沦为政治机器的帮凶或傀儡,而不再是司法公正的代言人。由坦慕尼协会老板特威德挑选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就是多次司法腐败案件的主谋之一。在其包底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被减刑或赦免。此外,工商业巨贾通过行贿立法者、法官和陪审团干涉判案过程的事件也屡见不鲜。19世纪末,美国司法腐败事件频繁发生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road)主要的股东、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爱米斯于1867年组建的Credit Mobilier公司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邦政

府诈骗数千万美元。为阻止政府调查和介入,爱米斯通过分发铁路股票疯狂贿赂国会议员,并成功地将司法部门的审查拒之门外。据证实,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科尔法克斯收取了大量铁路股票;此后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詹姆斯·加菲尔德也卷入此交易中。尽管该丑闻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0万美元(按1870年美元价格计算),但美国司法部并没有起诉爱米斯的腐败行为。这场沸沸扬扬的丑闻以不了了之告终。

在美国历史上这一深度腐败时期,遭受腐蚀侵害的不仅是行政和司法领域,其立法机关同样不曾幸免。通过控制议会选举和操纵立法程序,腐败集团从事罪恶勾当时就愈发无所顾忌,并且为其腐败行径披上了光明正大的“合法”外衣。19世纪70年代初,纽约州和纽约市的议会选举处于坦慕尼政治机器老板特威德的绝对控制之下。他们篡改得票数字,更换候选人姓名,把事先商定的人员推进议会。运用胡萝卜与大棒并举的策略,特威德在纽约州立法中取得重要胜利,并促成新城市宪章的批准执行。由此,特威德集团的权力极度膨胀。在这帮强盗的运作下,众多纽约市政工程项目的提案批复畅通无阻;一系列欺骗性法律协议被恣意捏造;而利用立法或政府管制规章条例收取巨额回扣竟成为堂而皇之的“正业”。这一时期,私人利益集团的冲突与争斗更让腐败的立法机构丑态百出。19世纪末,为了争夺厄利铁路公司的控股权,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铁路巨头范德比尔特与厄利铁路公司巨富古尔德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就经济实力而言,两人旗鼓相当,他们对纽约州立法机关的影响亦此消彼长,最终竟导致了一场立法危机。随着权力争夺的日趋白热化,被逼无奈的纽约州参议院和众议院的立法者最后决定公开拍卖政策法规。由于古尔德集团的出价更高,代表其利益的议案得以顺利通过并被写入该州法律。范德比尔特对厄利铁路公司的控股计划终成泡影。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腐败现象高发的主要原因

从根本上说,美国这一时段的腐败滥觞于经济对政治的支配,即商人集团对官僚集团的收买和控制。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之所以成为被俘获的对象主要是因为它的手中握有大量公共资源,其中包括财政预算支出,诸如土地和矿产等公共财产、非中性的法律规章制度的设立等;同

时,运转政府的公职人员在分配公共资源的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作为一个等级结构,政府各层次的公职人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对其的有效监督变得困难。

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规模的急剧膨胀及地方政府支配公共资源之能力的加强,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1870至1913年间,美国GDP总量增长了2.4倍,其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从8.9%猛增至19.1%。这一时段人均GDP分别是1820-1870和1913-1950年间人均GDP的1.39倍和1.12倍。按1879年美元计算,美国工业总产值从1859年的8.6亿美元增长到1899年的62.6亿美元。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和国债发行量大幅增长。按2000年美元计算,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均财政收入是60年代的2.45倍。政府举债总额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扩大了近15倍。经济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公职人员在腐败交易中可攫取的财富必然增长。而政府对市政规划的大规模投资又为公职人员创造了大量以权谋私的机会。此外,美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行政管理亦逐步加强。一批规章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刺激了公职人员创造租金的动机,并增加了其操纵经济活动的可能性。

腐败高发的另一导因是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的迅速城市化,具体表现为大批移民涌入美国城市。至1900年,美国城市人口从1860年的600万增至2400万。其50个主要城市中的移民人口已占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有些城市,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8%。新移民急切需要摆脱卑微的身份,因此,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能否通过选举这一权力或利益再分配过程来改变自身命运,而不在意政府官员的诚实品格与廉洁作风。在他们眼中,效忠代表自身利益的某个人,带来的实惠高于效忠抽象的法律和道德准则。新城市移民的这种趋利心理随即被政治机器加以利用。以就业机会、住房以及公民证为诱饵,政治机器轻而易举地收买了众多选民,并借此维持并巩固了自身的执政地位。此外,正是由于吸收大批新移民,一些原本无党性的组织迅速退化成政党分肥的操作机器。坦慕尼协会从一个慈善机构向政治机器蜕变的主要原因,就是大批爱尔兰移民的加入。

在19世纪末的美国,金钱腐蚀权力的发展势头愈发不可遏制,实业和金融巨头聚敛了大量财富。凭借手中的金元,他们疯狂“收购”公职人员持有的政治权力。结果,美国政府不但在财力和经济寡头们相比黯

然失色,而且其治理能力和意志也软弱涣散,难以与之抗衡。社会成员间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导致了贫富阶级之间或不同阶层与行业之间讨价还价能力的严重失衡。当“强盗贵族”们侵犯弱势群体权益时,他们往往可以通过买通法官或操纵司法程序而逍遥法外。于是,在金钱的利诱下,治理者最终沦为那些慷慨行贿的被管制者的俘虏,从而使“强盗贵族”们逃脱了本应履行的赔偿责任,而弱势群体的应得利益却无从保障。

这一时段内美国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或相对滞后,也是不能不被提及的。彼时的美国法律,针对腐败行为设置的相应惩罚措施过于宽松。这样,当贿赂数额巨大、被揭发的几率很小、惩罚措施又非常温和时,权钱交易式的腐败行为必将扩散蔓延。另外,当时的法律同样缺乏对公职人员某些腐败行为(如泄漏内部信息)的裁定标准,处理具体案例时对尺度的把握弹性又很大。

最后,在马克·吐温记录的“镀金时代”,整个社会风气都被拜金主义所弥漫。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至少为腐败的土壤提供了养料。

促使美国摆脱腐败困境的诸因素

通常意义上讲,提高腐败交易的成本、减少腐败行为的收益,将有效地抑制腐败。公职人员面对的腐败交易成本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法律的惩罚、公检法的查处、党派或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冲突、新闻媒体的披露、公共力量的监督。

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是防止腐败的重要制度保障。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彭德尔顿法》确立了一套以功绩制为核心的文官选拔和奖惩机制,打破了政治机器垄断职位任命权的局面,从而重挫了分赃交易者的嚣张气焰。此后,为保证政府廉洁、防止金钱对选举的渗透和腐蚀,国会相继通过了一系列与抑制腐败密切相关的法律,比如禁止公司向联邦公职候选人捐款的法律(1907年)、竞选经费公开法(1910年)、联邦反腐败行为法(1925年)和禁止联邦文官参与政党活动的哈奇法(1939年)等。这些法律反映出廉洁而高效的政府应遵循的三个原则,即高度透明性、强烈的责任感、权力限制。随着美国对政府道德标准的不断修订,其所谓“现代公共道德管理体系”亦开始逐步走向成熟。

对腐败行为的制约有赖于法律规章制度的不断完

善,更离不开监督执行这些法律规章的独立机构。在美国,负责调查和起诉公共腐败行为的联邦刑事机构,有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非刑事公共廉洁机构包括司法部律师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和白宫律师办公室等。20世纪以来,近80%的公共腐败案件是由联邦检察机关依据《腐败行为法》提出诉讼的。可见,联邦检察机关对各州和地方官员腐败行为的稽查和侦破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

势均力敌的党派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并形成的相互制衡与监督,客观上成为抑制腐败的有效途径之一。通常意义上讲,现行腐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会生发变革现状的需求或动机。真正意义上的挑战者来自那些不能从现行制度中受益、却试图以改革为旗号重新确立权力分配机制的利益集团。政治上的竞争以及支配政治竞争的强大利益集团,使他们均产生了以腐败罪名指控反对派或潜在挑战者的动机,从而在客观上提高了隐蔽性腐败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政治利益的冲突也会激励法官严厉处罚政治对手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举例来说,共和党政治机器任命的法官即使是腐败共谋者,仍可能给民主党腐败官员定罪。甚至在十分腐败的司法体系下,法官仍具有把异己政党的腐败官员绳之以法的主观意愿。

新兴经济利益集团(比如制造商)的崛起和壮大,大大加快了美国反腐败进程。与房地产开发商、酿酒商和有轨电车公司业主等既得利益集团不同,制造商集团没有同市政府共谋勾结的愿望。相反,他们站在了改革阵线的前沿并构成了一股重要的反腐力量。究其原因,制造品的销售市场不囿于特定城市或某个州,而是延展至国家甚至国际市场;而在操纵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方面,市政府鞭长莫及。因此,即使制造商给予城市官员数量可观的贿赂,后者也不能在增加利润上助其一臂之力。对制造商而言,至关重要的就是市政府能够高效而廉洁地管理城市,缩减行政管理费用。这股反对力量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减少腐败、敦促市政府创立和推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与政策作为自己的职责。考虑到城市的财富积累或财政收入在相当程度上仰赖制造商销售利润这一事实,即便是腐败的市政府也会因从财富的增长中获益而避免对制造业实施破坏性政策。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为制造商力量的壮大营造了有利的环境。

被称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世纪末,随着印刷技

术的改进,报业成本大幅度降低,而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则使报纸需求量迅速增加。这一时期,美国新闻媒体在财政上逐步脱离对政治机器的依附,独立性日益增强。1870年,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仅为11%。至192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62%。新闻媒体不再是政党、行业、地区等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而视自己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努力表现出与它们泾渭分明的立场。在遏制腐败的过程中,通常是由新闻媒体对腐败事件或腐败人物的披露为先导。新闻媒体的穷追不舍和深度挖掘,一方面促进了公民道德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对潜在腐败官员产生震慑作用。它们对政治丑闻的揭露和批判,还往往导致政治家竞选败北、引发检察机关进一步调查介入。1876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不敌民主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媒体将格兰特总统的Credit Mobilier公司丑闻公之于众。而媒体对茶壶顶丑闻和特威德集团腐败行径的揭发和谴责,无疑推动了联邦监察机构的相关调查。就抑制腐败的效果而言,一股强有力的公共舆论监督力量有时比严酷法律的作用更为显著。众目睽睽之下,政府官员明目张胆地利用职权寻租或创租的行为必将有所收敛。

公共监督力量主要指由公民自身或宗教领袖等组成的具有意愿、且敢于直面谴责腐败的社会群体。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积累,国民教育水平和素质普遍提高。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高涨,公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平民党运动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弱势群体,以使其免受工业巨头的侵害。这场运动促使政府对大企业的非法侵权行为实行有效控制。19世纪80和90年代席卷美国、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1830-1877年间所发生的分散的罢工运动和佃户的反抗斗争,这大大遏制了公职人员和产业巨头的腐败行为。进入20世纪,以消除政府腐败、改善政府管理、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为宗旨的进步主义运动掀起了公共部门的改革浪潮,地方事务由选民公决决定、参议员直选等制度的确立,均对于推动美国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降低公共部门的腐败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均对美国反对腐败政治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了提高腐败成本外,降低腐败预期收益也是遏制腐败的一大手段。

以限制或避免腐败萌生为目的的制度设计,乃使腐败收益减少的一个重要渠道。腐败收益取决于政府产品的稀缺性和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同质的

政府产品或服务不是由一个机构垄断,而是由多个代理人提供,且他们是非共谋的,那么政府产品和服务的稀缺程度就会降低,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也就相应减弱。引入一种旨在利用政府内部压力抑制腐败的竞争性官僚系统,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关键因素。在这种系统下,每个人都有权获得某种利益,且公职人员很难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给某些人以超过其应得利益的好处。在美国,公民的护照、驾驶执照和营业执照并不是稀缺资源。如果一位官员向合格的申请者索取贿赂,申请者会自然地产生举报该官员索贿事实的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向其他官员重新申请并获取同质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腐败动机的产生受到抑制,贿赂自然大幅度减少。

设立公职人员管辖范围的交叉重叠区域,是缩减其自由裁量权的又一个有效办法。如果每个公职人员掌控的是一个界限鲜明的势力范围,且在这个范围内他们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那么腐败的社会危害便将达到最大值。公共权力的交叉重叠便是针对这种危害而被设计出来的,它们既可以是纵向重叠的,也可以是横向交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由此引起的交易成本会增加,但权力的重叠与交叉将大大减弱公职人员与私人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在控制非法毒品的政府行动中,美国地方、州和联邦政府权力的纵向重叠和地方各行政机构的横向交叉有效地抑制了警察腐败的发生率。赌徒或毒贩子们在试图收买警察时不会给某一个警察大笔贿赂,因为管理他们的警察不只一位,任何一个警察都不能完全保证他们的安全。

联邦政府对州、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及监控力度的加强,极大地抑制了腐败的蔓延。从经济效率上讲,集中型收租机制优于分散型收租机制,因为前者产生腐败的可能性低于后者。倘若联邦政府的实力软弱或权力分散,地方的经济军阀势必猖獗,群龙无首、掠夺无度的现象将难以遏制。经济学意义上的军阀割据必然使经济无效率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与之相反,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能力的加强必将限制其自行设租、从私人企业处索贿的空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美国联邦管制兴起时期。联邦政府的影响、甚至控制银行业、保险业、运输业、食品和药业竞争以及各州间贸易等方面的权力急剧膨胀,并取代了州和地方政府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管制者,同时也成为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险等公共救济的主要提供者。联邦政府相对集中财权并加强对经济的管制,令地方上气焰嚣张的腐

败遭受重创。

政府对稀缺性公共资源的管制和分配容易导致腐败的发生,而将一些被禁止或限制的活动合法化,亦即对腐败预期收益釜底抽薪,则是根除这类腐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当一种经营被宣布为非法时,为保证自己能够继续从事该行当,企业易产生行贿动机,而公职人员也拥有了操纵法规索贿的机会。此时,与法律执行过程中各环节相关的公职人员都可以分一杯羹。可一旦该经营得以在正常或合法的状态下进行,行贿的必要性便丧失殆尽,与之相系的索贿自然无从谈起。在美国实行禁酒的1919年至1933年间,非法生产和兜售酒类猖獗一时,执法官员的贪贿之风也愈刮愈烈。而当政府最终解除该禁令后,相应的腐败现象也就销声匿迹了。

几点思考

回顾和审视美国一个多世纪前的腐败史,我们可以约略地提炼出一些命题,并且去品味腐败及其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乐趣。

其一,腐败乃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可以说无所不在。作为一种社会疾病,它又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而严重时而轻微。今天所谓政治清廉的国家或地区,其中包括被标榜为“最成功国家”或“国家楷模”的美国,在历史上大都有过一段极其不光彩腐败史。腐败种类可以有很多,但基本的只是两类,即体制型腐败和收买型腐败。

其二,美国可以说把收买型腐败发挥到了极致,在随后的日子里腐败还确实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治理。或许从中可以引申出一个命题:和体制型腐败相比,收买型腐败虽然罪孽深重但却易于治理。更进一步,政府的基本类型也可以被简约地归结为体制型政府和收买型政府。那时的美国政府显然属于后者。

其三,腐败高发的时间、地点和领域,大都有规律可循。美国历史上腐败最严重的时期恰恰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具体说,美国腐败现象的高发期和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和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资本急剧膨胀和大财阀涌现、政府规模小和治理质量差等因素,其间呈现出很强的相关关系,或许也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政工程建设、新兴产业部门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土地批租及特许经营权发放,往往成为商人集团和腐败分子贪婪目光聚焦的对象。

其四,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与收买型腐败达到高峰或收买型政府大行其道,在时间上重合的如此之“完好”,大致说有两种猜测性解释:或许那只是历史的巧合,或许其中还隐藏着某种深层的寓意。巧合可以置之不理,寓意则需要挖掘。由此推演出的一个重大命题是:收买型腐败或收买型政府是否是美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先决条件?换言之,两者在时间上重合的这一历史阶段是否可以被省略或跳越?从其他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历史看,似乎还没有成功省略或跳越的先例。

其五,美国的腐败由猖獗走向温和、并长期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冲突的利益或利益集团间的竞争,其中既包括垄断财阀间的激烈争夺,又包括公共部门间的制衡掣肘,还包括当时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以及新闻媒体作为一个拥有独立利益之集团的出现。换言之,影响腐败成本和腐败收益、或影响腐败之相对价格的关键变量,在于势均力敌、分庭抗礼的冲突利益之产生和维持。这又可被视为一个有待检验的命题。

其六,由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在内的广义政府垄断性地掌握并分配公共资源、提供公共物品、实施政府管制,通常被认为是产生腐败的温床。然而,美国走过的却是一条从小政府到大政府、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介入日益深广、同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却越来越受到抑制的道路。对此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个命题是,从收买型腐败走出来的政府,其权力的扩大和强化意味着与收买者利益之冲突的加剧,意味着冲突利益的相互制衡。如果扩大和强化了政府的权力伴随着治理质量的提高,亦即公正地管制、立法和执法,保障契约和个人权利,则伴随着繁文缛节、机构重叠、推诿扯皮、官僚主义等而来的交易成本之上升也会被容忍。

其七,治理腐败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和等待时机。如果腐败的严重程度和工业化城市化速度之间的相关性命题被证实,如果人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减少腐败的长效药,如果惩治腐败的社会共识有赖于重大突发事件,如果消除腐败的成本在一定历史时期高于腐败减少带来的收益,那么腐败治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便转换成耐心、甚至容忍问题。从经济学上讲,理想的状态是让治理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在边际上相等,而非彻底铲除腐败。

其八,重大的、突发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导致影响深远变革。加菲尔德总统被暗杀催生了《彭德尔顿

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引发了大规模工人运动和所谓“进步主义”运动,促成了一系列反腐败法及相关法律和机构的出台与建立,并最终孕育出了美国较为完整的反腐败体系。这其中颇有点听天由命和物极必反的味道。

其九,对美国历史上那个极端腐败时期给出一个简单评价并非易事。总体看,历史学家的批评、抨击居多,对强盗贵族和贪官污吏的道德谴责俯拾皆是。不过

相反的声音也始终存在。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不在创新上下功夫,强盗贵族就不可能取得长期增加财富的机会。尽管这批人的全部活动并不是明显地有积极意义,但其实际贡献看来是有益于社会的。至于腐败官员,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法制法规)不完备的普遍存在,“合法腐败”与“诚实贿赂”便随之为他们的恶行开脱了部分责任。

(责任编辑 萧 徐)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全套四册	67.20	8.00
之一 我的回忆	孙中山		
之二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之三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之四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林彪的这一生	少 华 游 胡	28.00	5.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5.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邓小平年谱	中央文献研究室	76.00	8.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5.00
扛起地狱的闸门	丁 群	21.00	5.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5.00
陋室漫笔	靳树鹏	21.80	5.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人民公社兴亡录	宋海庆	36.00	6.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5.00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7.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5.00
第二次宣言	王小平	28.00	5.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5.00
红色第一家族	马社香	30.00	5.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25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6.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6.00
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6.00
党史札记(一集)	龚育之	28.00	5.00
党史札记(二集)	龚育之	35.00	6.00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本书系大型政治性资料图书,如实反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1600余人的简历,为国内外读者了解建党八十多年来中共中央历任领导成员的有关情况提供翔实的资料。本书的编纂,注重严肃性和权威性,资料来源可靠,收录内容准确,编纂体例规范。

《陈独秀风雨人生》陈独秀离开人世已经60多年了。每到春天紫色的蚕豆花开放之际,人们自然会想起因误食此花而病发的陈独秀,想到了当年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老头子”的风雨人生。本书以30万字的篇幅,描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曲折人生道路,并追述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大背景。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在刚过去的20世纪,那些让人记忆的历史太多太多,但本丛书让亲历者来讲述,就多了一份真实和一份况味。在这里你可以与徐铸成、于光远、蔡元培、陈独秀、朱德、杨振宁、林语堂、蒋梦麟等名家相遇,体味历史,重温记忆。

《红墙大事》作者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近20年,接触了许多当年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本书记述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酝酿、争论和展开,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制定和实行。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向读者真实地展示了那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陈云的评弹情结

● 霞 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陈云爱听评弹，可以说，陈云有一个评弹情结。

自幼爱听评弹

陈云自幼家境贫寒，2岁丧父，4岁丧母，随舅舅生活。家庭的变故和不幸，失去父爱和母爱的童年生活，随舅舅生活所遭受的种种艰辛，使陈云养成了坚毅、内向的性格。在舅舅的帮助下，陈云从8岁起读私塾，后又断断续续地读了初小、高小，虽然小时的陈云也有与其他同学交往的机会，但因幼年的陈云遭遇特殊，使他从小就很内向，很少讲话，更很少大笑。他沉静、孤独、寡言，很少与周围的孩子交往，更很少与他们一起玩耍、游戏。他平时很少与同龄的孩子、同学沟通，这是因为他独特的经历使他很难与其他孩子有共同语言。这时，一种文艺形式——评弹吸引了小时的陈云。

评弹于清代发源于苏州，是广泛流行于江苏、浙江、上海一带的民间说表艺术，深受江南普通百姓的喜爱。清末民初，评弹在江南一带形成了一个发展的时期。那时，江南一带从城镇到乡村，都有大大小小的书场，评弹艺人们操弄简单的乐器（以琵琶为主），二三个人往书场里一坐，就开场了。书场大多为租用。书场的拥有者与评弹艺人们共同商定每天所要说的曲目，然后派一个伙计扛着一块写有当天要说的曲目的木牌子，并吆喝着说书的时间、听一场书的价钱，敲着锣，在镇上招揽听众。听众只要花上二三个铜板买一个书筹，就可以到书场中去听。评弹书场大多是由小茶馆兼做，茶馆主人给听客上茶，又可

以赚一笔钱。评弹的曲目，多以说唱古代的故事为主，听者听一场书，不光得到了艺术享受，也得到不少历史知识。

陈云的舅舅平时爱听评弹。他听评弹时，就带上陈云一起去听。陈云听着听着，也就对评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上了瘾。舅舅生意忙时，不能去听，陈云就自己去书场外边站着听，在当地管这叫听“阴立”，即站在书场外边阴影处听（相当于北京人在场外听京剧），这样可以不花钱。小时的陈云只要一有时间，就自己去书场外边听，一站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评弹的音乐，陶冶了陈云的情操，评弹中起伏的故事情节，驱散了幼小陈云心中的孤独感，评弹中的历史故事，也使陈云积累了不少历史知识。评弹中的说表艺术，使沉默寡言的陈云学习到了口才艺术。陈云后来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当工人，休息时也去上海一些书场去听评弹。可以说，听评弹，成了陈云幼年时代、少年时代、乃至青年时代的一大爱好。

1925年，陈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很快就成了工人骨干。当年，陈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在共产党内，先担任基层党的领导干部，后来逐步走上了区、省、党中央的领导岗位。繁忙而又艰险的革命工作，使陈云再也没有闲暇时间听评弹了。后来，陈云从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又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受党中央的委派回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后转赴莫斯科工作，又从莫斯科到新疆工作，再到延安工作，到东北工作，建国后又回到中央工作。陈云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再听评弹，使他与评弹失

缘几十年。陈云自己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十岁前就听书，先是跟舅舅去听，听上瘾了，有时就一个人去。后来干革命，很多年没有听。”

50年代听评弹， 使陈云病情缓解，陈云 又重新喜欢上了评弹

1957年，陈云因工作劳累，加上在反冒进问题上，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心情不好，因此，旧病复发，不得已，只好到南方去休养。当时南方城镇评弹艺术已经有了很大发展，陈云知道这一情况后，勾起了他旧时对评弹的怀恋之情，便多次去听评弹，还请评弹艺人到住处来说书。听评弹，使他郁闷的心情好了许多，身心得到了放松，病情也缓解了，很快就重返工作岗位。1959年，陈云又发病了，他再次到南方去休养。陈云身边工作人员知道陈云爱听评弹，也知道上次陈云生病时，是因为听评弹使他的病情缓解的，便安排他听评弹。那时，陈云还购买了很多评弹唱片和录音带，每天都放一段。听评弹再次缓解了陈云的病情，很快就康复了，回到了工作岗位。1977年6月19日陈云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50年代后期两次到南方养病，听听评弹，觉得对养病有好处。本来头脑发胀，听听书就好些。陈云说，他参加革命后中断了的听评弹，就是从这时起又重新捡起来的，他又重新喜爱上了听评弹。陈云不光是听，还注意收集和保存评弹录音和唱片，这个爱好一直保持到他逝世。

周恩来一句话，使陈云注意起评弹的艺术走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云也受到了冲击。1967年1月19日，在康生的策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群红卫兵闯进了陈云家



陈云观看上海市人民评弹团演出后与演员握手（1962年于北京）

里抄家。他们把陈云所保留的中央文件都抄走，还说陈云保存的评弹录音带和唱片是“四旧”，也要一起抄走销毁。中共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听说红卫兵要抄陈云的家，带人赶到劝说红卫兵，但红卫兵们不听。张耀祠只好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听说后，马上派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到陈云家去制止，口头向红卫兵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陈云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档案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档案，任何人都不准动。但红卫兵不听，周恩来就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让他出面制止红卫兵的行为。戚本禹见周恩来发了火，只好给红卫兵打电话，让他们撤走。那时，戚本禹是红卫兵的偶像和后台，红卫兵都听他的，就准备撤出。但有几个红卫兵头头认为，文件可以不抄走，但评弹唱片是“四旧”，要抄走。在现场的童小鹏制止不住，只好又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在电话中指示说：评弹是苏州一带的文化艺术，不能当作“四旧”破，不能把陈云同志保存的评弹唱片和录音带抄走。童小鹏向红卫兵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红卫兵只好作罢。

由于周恩来出面干预，使陈云多年收集来的

评弹唱片和录音带保留了下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却不敢再听评弹的录音带和唱片了,因为在极左的氛围中,听评弹会被认为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但陈云对评弹的爱好并没有衰减。

到1973年,评弹艺术又恢复了。但此时的评弹是在极左的政治气候下恢复的,评弹的唱法和唱腔乃至伴奏,都被改变了,自弹自唱的形式被取消了。江青等人认为,这是他们搞“文艺革命”的一大功绩,并且特意请周恩来去听。周恩来听了两次被改编的评弹,一句肯定的话也没说,听完看完,掉头就走。此后不久,周恩来见到陈云时问了一句话:你有没有听评弹?陈云说:没有。他问陈云的这句话意味深长,意思是说:你陈云是喜爱听评弹的,你也去听听吧,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陈云听了周恩来的话后,心里明白了。1975年,他到上海,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一段被改编的评弹,已经成了高腔高调,并且是一群人在唱,伴奏的乐器也改变了,加了许多新的不协调的乐器,像是唱戏,又像是唱歌。陈云把这种改编的评弹戏称为“评戏”、“评歌”。陈云对此十分讨厌,他不再听被改编的评弹了。1977年6月,陈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周总理问我有没有听评弹,他当时是听过了,就是没有讲意见。我1975年到上海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评弹,已经改得不成其为评弹了,很扫兴。

重听评弹后做的六件事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政治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虽然从全国来说,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下,还没有真正做到思想解放,文艺界也没有大的突破,评弹这门艺术也没有恢复和发展;但陈云作为个人爱好,却可以把自己此前收集到的评弹录音带和唱片拿出来听了。这给陈云带来了极大的艺术享受。

陈云此时听评弹,却决不只是考虑个人的艺术享受,他要为评弹艺术的发展做几件事。

陈云为评弹艺术发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评弹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说,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要为经济基础服务。我们的评弹,也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评

弹作为一种文艺形式,也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评弹要面向广大群众,创作和演出好的引人向上的,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作品。

陈云为评弹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恢复被江青一伙胡改乱编而破坏了的艺术形式。陈云多次对评弹发表评论、讲话,他说,对评弹原来的艺术风格和形式,要保留,不能乱改,改了的,要恢复,包括伴奏,都应该恢复到原来的风格和形式,才像评弹的样子。在陈云的推动下,从70年代末起,评弹很快就恢复了原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并且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品。

陈云为评弹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提出并推动评弹艺术走新旧并举的道路。陈云多次指出:传统书目也有可以利用的东西,老书也可以说。过去我曾经提出,要找一些老人对古书进行圈点。如果那些老人都死了,就难办了。我们从地底下发掘出来的几千年前的东西还要拿到国外去展览,为什么不可以把没有问题、能起作用的传统书目拿出来演一演呢?以前,于会泳、徐景贤在上海听书,说有点“回潮”,演员就怕了。我看“精干毕剥”、“刮拉松脆”(意为干燥),一点也不“回潮”。在陈云的推动下,评弹很快恢复了说唱一些老书,同时又创造出了一批新书目,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新老并举。

陈云为评弹做的第四件事,是把评弹艺术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并且指出了现在阶段的主要任务。陈云说:评弹发展有四个阶段:(一)说传统书和二类书为主略有新书的阶段。(二)一刀切,都说新书的阶段。(三)“四人帮”搞“评歌”、“评戏”(即“四人帮”毁灭评弹,把评弹乱加改编,改得像是唱歌和唱戏),否定评弹艺术的阶段。(四)现在以说新书为主,同时保留传统书目的优秀部分的阶段。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合乎历史辩证法的。陈云特别提出了在评弹发展的第四阶段,即现在的阶段的任务,他说:我们发展评弹艺术,就要搞新的,新书搞出来,就是粗糙一点,也没有关系,再加工,再发展嘛。我们对新的东西要鼓鼓掌,撑撑腰。在陈云的推动下,新创作出来的评弹书目多了,也产生了一批好曲目。

陈云为评弹做的第五件事,是提出要加强对于

评弹理论研究的课题。他说:要加强对评弹理论的研究。评弹究竟是来自人民群众,还是来自士大夫?我看,主要是来自人民群众,由文人收集加工而成。要研究评弹的历史、艺术形式、理论。陈云根据自己的心得,提出了研究评弹得出的一些理论结论,提出了关于改进评弹艺术形式的途径和方法。他提出了评弹要注意说表,要放单档,要改进乐器的配备等。这些意见都很有见地,对改进评弹艺术起了很好的作用。

陈云为评弹做的第六件事,是提出了培养评弹演员的问题。他提出:评弹演员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说新书的艺人要看报纸,了解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要特别注意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要学一点马列主义的著作。他还提出,要培养青年演员,加强对青年演员的训练和管理,加强对青年演员的教育,提高演员的责任感。在陈云的推动下,南方各评弹团都注意了政治学习。有的评弹团成立了学习小组,组织演员集体学习。有的评弹团制定了管理制度,对演员的日常表现进行测评。评弹演员的责任感增强了,演不好书目的现象杜绝了。

陈云为评弹做的六件事,大大推动了评弹艺术的发展。在1977年和1978年,全国政治形势处于徘徊状态,文艺界的元气也没有恢复。但评弹艺术却一花独秀,恢复和发展很快。到80年代初,江南一带出现了评弹艺术繁荣发展的景象,评弹团的演出很多,听众很踊跃,连一些年青人也喜爱上了评弹艺术。

关于评弹的一次谈话

在《陈云文选》第三卷中,收入了一篇题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文章。这是《陈云文选》中唯一一篇专门论述评弹的文章。那么,这篇文章是怎样产生的呢?

原来,1981年4月2日,陈云从北京到上海休养,听评弹的时间很多。陈云听评弹,听得是很细心的,对评弹也很有见解。他把过去的和现在的一些见解积累起来,就产生了一些想法,不吐不快。他觉得有必要找上海评弹团的负责人谈一谈。4月5日,他把上海评弹团负责人吴宗锡请来,同他谈了对评弹的一些想法。

陈云的这篇谈话,以广阔的视野观察评弹与社会的关系,从政治的高度,指出了评弹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为评弹的繁荣昌盛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陈云首先提出了评弹要出人、出书、走正路的问题。他是针对当时评弹在发展中出现的金钱至上,搞一些不健康的曲目而说的。他说: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为什么要走正路?陈云说: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歪风邪气只能毁灭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引导和提高听众。

怎样才能出人?陈云说:出人,不一定要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就很好,逐步提高,逐步增加。过去,艺人们都是千方百计钻研艺术的。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有竞争。要注意培养青年人,要逐步提高他们。

怎样出书?陈云提出,可以根据小说、电影、话剧等改编成新弹词。改编不能只讲“书情”(即书目中的情节),还要组织“关子”(即评弹说书时书中矛盾尖锐、情节紧张的部分),对原著要进行改编,把“关子”安排好。为了组织好“关子”,必要时可以把原著前后的情节移动、变换。组织好“关子”才能吸引人。编说新书要靠有演出经验的艺人。在编说新书时,艺术上要有所改进,老的一套也要有所改变,但不要歪门邪道,要走正路。要保持主力,保存书艺,提高书艺。

陈云这篇谈话为什么要收入《陈云文选》?因为他在这篇谈话中提出了当时评弹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文艺界当时存在的普遍的问题。而且,在这篇谈话的深层内涵上,也提出了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必要性和标准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出人,就是要产生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而且在德与才中,德是为主的。中国共产党要出书,就是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创新,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要走正路,就是要永远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永远为人民服务。这些深层内涵,实际上是把文艺问题推演到政治领域,与政治问

题联系起来了。这是一篇含义十分深刻的谈话，因此才收入《陈云文选》。

一个剧目引出的话题

1982年，上海市评弹团创作了一个中篇评弹——《真情假意》。陈云看了这个评弹后，认为是个好剧目，是能起到正面教育作用，也能反映时代气息，适合青年的剧目。陈云连看带听，一共二十遍。1982年5月1日，他接见参加此剧创作、评论的吴宗锡、周良、施振眉。他说：上海评弹团创作的《真情假意》，通过揭露董琴琴的自私思想，起到了正面教育作用，有时代气息，符合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要求，是成功的，我听了二十遍还想听。陈云由这个中篇评弹，谈到了青年演员的技能问题，他说：现在的青年演员，说表功夫差得很。不注意说表，弄不出好书来。评弹学校培养学生要注重说表，提高说表艺术。要练说表，就要放单档，不少有名的艺人都放过单档。陈云认为，《真情假意》这出剧，就是培养青年演员的结果，要鼓励青年演员后来居上。他说，后来必须居上，才能发展，后来不居上，就要倒退，这是发展规律。陈云从肯定《真情假意》谈到了目前发现的一些内容不好的评弹的问题，他说，对书场和艺人要加强管理，发现不好的内容，要采取措施，有的要禁止。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演员的教育，提高演员的责任感。说书是教育人的，演出的书目要对群众起积极作用。陈云说，要加强对评弹的评论和理论研究，要组织力量，陆续写出有分量的文章。陈云还表示，支持创办评弹刊物的建议。

陈云对《真情假意》这样关心，讲了这么多的话，是想通过树这个典型，来带动一批好的评弹曲目的出现。为了树《真情假意》这个典型，陈云可谓做到了不遗余力。陈云还打算用《真情假意》这个典型，带动其他文艺形式创作出好的作品。1982年10月，他在给吴宗锡的信中谈到了让其他剧种移植《真情假意》的问题。他说，要求其他剧种移植《真情假意》，是因为那些剧种用普通话，能听懂的人更多一些。陈云在信中还提出，上海广播电台要把中长篇评弹有选择地录一些，以便保存评弹和教育青年演员。

1982年11月，陈云在给吴宗锡的复信中，

又一次谈到了移植《真情假意》的问题，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在移植评弹《真情假意》，应选择最有广泛性的剧种，例如话剧或者电影。陈云在信中对目前评弹的现状很不满意，他说，评弹仍无起色，应从社会方面找原因，应该承认评弹遇到了困难，无视几年来的情况，不是唯物论。

此后，陈云在同文艺界领导干部和文艺界人士谈话中，多次从《真情假意》谈到培养青年演员的问题，他希望文艺界能够创作出好的、有时代气息、鼓舞人积极向上的作品。

制止另一种倾向

80年代初，随着评弹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剧目，有些书场管理很混乱。陈云经常关注评弹的发展状况，他很早就发现了上述问题。他在1982年5月谈到《真情假意》是个好剧目时，同时指出：对评弹，发现不好的内容要采取措施，有的要禁止。此后，他又有两次提到这个问题。

一次是1983年8月16日，他在收到一些反映评弹管理存在问题的材料后，致信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前些年，一些艺人在党落实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书目和表演上迎合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最近虽然加强了管理，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现在设书场的单位很多，因此单靠文化部门抓是不够的，必须由江、浙、沪的省、市委出面来抓才行。可以召集各方面开个会，制订书场管理条例，规定什么样的书不准演，如果演了怎么办。然后派人抽查，发现违反的即照规定处理。只要抓上几年，这股歪风是可以刹住的。胡启立收到信后，很重视，他批示，把陈云的信和附件批转中央其他有关领导传阅后，由中央办公厅将陈云的信和附件转发给上海市委、江苏省委、浙江省委。9月18日，上海市委向中央写了关于评弹书目和演出管理问题及改进措施的报告。10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的这封信。11月5日，中宣部和文化部又把陈云的信和上海市委的报告一起转发至全国各地、州、市、县党委的宣传部和政府的文化局。1984年1月，上海市文化局为落实陈云的意见，在青浦县召开

了有 500 多人参加的评弹会议，制订了落实措施。

另一次是在 1984 年 2 月 2 日，陈云邀请曲艺界著名人士到他家举行春节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再次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要求。这次，他不光是针对评弹说的，而是针对全国文艺界说的。他在解释“走正路”这一条时说：走正路，就是要在书目和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只要做到这几条，曲艺就一定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群众的需要，不断发展，日益繁荣……现在确实出现了一部分坏作品、坏节目，或有严重缺点的作品、节目，对社会、对青年起了不好的作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制订和完善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搞出一些条条来；同时，更需要在文艺界内部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妨碍文艺的繁荣，而且是文艺繁荣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陈云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包括评弹在内的整个文艺界存在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水平低。1983 年 7 月 10 日，他在同吴宗锡、周良、施振眉谈评弹工作时就提出，你们搞评弹工作的也一定要学哲学。他在 1984 年 2 月 2 日同曲艺界著名人士谈话时，又一次提出，文艺工作者要抽空读点马列的书，特别是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陈云认为，这是解决文艺界一些不良倾向的重要措施。

陈云由发现评弹中存在的另一种倾向，推而广之，注意到了全国的文艺倾向问题，然后，郑重地向中央提出，通过中央下发文件，纠正不良倾向，表现出了一个老革命家对文艺界的关心。

最后的关心

陈云晚年特别关心评弹改革的问题。就此，他和评弹界人士多次通信、谈话，提出了关于评弹改革的意见。

陈云提出，评弹改革势在必行，现在时代的节奏快了，文化生活也丰富了，说书的节奏和内容要适合现代生活的节奏及经济生活的发展，因此，评弹必须改革。

陈云还提出，评弹改革一定要慎重一点，先

有一个规划，经过三五年时间的探索，也不算慢，不要急于改。陈云还提出了关于评弹经营体制改革的意见，他的意见是：这方面的改革，要以档为主，以利于开展竞争，提高艺术。评弹演员艺术生命的黄金时间短，要注意使他们在有限的艺术青春期内得到发展，同时还要照顾到老艺人的利益和生活保障，使他们的生活能逐步有所改善。他提出，评弹改革不能一刀切，要允许有多种形式存在，改革要进行试点，从试点中取得好经验。评弹书目改革，要注意防止过去出现的不健康书目问题，使评弹健康地发展。

陈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始终喜爱评弹、关心评弹，可以说，到了晚年，他的评弹情结更深了。从目前发现的史料看，陈云最后一次和评弹界人士谈话，是 1990 年 4 月 22 日，当时他听了吴宗锡、周良、何占春、施振眉等评弹界著名人士的工作汇报后，深情地对他们说：希望你们能定期来看看我，一起来也好，单独来也好，你们听到社会上有什么反映，群众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写信告诉我，使我能多听到真话，多了解实际情况。这时，陈云已经 85 岁高龄了。

1995 年 4 月，陈云同志逝世。他除了留下《陈云文选》一、二、三卷外，还留下了一部特殊的著作——《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这部书于 1983 年 12 月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了陈云从 1959 年至 1983 年有关评弹工作和评弹艺术的谈话、文稿、通信 40 篇。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敬告读者

2004 年合订本已装订成册，请速汇款邮购。

2004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70 元

2003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70 元

2002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70 元

2001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无

2000 年精装 无； 简装 70 元

1999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无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姜椿芳与梅兰芳 周信芳的友谊

● 杨 哲

艺术大师梅兰芳、周信芳在我国家喻户晓,自不必多说。姜椿芳是我国著名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和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他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大半生隐姓埋名与狼共舞做地下工作。

—

1940年,姜椿芳继续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担当地下党文委书记。这时他的上线联系人是唐守愚。一天,唐守愚找到姜椿芳,传达组织决定说,京剧演员和京剧观众也是党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必须把抗战救国、团结进步的思想灌输到这个圈子里去,并指示姜椿芳设法打进京剧界开展工作。

此时,中国京剧两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和周信芳也都到了上海。梅兰芳为避开敌伪缠扰,以年老退居为由,留了胡子,蓄须明志,息影家园,不再登台。正值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盛季,梅兰芳这一姿态,颇受广大民众的敬重,称颂他是一位爱国艺人。周信芳则以另一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他继续在上海舞台上演出,专演一些有爱国内容、激动人心的戏,比如《明末遗恨》,就场场客满,座无虚席。姜椿芳的任务就是和这两位艺术家联系,支持和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带动整个京剧界的抗战决心。

怎样去接近这两位卓有成就的京剧艺术家?恰好这时,姜椿芳结识了苏侨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协助他成功地组成剧团,搞舞剧和音乐活动。阿甫夏洛穆夫告诉姜椿芳,他和梅兰芳关系密切。“现在梅兰芳蓄须停演,又在上海,正有时间和条件,试用新乐器,演奏新乐曲,排练新歌舞剧。不必由他来演,但由他带头发起这项尝试,以创造中国的新歌剧,现在真是绝好机会。”当时,还有一位英蒂拉·黛微女士也支持他们上门拜访梅兰芳。黛微女士是上海滩外国人社交圈里的活跃人物,也是俄国人。她平时很

支持姜椿芳和阿甫夏洛穆夫的关于戏剧音乐改革的尝试,还帮助他们筹款演出。

姜椿芳赞成阿甫夏洛穆夫的意见,可是他担心自己人微言轻,梅兰芳未必有兴趣听取一个陌生人的言语。阿甫夏洛穆夫表示,这不是问题,他愿意向梅兰芳引荐姜椿芳,并陪同姜椿芳一起向大师宣传他们的主张。

这时,阿甫夏洛穆夫正在一个美国人的资助下排练中国舞剧《古刹惊梦》,已到了统排阶段,想请梅兰芳到现场看看,加以指点。于是,姜椿芳还有英蒂拉·黛微和阿甫夏洛穆夫一起去了马思南路(现为思南路)的梅家。

在梅兰芳的会客厅里,他们开始了谈话。阿甫用英文寒暄了几句后,就由姜椿芳用中文讲述起提倡中国民族音乐改革的必要。梅兰芳用心听着,对姜椿芳的话时而表示赞同。但他说,自己已经脱离舞台,退隐家园,难于出面进行这样的试验。他答应与有关朋友商量一下,看看由哪些人出来做比较合适。这次拜访,虽然梅兰芳婉言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但却欣然答应了去看他们的舞剧排练。

几天后,梅兰芳观看了《古刹惊梦》的排练,极口称赞。姜椿芳请他为舞剧演出的说明书题字,梅兰芳愉快地照办了。正式演出时,梅兰芳也应邀出席。以后一段时间,由于经常有茶会和演出,姜椿芳和梅兰芳也一再见面,话题仍然是谈京剧改革问题。

与此同时,姜椿芳也与另一京剧大师周信芳结为至交。

为了接近周信芳,姜椿芳从看他演戏开始,渐渐熟悉京剧的特点,甚至学着写戏。恰巧,姜椿芳有个同乡尤金圭就在周信芳身边写戏。姜椿芳便托这个同乡介绍他与周信芳相识。

对周信芳来讲,答应面见一个陌生人可能只是出于成全熟人的面子,但是,姜椿芳稳重博学的模样和颇有见解的谈吐让周信芳对他刮目相看,并且产生了一种信任感。后来,姜椿芳拜访的次数多了,周信芳也了解到他的一些

情况,知道他懂俄文,是与苏联方面接近的“左派人士”,又知道他为进步报刊编译撰写文章。在谈话中,他们除了谈京剧革新的问题,姜椿芳也常常谈到时事形势,周信芳猜想,姜椿芳的身份必定与共产党有关。尽管这层意思一直没有点破,而事实上他们却成为一对心照不宣的朋友。

1941年夏初,姜椿芳约了尤金圭,通过赵朴初的关系,借了佛教团体觉园的一个小客厅,每天碰头,编写《史可法》京剧剧本。姜椿芳打算,尽快搞出一个剧本,交给周信芳,以达成稳固的业务联系。为了写好《史可法》,姜椿芳做了充足准备,收集了很多史料。遗憾的是剧本没有完成,姜椿芳就接到了新任务,只好将《史可法》的剧情和分幕分场提纲交给了周信芳。姜向周建议,即使不能演出比较直接反映抗战抗敌的戏,也要在戏里宣传重气节、反屈辱的思想,以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的种种表现和抑制沦陷区敌伪势力的嚣张。周信芳接受了这一建议,在他演出的戏院大门口,总是挂着两面招牌,一边是《文天祥》,一边是《史可法》,让人未听戏文就先感受到一股浩然正气!周信芳以他靠近革命的政治敏感,早就觉察到姜椿芳这个朋友不是一个单纯的京剧艺术爱好者,他的意见不温不火,却句句在理。他十分尊重和信任姜椿芳,把姜椿芳的意见当作是倾听地下党的指示。后来,无论自己有什么想法,都要找姜椿芳商量,愿意得到他的协助。

二

抗战胜利初期,周信芳找到姜椿芳,说他想创办一个戏剧刊物,专门宣传和研究戏剧改革问题,并拟定将这刊物叫做《人民戏剧》;他说还想买下一所戏院,专门演出历年来保留的一些好的历史剧目,并且编演一些革新的戏,以摆脱戏院老板的剥削,为革新京剧建立一个基地。周信芳告诉姜椿芳,这个戏院要选择在中小学居民居住的地方。姜椿芳很赞成他的想法,就四处打听,为他介绍了靠近南市区的亚蒙戏院,经过多次洽谈,还商定了价钱。

解放战争期间,周信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在上海开展的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种种运动。1946年10月,周恩来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周信芳不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毅然前往,见

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恶,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必将胜利。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希望以战斗的成就,作为胜利重逢时的见面礼。周信芳深受鼓舞,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侮辱戏剧、戏曲艺人的“艺员登记”活动;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当局搜刮民财进行内战的增加“娱乐捐”的抗捐运动;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上海戏剧界反内战签名运动”。周信芳的带头作用引起当局注意,敌人以坐牢相威胁,周信芳告诉他们“我准备带着铺盖去坐牢!”后来,他因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艺友座谈会”,遭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传讯,威胁他脱离进步组织,周信芳毫不理睬。解放前夕,国民党企图胁迫他到台湾去,周信芳听从地下党的通知,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上海解放前夕,周信芳想出国演出,弘扬中国京剧艺术。他又找到姜椿芳,一起商量出国路线。打算先去苏联,然后到西欧,去美国,绕地球一周回国。由姜椿芳出面,与苏联、美国、英国进行接洽,周信芳用新编演的《徽钦二帝》举行招待演出,邀请当时驻上海的苏、美、英、法等国家的有关人士观看。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党组织向周信芳暗示全国和上海解放在即,解放后在戏剧领域将出现无比宏伟的前景,周信芳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准备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姜椿芳得悉特务将用制造交通事故的卑劣手段对他下毒手,组织安排他迅速飞抵香港。临行前,他向周信芳告别,周和夫人表示:“本来我们打算把你藏在我们在长乐路那处房子的壁角的小房间里,现在,你既然有更安全的



周信芳旅居英国的女儿周采芹于20世纪80年代拜访姜椿芳

地方,就赶快离开吧!”姜椿芳非常感动,知道他们早就猜出了他的真实身份,而且早就想到了在危急关头怎样帮助他。而在那个年代,即使接近进步人士都要引起敌特的注意,更不要说把共产党人藏进家中。

经过地下斗争的考验,姜椿芳和周信芳,一个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革命者,一个赤诚爱国的戏剧大师,结成了莫逆之交。姜椿芳不仅是周信芳的密友,也成为周家的上宾。周夫人是一位名门闺秀,大家主妇。从解放前的艰苦岁月到还不十分安定的解放初期的日子,她从不喜欢接触政治,即使解放了,她见到共产党的干部也敬而远之,但唯独毫无保留地信任姜椿芳,不仅是经常找他商谈周信芳的工作、演出事宜,就是家庭矛盾也请来姜椿芳商量。只要是姜椿芳说了意见,周夫人总是接受的。

三

姜椿芳化名魏晋卿飞往香港后,在港只停留几天,于5月初乘轮船经天津转北平。5月20日左右,听了周恩来的指示后,随同接收上海的工作组进驻上海,27日上海解放的当天早晨,盼望解放望眼欲穿的周信芳就接到了姜椿芳的电话。他告诉姜椿芳,他昨天就已用电话把喜讯通知住在另外地区的朋友,并说:“我们全家欢迎解放军和你。”

第二天,姜椿芳就到周信芳家里,他们畅叙别后的情况,姜椿芳转达了他在北京接受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的委托,请梅兰芳、周信芳二人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周信芳欣然接受。姜椿芳说,他还要到梅兰芳家里去转达这一邀请,周信芳说:“这就不用你去了,我去和兰芳说。”周信芳当天就去找了梅兰芳,梅兰芳也表示愿意去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

1952年,姜椿芳调往北京工作,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周信芳每次到北京必然找姜椿芳,他们谈戏剧,也谈世界和国家大事还有家事,梅兰芳迁居北京,和姜椿芳时常见面,经常谈些戏剧改革问题。1952年12月,梅兰芳和姜椿芳都去维也纳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梅兰芳在那里演出了《贵妃醉酒》,姜椿芳为宋庆龄当翻译,因为在一个团里,两人时常见面,一有机会,就坐在一起,亲密交谈。

当梅兰芳于1959年加入了党组织以后,上海京剧院对周信芳的入党问题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周信芳并没有立

刻表示态度。负责上海京剧院党的工作的刘厚生到北京找了姜椿芳,希望他能够做做周信芳的工作。那年夏天,正好周信芳因事来北京,一到北京就来看望姜椿芳,姜椿芳恳切地向他谈了入党的意义,周信芳也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原来他把党组织看得过于神圣,觉得自己不够资格,怕入党后因为个人过失给党造成不好的影响。姜椿芳针对他的想法,向他做了多方面的解释,打消了他的顾虑。周信芳回到上海,立即向京剧院的党组织表示了争取入党的愿望,经组织讨论通过,吸收他入了党。

入党后,周信芳在艺术上更加勤奋刻苦。毛主席多次观看他的演出,周总理在他演艺生涯五十年的时候,作了“庆祝周信芳先生演剧五十年的成就”的题词。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因病逝世,姜椿芳、周信芳不胜哀痛。

周信芳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清除出党,使他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他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他为之献身的党的事业和京剧艺术同时抛弃了他,他甚至不能像以往那样,去找姜椿芳问个为什么?此时的姜椿芳也和他一样遭受迫害,身陷囹圄。周信芳在抑郁苦闷中度过晚年,他的病情日趋恶化,于1975年3月8日含冤去世。

1978年,周信芳冤案得以平反,姜椿芳参加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面对周信芳先生的遗像,姜椿芳感慨万千,深切缅怀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在艺术上取得杰出成就的这位挚友。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姜椿芳创建和主持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非常繁忙,他仍利用一切机会写文章和演讲,继续总结梅兰芳和周信芳的艺术成就,并使之发扬光大。他认为:“这两位京剧界的表演艺术家,在中国戏剧艺术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一生为人民服务,他们的艺术成就影响着京剧的发展,他们所创造的流派将长远影响今后一代一代的戏曲艺术家。”

当年也在上海地下党文委领导戏剧工作的刘厚生,熟知“三芳”友谊的由来,他在怀念姜椿芳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椿芳同志自己没有写过剧本,没有导过戏,也没有做过演员,但他却同戏剧界(无论是话剧还是戏曲)有着相当广泛而深入的联系。作为突出的例证,是他同梅兰芳、周信芳两位京剧大师的关系。这是椿芳同志作为一个光彩的戏剧战士的生涯中,持续时间很长、影响很深远、意义重大的一个方面。”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欢迎订购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的节日，由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监制、中国国际钱币有限公司承制特

发行纪念珍品一套。包括：(1)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抗日战争浮雕”铜质金砖一块，长方形 50mm × 80mm；(2)卢沟桥事变发生地，卢沟桥醒狮胸章一枚，圆形，直径25mm，均采用铜质24k包金精制而成，并配以精美包装。为提高收藏价值，该套珍品全国限量发行 8000套，附有统一编号的收藏证书。

定价：98元（含邮挂费）



【寻根中国】中华百家姓邮资品珍藏书

姓氏，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历史产物，它所标志的是一个人的血统根源，姓氏的起源与演变与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我国的姓、名、字、号之学，有着极为丰富广博的内涵。它所反映的是56个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发展进程，所记录下的是中华先祖相互学习、交流的轨迹。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联袂推出的《寻根中国：中华百家姓邮资品珍藏书》，详细解析每一个姓氏的来历。每一本珍藏书都配有“收藏证书”并有编号，是收藏者的佳品。

定价：3800元（含运费）

【姓氏图腾纪念张】

